

漢三老碑

此碑以成豐二年銘於姚家山出土在藏縣人周清泉家民初周氏以此數千元售諸日本翰所之好古有力者集資八千元購得
西泠印社鑒藏之以建武二十二年考之則此石當在中平末元初間在姚山摩崖之前洵為浙第一古碑也
以清同治初年為題此碑由清運北一經吳昌碩丁未七月始於清運北一經吳昌碩丁未七月始於清運北一經吳昌碩丁未七月始於清運北一經吳昌碩



此碑曾記當年我輩歸心切一係冠八年期傷次子即邊次字傍文無損周繼共端詳
揭碑一六字今三閱此古二年前自德一在底印社校周清泉所拓字與石原字無異
長沙清源縣醫陳張石園札意方不據方節一紙陳明此碑係周清泉所拓王德源通

古碑妙拓墨
煙濃書法易
神簡拙工治印
分明師法在
不須辛苦守
方鋼

方鋼

公清道元好篆刻
此碑諸君甚珍重
為形一德博笑
丁未中後余汪天

少心盡盛年德
章初做字笑仙
魚初初字清泉
取未許人蘭藏寶

三老碑拓本係
以清運北一經
地之內之我
清心至字至
一紙向之

德清徐元芳教
時丁未

西泠藝叢

XILING ACADEMIC
MAGAZINE OF TRADITIONAL ARTS

『西泠印社建社以來印學研究流變與未來
方向』專題研討會論文選萃

- 开拓与创新：在『西泠印社建社以來印學研究流變與未來方向』
- 回顧與展望：在『西泠印社建社以來印學研究流變與未來方向』
- 西泠印社120年印學研究發展綜述



拾 | 二〇二三年
總第一〇六期



國家新聞
出版广电
总局认定
学术期刊

西泠藝叢

二〇二三年 总第一〇六期

『西泠印社建社以來印學研究流變與未來方向』專題研討會論文選萃

拾

ISSN 2095-9362



国内统一刊号 CN33-1393/J

定价：38.00 元



◎ 红梅图 吴昌硕 西泠印社藏

主管单位
西泠印社 社务委员会

主办单位
西泠印社 社务委员会

出版单位
西泠印社出版社有限公司

《西泠艺丛》学术指导委员会
刘 江 朱关田 韩天衡 陈振濂 李刚田
童衍方 龚志南

《西泠艺丛》编辑委员会
陈振濂 王宏伟 金鉴才 孙慰祖 秦 陶

主编
陈振濂

常务副主编
秦 陶

副主编 (按姓氏笔画排序)
江 吟 郭超英 (名誉)

第一编辑室主任
解旬灵

第二编辑室主任
陈 涛

编辑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竹英 王大啸 王丽艳 王 臻
史一然 乔中石 张 帆 陈心怡
郭晓芳 戴海栋 杨瑞敏 (实习)

法律顾问
浙江浙元律师事务所

支持单位
西泠印社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单位
西泠印社出版社有限公司

制版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23.10.31

CN33-1393/J [国内统一刊号]
ISSN 2095-9362 [国际标准刊号]

编辑部联系方式
编辑组稿电话：0571-85815991
发行订阅电话：0571-87037360
地 址：杭州市下城区西湖文化广场E区32号5楼
邮 编：310014
电子邮箱：xlyc2015@126.com

开户银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户名
西泠印社（杭州）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账号
75188100264547

西泠传媒旗下
西泠印社官方网站：中国西泠网 <http://www.xlys.org.cn/>



西泠印社官方微信



西泠印社官方微博

◎本刊声明

1. 本刊不接受触犯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作品，因抄袭和涉密等侵犯他人版权或其他权利者，文责自负。本刊所发表文章的观点均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刊观点和立场。本刊有权对其进行适当删改和调整，作者如不愿被改动，请及时告知《西泠艺丛》编辑部。
2. 为实现期刊编辑和出版的网络化，扩大本刊与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刊已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超星、知网等媒体和信息资源库全文收录，在本刊公开发表的作品，视同为作者同意通过本刊将其作品上传至上述平台或数据库，作者如不同意作品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



◎ 朱竹图 吴昌硕 西泠印社藏

目 录

Contents



◎ 花卉图 吴昌硕 西泠印社藏

“西泠印社建社以来印学研究流变与未来方向”专题研讨会论文选萃

开拓与创新：在“西泠印社建社以来印学研究流变与未来方向”研讨会上的总结	文/陈振濂	02
回顾与展望：在“西泠印社建社以来印学研究流变与未来方向”研讨会上的发言	文/孙慰祖	05
西泠印社120年印学研究发展综述	文/秦 陶	07
传承 创新 突破		
——试论西泠印社建社以来印学研究的三个阶段及其特点	文/张炜羽	12
20世纪以来印论发展背景下西泠印社的印学研究意识	文/林 如	15
20世纪以来印学研究之流变与未来方向鄙视	文/朱 琪	20
西泠印社建社以来印研究与未来方向	文/张永强	25
关于西泠印社印学研究未来方向的几点思考	文/杨 庆	28
从篆刻史到大印学——西泠印社近二十年印学研究刍议	文/金 丹	31
浅论西泠印社建社以来的印学研究流变与未来方向	文/杜志强	34
西泠代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十年		
——略论西泠印社二十年印学研究的变化与发展	文/沈慧兴	37
《西泠艺丛》公开发行人以来专题内容发微	文/孔品屏	42
玺印封泥研究对历史地理学的推进	文/张伟然	44
略说早期印谱在古玺印整理方面的意义	文/施谢捷	47
关于印学研究学院化的观察与思考	文/田振宇	53
书籍史：明代印谱研究的一个面向	文/孙志强	56

社史钩沉 / She Shi Gou Chen

怀念方介堪先生	文/徐无闻	60
早期女社员孙锦行实简述	文/丁如霞	62

历届社庆献礼作品精选 / Li Jie She Qing Xian Li Zuo Pin Jing Xuan

历届社庆献礼作品精选	66
------------	----

封三：朱竹图 吴昌硕 西泠印社藏

封底：红梅图 吴昌硕 西泠印社藏

开拓与创新：在“西泠印社建社以来印学研究流变与未来方向”研讨会上的总结

文 / 陈振濂

从早年的《西泠艺丛》编辑会议，到我们今天的专题研讨会，其间印学本身也经历了发展与转折。刚才各位专家的发言都很精彩，像孔品屏把《西泠艺丛》的研究板块等用计量、归纳的方式全部捋了一遍；沈慧兴则是采用了统计学的方法，把历年印学学术研讨会的理论成果做了量化分析。各位都提供了扎实的研究结果，有数据的直观体现，包括像林如的发言，将每一时期印学文献的代表作都表述得很清晰。今天，我们研讨会的题目是“建社以来印学研究流变与未来方向”，其实是比较宽泛的，看起来像是在研究西泠印社史，尤其是西泠印社的学术史。

方才孙慰祖老师的讲话激情四射，非常有“告慰乡邻”的感觉。

我们西泠印社近 20 年来的目标达到了，这是全社上上下下齐心协力的结果。从刚刚孙老师的讲话里引申出来，我想大家应该建立共同的认知：第一，到目前为止，我们这 20 年的学术研究与篆刻创作实践、篆刻教育及其他的领域相比，是发展得最稳健的，也是卓有成效的。第二，目前为止西泠印社作为一个学术平台，它所开展的每年一届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可以说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成了一个标杆。过去 10 年积累期间，我们还觉得不能说这样的大

话。原因是，比方说我们有 10 篇论文很好、但其他学术平台也会有 8 篇论文很好，二者互相之间很难认可对方就是印学领域最核心的支柱；但是，如今 20 年过去了，我们可以说印学研究的支柱确实是在西泠印社，在座的各位都是西泠印社印学研究、当代印学研究的中流砥柱。

西泠印社这些年一直在不断地反省、改革。比如说，我们从原来的印学的经验谈、印学的回忆录，到不同的印学研究互相之间的在趣味上的共鸣；从原先老社员的篆刻家的方式、篆刻家的构想，到后来博物馆里专职的研究机构，再到大学，整个过程对我们来说也相当不易，其间的改革也很痛苦。因为按照现有的学术评审的体制，很多老先生写的文章都无法选入：他们的文章是感想性的、经验性的，先不看内容好不好，他从学术规范开始就无法满足客观要求。西泠印社这些年里最大的特点就是认识到学术快速发展，原有的方式肯定不行，但需要部分保留，因为这些老先生都在，于是当时就采取特邀的方式，定向邀约请老先生撰写文章，在我们的论文集里面开辟一个一个特殊的板块。虽然这一板块，学术规范不是太严格，但也还是一个比较专门的学术内容，就尊重这些老先生理论研究的热情，我觉得这是第一。但是整个的发展除了一开始是

学术规范，文体的、文风的，或者文学、文字内容的，演进到了最近 10 年，刚才大家提到好像又跨了一大步，那就是说这是在开始从传统印学标杆开始转向现代阐释转变。当然我现在用的这个词比较谨慎，说它是现代阐释不是讲现代印学，因为传统印学和现代印学是对立的，但是传统印学的现代阐释不是对立的，因为比如说内容是同样一个人，但是解释的方式变了。目标没有变，内容也没有变，但是方式变了，因而这种现代阐释就完全有可能在经过若干年后的努力，我们会把这个传统印学转向包含传统印学的现代印学。传统印学还有核心，但是它会有现代印学的很多方式，就像大家这段时间都提到我们从 2016 年开始做得比较大胆的、当时非常冒险的，是试验世界印章史。所以上个月在海南博鳌论坛就特别谈到了“从大印学看世界印章史中的中国”。这个标题是为什么要这样定？因为在博鳌论坛上讲的全是国际化视野下的内容。讲传统印学，接受度就会比较低，所以一定要让听众感觉我们这个板块和经济论坛、政治论坛、社会治理论坛等要匹配。那么怎么匹配呢？就是世界印章史的中国。如果我们不是从 2016 年开始未雨绸缪，不是先把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世界图文印信纳入我们的关注视野，现在这个话题我们也拿不出来，世界印章史我们也不了解；但是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之后，现在的我们的概念里面，印章史就可以把它划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古玺印阶段。研究文史、研究上古史，研究我们现在所说的制度史、职官史，各种各样的体制；第二个阶段是进入到文艺期，明清篆刻的艺术，这个时候和古玺印完全是两个概念；然后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开始慢慢发现世界印章史的萌芽。所以在博鳌论坛上，我提到我们现在在关注篆刻界在关注世界印章史，和古玺印史的上古史，以及明清文人篆刻的文艺史，再到现在的世界印章，包罗万象。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一带一路”的倡议者，在国际上发出来的声音是很强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印学界还只限于抱残守缺，就被会这个时代所淘汰了，所以需要 we 积极主动应对。

世界印章史里面有没有古玺印呢？当然有啊，中国古玺印史就是世界印章史里面的一部分，民间篆刻也有。所以不要把中国传统印学与世界印章史理解为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好像一提到世界印章史，古玺印就抛掉了。肯定

不是这个理解模式，把古玺印等纳入世界印章史，其实是把这个范围越做越大。这就是我们所言从传统印学拓展为一个现代诠释。

我们现在要做的首先是要参加这些高层的活动，要想国家所想，关注国家所需要的东西，书法界和美术界都能提出响应的话题，印学界也要积极地应对；而且篆刻家，尤其是印学研究者，其实已经有这个基础。在这一层面上考量，把视野放开并不等于要抛弃传统，只能是传统更加坚实。今年秋季雅集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就是 20 世纪篆刻与西泠印社。这些都是在讲传统，近代史 100 年就是讲这个东西，并不是说我们指定的域外印章史或者世界印章史，就否定了主流，所以第一就是现代阐释。其次，原有的研究，低水平重复比较平庸的东西，或者都是常识的东西，一般就不大会采取。记得去年我们印学论文评审的时候，一看某一篇论文，原来所有的引用的资料 and 所发表的观点、所提出来的观点，基本上原来西泠八家研究都已经讲了很多遍了，再讲也没意思；所以哪怕就是讲西泠八家这个“永恒”的话题，也要看研究者在哪个时代、用什么样的方式再去对照它，不是抛弃某一个话题，而是必须自出新意。最近西泠印社影响力日趋提升，有些大的项目，都是为了 120 周年。其中第一个是和中央党史馆合作办展，以前建党一百周年时候是捐献展有 36 方印，这次是有 100 多方印。党史馆地位高、规模大，能够与党史馆合作，也从侧面反映出我们西泠印社的影响力之大；第二个是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也直接提升了西泠印社的良好影响。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西泠印社发展的重要历史关头，我们要继续保持和维护印社的美誉度，要做到拒绝平庸、杜绝敷衍，踏实认真做事。

同时，西泠印社的学术研究在近十余年来，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形成了一系列成果。首先是社刊发表的论文，刚刚孔品屏的文章里面统计已经有了清晰的数据；其次是印学研讨会，沈慧兴的文章里也有了较为明确的分析；再有就是个人著作，林如的文章里对于相关著作都统计在案了；最后是集体出版，这一项其实在我们的学术成果里面最近也占了很大的一部分体量，比如说中国印学博物馆的藏品录、弘一法师的印藏、葛昌楹传朴堂的藏印，形成了一系列“社藏大系”丛书。整个社会和国家都在进步，我们不可能只站在原有的立场上，认为自己所拥有的那点

东西才是对的，而一定是在不断地进步。2009 年我们提出的印学研究主题是“重振金石学”，经过十余年的积累，到 2021 年开始提“大印学”。这个过程，就是在不断地推进；并且这个发展如同永动机，再过几年我们还会再往前推。也就是说，只要是印学需要，要打造一个大的体系，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发展，它是一个不断沉淀、不断积累、不断攀登的渠道。其间研究目标的创新和研究方法的创新，要有不断地推进。比如说《篆学琐著》这本书，我们原来都读过，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遁庵印学丛书”影印本，当时还找我写了个序，我对照了一下和原来《篆学琐著》之间的这个篇幅差异，才了解到这么有名的东西为什么《遁庵印学丛书》没有，是因为前面已经收录了，后面只是个补充，是一个替补的概念。

今后的印学到底应该怎么开展，其实对我们来说有两个参照系。第一个就是“过去”。刚才孙慰祖老师说了，“回顾与展望”，就是“过去、现状、未来”。对我们而言，“过去”是很重要，它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印社印学研究刚开始的时候，20 世纪 70 到 80 年代的印学论文集，是很寒酸的 200 多页的一本小小的薄书，小 32 开的；如今的印学研讨会，一本论文集 800 多页上下两册，厚得不得了，翻都来不及翻，并且每一次研讨会差不多都是这个规模。所以我觉得和过去比，我们都肯定是在进步。但是如果只和过去比，不会太有出息，因为你肯定比过去好。这是纵向的和过去比，此外还要横向的比，要和印学相关联的专业，比如说和金石学、和考古学的关系，和文史之学的关系，和文字学、和文献学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之中，要看看别人在干什么；然后再想想，印学能干什么？除此之外，横向还要和世界印章史比，中国的文化自信要走出去，你只了解你自己的印学如数家珍是不够的，你能不能说一说印度的滚筒印是怎么回事，两河流域的阿拉伯印章是怎么回事，古埃及印章是怎么回事……这些东西，如果不贯通中西，那么相关研究还是一个弱势学科。饶宗颐先生提出东学西渐，指出中国的学问要走出去，是很有道理。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把印学纳入文明史的范畴。最近这段时间，由范正红老师牵头、山东省委宣传部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提出了“印信文化”，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诚信”，用印章来证明最合适。他们搞了一个很大规模的活动，把博物馆里一些能够代表“印信文化”

最好的东西都调出来，大家看到以后大涨见识。由此可见，中国印学作为专业，和整个文明史的发展过程的关系也很密切，印学未来取向范围还要更大，整个文明史的进程都被囊括进来。这次活动要求我第一个去做主旨讲演，我看当时下面听众有三四十位印社的社长在座。我先跟他们说，今天先不讲印学，我跟你们讲一讲印章的文明史。讲文明史和讲篆刻史、古玺印史也是不同的角度，也是个横向的跨度。

关于建社以来印学理论研究的话题，《西泠艺丛》编辑部可以分头组织专人专门对某一个时段进行研究。给你们派个任务，就像我们当时在做《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的时候一样分期。新中国成立之前是一段，有多少印学研究文章，其中哪一些是我们西泠印社社员做的，成果有哪些。这是第一部分；然后是 1949 年以后到 60 年代印社恢复活动，这段时间有多少学术研究的成果；再到改革开放以后，有哪些研究成果；最后大概是第四个阶段，应该是 21 世纪以来的百年社庆以后，这个阶段有哪些研究成果。这几个阶段，都通过专题小组的方式来做研究，就会把印社的印学理论发展非常清晰地梳理出来，为后人留下一份沉甸甸的成果。希望印学研究室和我们编辑部密切配合，把西泠印社这些年的辉煌历史悉数列出。

回顾与展望：在“西泠印社建社以来印学研究流变与未来方向”研讨会上的发言

文 / 孙慰祖

我们的会议进行到现在，发言踊跃，内容丰富，延伸出很多新的话题，实际上超出了我们设定的“西泠印社建社以来印学研究流变与未来方向”这一范围。今天的会议，简单说来就是“回顾与展望”。“回顾”可以被我们视为一个研究课题，即对研究史的研究。西泠印社的学术史在当代的篆刻和印学领域里是有代表性和指标意义的，可以说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现当代中国印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和高度。西泠印社这几十年来持续地推进印学研究，是基于其立身之本和历史责任。我们认识到，要在当代学术之林中真正体现西泠印社“研究印学”和成为“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的定位，必须在推进印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引领研究队伍的聚合与学术规范的建立这一方向上走在前面。这也是西泠印社印学理论研究室成立以后一直努力承担的任务。

今天好几位同人都提到了百年来中国印学研究的状况与西泠印社发展史有一定的重合关系，这是有道理的。以研究史的视角来回看，我认为西泠印社成立以后，印学研究活动可以大略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民国时期，以研究者个体为主要方式。吴隐、叶铭、方节龢、黄宾虹、方介堪、罗福颐、沙孟海等或整理编订印谱，或印行印学论著，或撰写研究和普及

篆刻的文论。这些作品借助当时引入的现代印刷技术，多在传播条件比较发达的上海面世。

由于历史原因，1949 年以后印学研究 with 篆刻创作的发展势头一度有所迟滞，印社有组织的活动停顿多年。但一些前辈篆刻艺术家仍通过个体的作为，潜心著述，延续着篆刻学、印学的文脉。普及和传承篆刻艺术，是这一阶段印学活动的主要特点。

第二阶段，在新时期文艺复兴的大背景之下，以西泠印社恢复活动以后的 75 周年、80 周年、90 周年社员大会先后举办的三次印学交流研讨为标志，印社组织的学术活动逐步发力，在当时的书法篆刻界产生深刻的影响。后二次研讨会印行了《印学论丛》和《印学论坛》文集，是当代印学研讨活动走向学术化、专门化的起点。印社以外书法、篆刻团体也相继举办了若干印学研讨活动，吸引了更多中青年篆刻家和研究者的进入。西泠印社的学术活动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先行和示范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学术自身发展规律和当时的印学文化条件，这一阶段反映出当代印学起步阶段的特征，在学术规范、论文体裁、研究方向等方面，带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就开创当代有组织、群体性的中国印学研究活动这一意义而言，印社

领导者、组织者的学术自觉与使命意识，毫无疑问是走在了时代的前头。

第三阶段，沙孟海社长提出的打造“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的目标，以及印社同人“学术立社”的理念，逐步成为印社上下的普遍共识。西泠印社建社 100 周年之际，杭州市委宣传部领导推出一系列组织举措，围绕印社“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的宗旨，成立若干研究室以分工组织各项活动，就是当时的印社工作改革之一。书法篆刻创作和印学研究这两翼的工作以制度形式确立下来以后，在一系列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印学理论研究室当时设定三个目标：聚合培育一支老中青学术队伍，积累一批研究成果，形成符合当代学术规范的活动机制。在印社领导和社务委员会支持下，起步的十多年中争取有关地方合作，延请相关领域学术专家的参与，指导和鼓励年轻学人的加入，坚持每年组织一次小型专题研讨会，三年一届峰会，同时延续传统的五年社庆大型综合研讨活动。十多年筚路蓝缕走来，再回头看研究室与山东印社合办的首次年度研讨会和首届“孤山证印”印学峰会，可以说当初设定的三个目标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西泠印社的学术研讨活动在当代印学界的引领地位、前沿地位充分凸显。同时，《西泠艺丛》作为目前唯一的印学研究期刊，长期承担了互为协同的功能。西泠印社可以毫无愧色地以艺术团体和学术团体的双重地位融入于当代文化大发展的框架之中。这是进入第三个阶段的状况。这个阶段还将继续。

印学注定是小众的。不是令万众欢腾的东西，将来也不会。印学的视野也不是漫无边际的。我们是在学科定位与边界的基点之上讨论印学这个概念的，今天也是在这个基点上讨论“未来方向”的。刚才很多同志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学术议题，值得重视并展开研究。学术越深入，越会不断发现需要解决的课题，无论印史研究、艺术研究还是创作研究都是如此。这就是我理解的印学边界不断明晰也不断地拓展。这些年研究方向的拓展很明显，“印”的本体研究也延伸到其他学科，如历史地理学、官制学、古文字学以至考古的相关问题，但是，它始终应当以“印”为出发点与归宿。只有更专业，才有更坚实的地位。因此，拓展是印学发展任务之一。

任务之二是深化，即研究的深度与水平，这和拓展是有联系的。就拿文人篆刻史的个案研究为例子，就有很大

的空间需要去探究去填充，比如多年前林乾良先生做了丁敬的个案研究，我也做过陈鸿寿的个案，十多年中有年轻学者持续地投入，扎扎实实地厘清了蒋仁、黄易的身世、交游、艺术风格成因等。这方面需深化的课题还很多。只有把个案研究做好了，文人篆刻史的描述才可能建立在比较准确、科学的基础之上，才可能告别陈陈相因的一瞥式的印史人物描述。古玺印史的各个环节和各个类型的断代研究、艺术研究也是如此。

任务之三是坚持。西泠印社需要坚持，研究者个体也需要坚持。印学是一个新兴的学科概念，在以往文化史上并没有成为成熟的专学。上溯宋代，下及晚清，围绕“印”的研究基本上立足于“游于艺”和考经证史，研究任务、研究范畴、研究方法都很模糊，要说学科，就是幼稚学科，离建构现代学术观念下的印学学术体系，它的距离是很远的。这就是我们曾经面对的历史状况。因此，今天我们回顾宋代以来的学术史，回顾西泠印社的学术研究历程，深切地感悟到当代的自信，也使印学界同人认识到：当代印学，前面还有很长的拓荒之路。

西泠印社 120 年印学研究发展综述

文 / 秦 陶

清光绪三十年（1904），丁仁、王褆、叶铭、吴隐创立西泠印社，即表明“学术立社、研习印学”的社团定位。西泠印社《社约》首条曰：“本社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上自鼎彝碑碣，下至印玺泉刀，无不博采旁搜，借资证经考史。”其中倡明：立社目的在于保存印学，不自域、不自秘，兼收并蓄，所收意在传世。印社同人明确提出，印社要沿流溯源、探讨文字，印学不是雕虫小技。这反映出他们在民初“西学东渐”的大潮下保存国粹、发扬国光的坚守，客观上承担了挽救文脉、兴废继绝的历史使命。

一、第一阶段（1904—1949）

西泠印社的创立，清末民国以来，吸引了众多倾心于金石篆刻艺术的艺术家的。这期间的主要印学活动，体现在印学文献的搜集与整理，为后来的印学研究提供了较为重要的资料支持。

西泠印社辑集的第一批文献史料来自丁仁、王褆、叶铭、吴隐四位创始人的捐赠，共 39 种 223 册印谱。其中吴隐捐《周秦古玺》等 31 函 145 册；丁辅之捐《西泠八家印选》等 7 函 62 册；王福庵捐《福庵藏印》1 函 16 册；叶为铭辑《广印人传》16 卷、补遗 1 卷，也捐出一套给印社。在四位创始人率先垂范之下，西泠印社相继得到手工精铃古代铜玉印谱数十种、碑帖类书籍以及金石著录、印学理论丛书、精选历代孤本善本印谱等，“编著的各种有关金石篆刻的工具书及参考图谱等不下数百种，对篆刻艺术的发展，直

接起到了承继和传播的作用”^[1]。“图书收藏范围也从印谱类向与印学相关的书法、文史、金石鉴赏等内容拓展，想方设法去征集海内外的印学书籍，目标是设想建立一个突出金石印学专业特色、内容丰富广博的图书机构，力图多方面地为学术研究提供便利。”^[2]除印谱图籍资料的辑集外，1921 年浙人募资 11270 大洋赎回“浙东第一石”汉三老讳字忌日碑，并筑石室永为保护，张钧衡、丁仁、吴善庆、吴隐、王震、叶铭等社员均为其中的参与者。

此外，印谱的铃拓与出版，也是早期印学活动的重要组成。吴隐编辑出版的著作有《周秦古玺》《遯庵印存》《吴石潜摹印集存》《缶庐印存》《吴让之印存》《钱胡两家印谱》《求是斋印谱》《赵次闲印存》《二金蝶堂印存》《遯庵集古印存》等，汇辑发行金石学、印学著述有《校碑随笔》《金石契》《竹素草堂金石丛书》《金石学录》《海东金石苑》《金石全例》《金石丛书》《篆学丛书》《遯庵印学丛书》等，编辑出版活动长达数十年，形成了以印学为中心的显著专业体系特色。^[3]

此外，春秋雅集、展览等补充形式，也是印社印学活动的独有特色。诸如 1913 年在西泠印社与日本同期举办的规模隆重的中日“兰亭纪念会”，当时在华的日本长尾甲、高漱惺轩、小栗秋堂等六人参加了西泠印社在杭举办的纪念会；1913 年西泠印社首次社员大会期间举办的藏品展览，展出各家所藏书画名迹多至三四百种^[4]；1915 年南社部分社员参加西泠印社雅集活动；1923 年西泠印社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举办地规模盛大的“金石家书画陈列会”，

展出自宋至清五百年间的书画精品 200 余件，并辑集出版了《金石家书画集》2 函 10 册；1933 年西泠印社成立三十周年纪念会举办了金石家书画陈列展览，编辑《西泠印社三十周年纪念刊》等。

二、第二阶段（1949—1979）

新中国成立后，西泠印社由政府接管，印社性质由私转公。在党和国家的重视和关怀下，西泠印社在孤山社址的修缮、文物捐赠、展览、学术研讨会、出版和国际交流等方面，面目一新，在印学研究上做出了很多实践性工作。

1956 年，时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文史馆副馆长、省人大代表张宗祥率先向省人大提交恢复西泠印社的提案。在浙江省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支持下，从 1957 年成立西泠印社筹备委员会到 1959 年由浙江省文化局移交杭州市文化局、成立西泠印社办公室，西泠印社组织机构、领导机制和活动方式逐步转变，在新的社会时代背景下渐渐显露生机。

1957 年，吴东迈捐献多件吴昌硕遗物，在观乐楼设置“吴昌硕纪念馆”；同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日本书道代表团访问西泠印社；1959 年，西泠印社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金石书画展；1962 年张鲁庵家属捐献印谱 400 多部、印章 1500 多方，社友高络园、王个簃、葛书徵等亦纷纷捐助文物。这些珍贵的印学实物资料，成为印社社藏的坚实基础，同时也为印社开展印学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

1963 年，西泠印社召开建社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吸收一批当时最著名的书画篆刻大家成为西泠印社社员；社员大会拟订了重振印社的全面规划；通过新社章，在印社“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宗旨基础上增加了“兼及书画”；选举产生了以张宗祥为社长的首届理事会。大会期间举办了创社以来规模最大的历代金石书画家篆刻展、捐献品展和现代金石书画展，展出珍品二千余件、明清以来篆刻家的原印四千余方；组织了以“篆刻史上的几个问题”和“西泠八家的艺术特点”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这期间，西泠印社还出版了沙孟海的《印学史》《沙邨印话》，叶潞渊与钱君匋合著的《中国玺印源流》和《西泠四家印谱》等，这些当代印学研究的万苦千辛之作，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在十年动乱中，西泠印社还先后组织举办篆刻书画创作

和作品展览活动近百次；1977 年以后编辑出版了《历代印章简编》《吴昌硕印略》《西泠印社藏印选》《西泠印社铜印选》《西泠印社胜迹留痕》《张宗祥藏印集》等大批印谱法帖和学术论著，行销海内外，为西泠印社学术影响的扩大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第三阶段（1979—2003）

这一阶段，随着印社活动的恢复正常，印学研究概念辨析与新观念新目标的提出，是此期的重要特征。改革开放、文化复苏，为西泠印社的复兴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地方党委和政府也对西泠印社的发展高度重视，从财力等方面给予西泠印社大力支持和保障。在秉承和践行“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宗旨的基础上，印社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关于“篆刻学”与“金石学”的概念辨析与建设“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目标的提出。

1983 年，在西泠印社成立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社长沙孟海先生在开幕致辞中，对篆刻学与金石学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从学科分类的角度出发，强调金石学侧重史学与考古，篆刻学属于美术门类，力主篆刻学自身的独立性。在 1988 年西泠印社建社八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上，沙孟海社长进一步指出，在国内外“以印聚社”越来越多的新形势下，西泠印社唯有紧紧抓住“学术研究”这一中心，并使之在国际上产生主导性影响，才能与西泠印社“天下第一社”的名望相符合，从而进一步提出了要把西泠印社建成“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的倡议。

此后，西泠印社围绕建设“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的发展目标，提出了一系列推进学术建设的重要举措：

其一，以逢五、逢十的社庆活动带动学术活动，每五年举办一次学术报告会或研讨会；建立健全国际印学研讨会运行机制，吸引社外乃至海外学者参与，壮大学术研究队伍，培养新生力量；

其二，成立印社学术委员会、社史委员会、编辑出版顾问委员会和工作审查委员会，作为社团工作的保障机制；

其三，完善国际书法篆刻比赛，建立“国际篆刻艺术评展”机制，扩大篆刻艺术的社会普及，培养艺术新人；

其四，提出建立印学体系的构想，包括篆刻创作、篆刻史、印论和篆刻美学等一系列专题；

其五，加强全国印学社团在学术研究、艺术创作上的合作交流；

其六，筹建中国印学博物馆；

其七，创办社刊，利用这一阵地发表学术论著、介绍印社藏品、金石书画新作以及国内外有关学术的动态；

其八，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学术交流，建立长期、稳定的国际联系，特别要加强与日本、东南亚各国间的联系，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向世界传播篆刻书画艺术。

观念的更新和举措的提出，为社团学术建设奠定了基础。印学研究以一种更加组织化、规范化的形式，走上了稳步运行的轨道。

（一）学术研讨活动的制度化。

从 1979 年起，每逢五、十周年庆典，西泠印社均举办学术报告会、学术讨论会，成为定律。如 1979 年西泠印社建社七十五周年纪念大会学术报告会上，沙孟海、启功、罗福颐、方去疾分别作了题为《试谈印学形成的几个阶段》、《对书法艺术的两点体会》、《对古印章的认识》、《明清篆刻流派简述》的学术报告。1983 年建社八十周年大会学术交流会，征集学术论文 27 篇，会后辑为《印学论丛》，这是西泠印社学术研讨论文第一次编印成集；至 2003 年“百年名社·千秋印学”国际印学研讨会已臻 225 篇，质量水平持续提升，规模从社内扩大到海内外，影响力得到极大提高。

（二）篆刻艺术展赛的常规化

从 1986 年起，西泠印社推出篆刻艺术评展，每四年举办一届，成为印社艺术活动，也是当代印坛创作领域的大事件。首届篆刻作品评展收到作品 2318 件，经初评、复评，共评出优秀奖 50 名，入选作品 200 件，在杭州举办了作品展览，并邀请获奖者和入选者参加开幕式和交流座谈，出版了《西泠印社首届篆刻评展作品集》；1990 年第二届全国篆刻作品评展，收到稿件 2000 余件，评出入选作品 200 件，优秀作品 50 件，并出版了作品集；1995 年第三届篆刻艺术评展收到作品 1220 余件，印蜕、边款 9000 余枚，评选出来自全国和日本、韩国等的优秀作品 50 件，入选作品作者 240 名，边款奖 7 件；1999 年第四届篆刻作品评展收到来自国内外篆刻爱好者来稿 1200 余件，印蜕、边款 8000 余枚，评选出优秀奖作品 50 件，边款奖 7 件，入展作品 201 件、入选作品 144 件，同时出版作品选集。

（三）从联展到巡展：全国印社组织交流的建立

在西泠印社八十五周年社庆纪念大会上，全国部分印社提出由西泠印社主持举办“全国印社作品联展”的建议。1989 年，召集全国部分印社举行联席会议，发出《关于举办“全国印社篆刻联展”的倡议书》，获得广泛响应。1990 年 2 月，“全国印社篆刻联展”共有 122 家印社参展，配套出版了《全国印社篆刻联展作品集》，之后又赴南京、武汉、郑州、西安、德州、沈阳、哈尔滨、呼和浩特等地，进行了历时一年的全国巡展。

（四）海外印学研究交流更趋密切深入

据不完全统计，1980 年至 2002 年间，有日本读卖新闻社“吴昌硕胸像赠呈访中团”致赠缶翁铜像（1980）；西泠印社与日本书法史研究会联合在杭举行首次中外学术交流讨论会，中日双方 100 余人出席学术交流会，中方钱君匋、刘江、陈振濂与日方梅舒适、杉村邦彦、鱼住和晃分别作学术报告（1987）；日本天溪会代表团就“吴昌硕、日下部鸣鹤结友百年纪念碑”立碑与揭牌（1990、1991）等事宜访问西泠印社；日本篆刻家小林斗庵先生在西泠印社百年社庆之际，将吴昌硕晚年所刻“西泠印社中人”原印赠予西泠印社。此外，为纪念吴昌硕诞辰 140 周年，西泠印社与日方合作举办了“吴昌硕艺术学术研讨会”（1984）；西泠印社还与日本书法史研究会，共同在杭州举行了首次中外学术交流讨论会等。

（五）创建中国印学博物馆

1995 年，中国印学博物馆首批款项到位，筹建工作启动，通过文物征集和社员、国内外热心人士捐赠，汇聚了一批珍贵的印学实物和文献。中国印学博物馆于 1999 年建成开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印学博物馆，较完整地展示了我国印章和印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为更好地开展历代印章、印学文献的收藏、展示、学术研究和交流创造了良好条件。中国印学博物馆的落成，为西泠印社实现“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目标、推动印学事业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六）打造一报一刊学术平台

1979 年《西泠艺丛》创刊号出版，这是一本研究金石书画，繁荣创作的综合性艺术刊物，以篆刻为主，兼收书法、绘画作品。1989 年，为进一步提升期刊的学术性，提高办刊质量，《西泠艺丛》进行了改版，安排更多学术研究内容和专版、专集。1985 年，《西泠艺报》创刊，登载社员、

书画家交流活动现状，介绍印坛先贤和当代名家、社员艺术成就，汇集文化新闻和印社文史资料。2002年，因报刊清理整顿，《西泠艺报》停止报型转型为《西泠通讯》。

在1998年召开的西泠印社建社95周年纪念大会和第十次社员大会上，第五届理事会在社团工作报告《继承传统 顺应时代 加快发展 让西泠印社以崭新的姿态迈入二十一世纪》中指出：“在跨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必须把学术研究作为头等重要的大事来抓，努力提高西泠印社的学术含量和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努力开创坚持印学研究为中心，金石书画综合发展的新格局。”自此，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作为西泠印社社团事业建设的两翼，进入了更具组织性和规范性的新阶段。

四、第四阶段（2003—2023）

跨入新世纪，为了顺应新形势发展要求，2002年，在浙江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和关心下，杭州市政府对西泠印社实施机构改革，调整西泠印社管理体制和机构，组建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作为杭州市委直属正局级事业单位，归口市委宣传部管理。隶属关系从文化局到宣传部的转变，使西泠印社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更加适应文化事业发展规律。

（一）新百年，新目标，新举措

2003年11月，西泠印社召开的第十一次社员大会，确定了建设“名家之社”、“天下之社”、“博雅之社”的新百年发展目标和今后工作的十项举措。建设“名家之社”，就是把国内外知名的愿意参加西泠印社的印学家、篆刻家、书画家、学者名流吸收为西泠印社社员，使西泠印社真正成为文化艺术精英的社团。建设“天下之社”，就是要以民族文化、世界文化的眼光来办社，巩固西泠印社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印学社团的引领地位，切实担当起印学研究中心的责任，使西泠印社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名社”。建设“博雅之社”，就是要在坚持“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的同时，积极适应新形势，拓展新领域，吸取其他艺术门类的元素，使西泠印社更富有兼容性与开创性，不断满足社会公众多层次的文化艺术需求。

（二）学术建设的平台拓展

百年社庆以后，西泠印社“学术立社”的观念在新百年新目标指引下，更加务实和深入。

首先，建立艺术研究室。从2004年起，先后组建了篆刻创作、印学理论与社史、书法、国画、鉴定与收藏、古诗文、肖形印七大艺术研究室，作为社团学术和艺术活动的专业平台。

其次，进一步打造学术活动品牌。2003年以后，建立起每三年一届“孤山证印”国际印学峰会，每年一场大型学术研讨，结合不定期的专题和纪念活动组织专题学术交流的多轮驱动新机制。经过十余年积累，西泠印社逐渐形成了独有的、在海内外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学术活动品牌——“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汇集了海内外印学研究领域的顶尖级专家学者，全面展示了西泠印社乃至国际印学研究领域的现有成果积累。

再次，恢复学术期刊。为迎接百年社庆，西泠印社恢复沉寂多年的《西泠艺丛》社刊，2004年改名《西泠印社》，以一年四期的丛书形式出刊。2015年1月，社刊恢复《西泠艺丛》刊名并正式出版。

（三）学术建设的新导向与新格局

在打造学术品牌、拓展学术平台的同时，西泠印社还通过加强学术规范，不断提升学术品格、提高学术质量。在此基础上，西泠印社在百十年社庆之后的十年间，更是站在“世界印章史”的视野下，倡导“学科交叉”、“文明交融”，提出建构当代“大印学”的新格局。

首先，对学术研讨会征稿主题进行了学术导向性设计；其次，是强调印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再次，是在每次学术研讨会的总结环节，在对论文评选过程的基本情况、出现的问题进行点评分析的基础上，对论文选题指向和研究方法提出指导意见。在学术研讨活动的组织方面，强调分类意识，以印学、书画、金石考据与版本谱籍、社史研究等为大类，再将印社之核心印学细分为古玺印、篆刻流派与人物、篆刻学与印文化、篆刻技法与审美四大类，合为七大类，同时包括古文字、鉴定收藏、版本典籍研究，以印学、篆刻学为主流，强调“诗书画印兼能”。

从新百年新目标的提出，经过十几年的探索与实践，随着学术品牌的树立、学术平台的拓展、学术质量的提高以及在海内外印学研究领域影响力的持续提升，西泠印社遵循沙孟海社长建设“国际印学研究中心”和饶宗颐社长“东学西渐”的引领，从“保存金石”到“重振金石学”、从“研究印学”到“打造国际印学研究中心”、从“兼及书画”到

“诗书画印兼能”，对社团学术建设从观念到实践进行了与时俱进的创新延展，以传统印学、篆刻学为基核，扩大视野，在以篆刻艺术创作、古典印学印史印家印作印派研究作为品牌基础上，向“战国玺印”、“封泥”、“汉玉印”等的多形式，“全印史”式交融。

新百年西泠印社学术格局的拓展和水准的提升，激励和鼓舞诸多社员在学术研究领域不断开拓和深掘，形成系列卓有建树的学术成果。诸如朱关田《唐代书法家年谱》《颜真卿年谱》《隋唐五代署书人墓志年表》《吴昌硕年谱长编》《吴昌硕纪年书法绘画篆刻录》，陈振濂《中国书法发展史》《中国书法理论史》《日本书法史》《书法美学》《民国书法史论》《中国画形式美探究》《篆刻艺术学通论》《西泠印社史研究导论》《宋词流派的美学研究》等，黄惇《中国印论类编》《中国古代印论史》，孙慰祖《封泥：发现与研究》《历代玺印断代标准品图鉴》《陈鸿寿篆刻》《邓石如篆刻》《中国印章：历史与艺术》《中国古代封泥全集》。西泠印社及社员近二十年的印学研究成就，代表了当代印学研究的较高水准。

回顾西泠印社创立至今的120年印学研究历程，创社之初先贤们提出的“学术立社”的观念，不仅贯彻于西泠印社早期发展的始终，更在新时期以来新的社会文化条件下不断推陈出新，从“保存金石”到“重振金石学”、从“研究印学”到建设“国际印学研究中心”、从“兼及书画”到“诗书画印兼能”，进而进一步向“现代金石学”延伸、向“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国家、世界印章史拓展——提出构建当代“大印学”研究新格局，实现了从观念到实践的与时俱进地发展、创新与超越。

【注 释】

- [1] 夏惠铭：《西泠印社六十年》，《浙江日报》1963年10月27日第4版。
[2] 王佩智：《西泠印社收藏史》，西泠印社出版社2015年版，第59、60页。
[3] 孙慰祖：《西泠印社社员在海上的早期艺术活动》，《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西泠印社出版社2006年版，第60—61页。
[4] 《西泠印社九十年》，西泠印社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传承 创新 突破

——试论西泠印社建社以来印学研究的三个阶段及其特点

文 / 张炜羽

2023 年，“天下第一名社”——西泠印社建社已 120 年，西泠印社社员在印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两个世纪以来，数代西泠社员因所处时代的不同、知识结构的差异、审美眼光的变迁、新出资料的支撑、研究方法的提升，对中国印章的认知既有传承，又有创新，更有突破。尤其是近四十多年来，印学（玺印篆刻学）已具备独立的研究内容、成熟的研究方法，加上经典性学术著作的不断涌现与学术研究队伍的日渐壮大，使其朝着独立学科的目标更近一步。

为了系统分析西泠前辈与当代学者的印学成果与特点，笔者将西泠建社以来的印学研究暂时分为前期（1904—1966 年）、中期（1979—2002 年）、后期（2003—2022 年）三个时段。

一、西泠印社前期（1904—1966）的印学研究

“西泠山水清淑，人多才艺”，为海内外印人研求

印学之地。印社创设之初不仅有诸多精于篆刻技艺的早期社员，也有不少擅长鉴别，娴于考证的印章收藏家。他们的印学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印章边款、印谱序跋、印学论文中。

1. 许多印章边款蕴含着篆刻家的印学思想，因数量繁多，在此仅以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俊卿）为例，他在“葺缶”印款中的“刀拙而锋锐，貌古而神虚。学封泥者，宜守此二语”，与“葛书徵”印款中的“方劲处而兼圆转，古封泥时或见之”等语，是通过个人大量创作实践后总结出研习封泥一路的不刊之论。

2. 晚清民国间古玺印与明清流派篆刻印谱的辑录与出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其中包含着黄宾虹（质）、吴隐（石潜）、叶铭（品三）、丁仁（辅之）、高络园（时敷）、葛昌楹（书徵）、张鲁龢（咀英）、方节龢（约）等诸多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的汗马功劳。印谱序跋自然也成为作者、藏家或同道阐述印学见解，发表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

在古玺印研究方面，像黄宾虹在《宾虹草堂藏古玺印》

序与《藏玺例言》，马衡（叔平）的《古玉印汇》序、《封泥存真》序等，均以专业的视角，谈史论印，成为近代古玺印、封泥研究的重要文献。

在明清流派篆刻研究方面，像吴昌硕、黄宾虹的《吴让之印存》题跋，与丁仁、叶铭的《赵搗叔印存》题跋，无意中参与了品评吴、赵二位篆刻大师艺术特色与成就的大讨论中，足资后人探讨。葛昌楹在自藏自辑的《传朴堂藏印菁华》《吴赵印存》《明清名人刻印汇存》等名谱中的序跋，对明清文人篆刻源流与递藏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 除印谱序跋外，发表在近代报纸、期刊上的印学论文与印学专著的出版，不仅可以充分表达个人的学术见解，其受众面较阅读印谱序跋者要宽泛很多。像社员叶铭（品三）1911 年出版的《广印人传》；钟以敬（喬申）1911 年前后所撰的《篆刻约言》；王个簃（贤）1924 年所撰的《个簃印愰》；方介堪（岩）1929 年在《蕙岭》杂志发表的《论印学之源流与派别》；黄宾虹 1930 年于《东方杂志》发表的《古印概论》；沙孟海（文若）1930 年于《东方杂志》发表的《印学概论》；马衡 1944 年于《说文月刊》发表的《谈刻印》；潘天寿 1960 年所撰的《治印丛谈》（初稿）；吴朴堂（厚龢）1961 年于《光明日报》发表的《篆刻的起源和流派》；唐醉石（源邨）1962 年于《湖北日报》发表的《治印浅说》；罗赤子（崇艺）1963 年所撰的《试论西泠四家的篆刻艺术》；钱君匋（豫堂）、叶潞渊（丰）1963 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玺印源流》；沙孟海 1963 年发表的《印学的发展》，以及 1964 年与 1966 年在香港《大公报》分别发表的《记巴慰祖父子印谱》《谈秦印》等。专业出版物中，《中国玺印源流》的上编从“玺印及其来历”论至“晚清以来的篆刻”，下编从古官私玺而下，对历代印式和文彭、何震至王昶（福厂）、齐白石（璜）逐一介绍，并附有大量经典印例，此类综合性印学专著在五六十年代印坛尚不多见。此外沙孟海以笔札形式的《沙邨印话》，涉及印史、印人、印谱、印论与印坛见闻等，还参入许多品评文字。譬如曾别出心裁地将吴昌硕、赵叔孺、易大庵、黄土陵四大家的印风以阴阳学中的四象誉之，称：若安吉吴氏之雄浑，则太阳也。吾乡赵氏之肃穆，则太阴也。鹤山易大厂之散朗，则少阳也。黟黄穆甫之隽逸，则少阴也。”成为

被后人不断引用的经典印话。

前期西泠社员印学研究的特点首先是媒介的拓展，即从传统的边款、印谱序跋延伸到报刊、专著，显示出印学逐步摆脱传统金石学附庸身份的趋势，并从早期篆刻概论一类普及性文稿，进入到对某一朝代印史、篆刻流派或篆刻家印风特征进行深入探讨的阶段。

二、西泠印社中期（1979—2002）的印学研究

西泠印社于 1979 年 12 月举办七十五周年社员大会，成为“文革”后印社活动全面复苏的标志。1979 年 2 月《西泠艺丛》和 1985 年 6 月《西泠艺报》的先后创刊，为社员及时发表学术成果提供了便利与渠道。在西泠印社百年社庆之前，五年一次的社庆活动中都举办印学研讨会，除了七十五、八十五周年未有论文集出版，其他三次社庆论文皆汇集成册。所不同的是自九十周年社庆始，论文集入编社外篆刻学者投稿的优秀论文。

此阶段老一辈社员的作品中如沙孟海《印学史》，罗福颐《古玺印概论》《近百年来对古玺印研究之发展》《古玺汇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徵存》，方去疾《明清篆刻流派印谱》《赵之谦印谱》等晚清六家印谱系列，王伯敏《古肖形印臆想释》，与中年社员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中国印学年表》《天衡印谭》《天衡印话》，马国权《近代印人传》，黄惇《中国古代印论史》，孙慰祖《两汉官印汇考》《唐宋元私印押记集成》《封泥一发现与研究》等印学专著、印谱的出版，以及陈振濂《论宋代文人印章的崛起及其表现》《〈啸堂集古录〉考》《论宋官印制度及其时代特征》等宋代篆刻史研究系列论文，加上《书法》《书法研究》《中国篆刻》等专业期刊和数届西泠印社印学研讨会上发表的诸多社员论文，形成了七十年代末以来印学研究的第一个高潮。

此阶段西泠印社社员印学研究的特点不仅对历代印学资料做了大量基础性整理工作，对中国篆刻史上两大高峰——周秦汉魏古玺印与明清篆刻流派进行系统梳理与研究，并对长期受到冷遇的唐宋元印章进行深入挖掘，重新评估其价值，使得中国篆刻发展体系更趋清晰与完整。这些学术成果具有前沿性、创新性，也对当代篆刻艺术创作的繁荣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三、西泠印社后期（2003—2022）的印学研究

自 2003 年西泠印社百年社庆始，西泠社员的印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西泠印社召开的历届国际印学峰会、学术研讨会，基本反映出二十年来我国印学研究的方向与成果。因学者济济，成果丰盛，在此不一一列举，仅将此阶段西泠学术研讨会的主要特点归纳如下：

（一）研讨会频次增加

首先西泠印社打破原先每逢五年一次社庆才举办研讨会的惯例，改为每年至少举办一次研讨会。经统计，自 2003 年“百年名社·千秋印学——国际印学研讨会”始，至 2022 年“大印学（2）——印学收藏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二十年间共召开印学学术研讨会 21 场，发表论文超 1080 篇。

（二）海内外论文作者增多

先前西泠印社学术研讨会，除了个别日本籍名誉社员、学者提交论文外，绝大多数为本土作者。而西泠百年后的各次研讨会，时有日本、法国、德国、美国、新加坡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学者专家携论文前来参会，他们的研究成果，令与会者开阔了视野，体会到海外学者不同的观察视角与叙述方式，有利于对自身研究模式与思路的改进。

（三）高校专家与学子的加入

近二十年来，随着国内高等艺术院校在注重书法篆刻教学发展的同时，积极引导一些学生做印学方面的研究。至今中国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等校的博硕导师已带出了一批专攻印学的年轻学子，所撰论文频频入选西泠印社历届印学研讨会，为印学研究梯队的建设提供了人才保障。

（四）设立专题的发展性研究

在 21 场印学研讨会中，设立专题的有 13 场，选题从宽泛的明清篆刻、历代印谱、金石学，到徽州篆刻、秦汉封泥、吴昌硕、陈介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等特定对象的研究。举办专题研讨，目的是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发掘的新材料，提出新观点、新论证，推进、深化已有的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

（五）域外印章的开创性研究

大部分西泠印社社员对世界印章史的认识是模糊、浅陋的，因此西泠印社特意为 2016 年、2018 年举办了两场非

汉字系统印章与图形印国际学术研讨会，引起印学界人士的极大关注。研讨会上学者们就域外印章的形制、材质、图案、文字等方面进行了研讨，成为西泠印社学术活动中一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研究。

四、印学研究的未来方向

西泠印社社员的学术研究范围目前已扩大到印史、印人、印谱、印作、论著、印材以及器具、社团、专业报刊，并从中国传统印章延至古代两河流域，可谓上下千古，包罗万象。若要对新时代印学研究的方向与方法做个预测，相信西泠社员们将立足于 120 年深厚学术积淀，努力做好多学科的结合，并充分利用强大的网络新科技，去实现前辈社员无法想象的目标。

（注：本文例举的学术论文与专著，均为作者加入西泠印社后所著）

【作者简介】

张炜羽：西泠印社理事、上海韩天衡美术馆馆长。

20 世纪以来印论发展背景下 西泠印社的印学研究意识

文 / 林 如

近代以来出现的“印学”学科名称，应包含学科的理论知识体系构成，包括史学、美学、教育、社会、技法理论和实践等多个方面。从技术型的篆刻（刻印）到一门知识、学问再到一门学科的概念，“印学”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我国印章和篆刻（刻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但是作为一门专门学问的研究，学界公认始于元代赵孟頫、吾丘衍辈，此后印论不断发展，常见于印章专著、史传札记、印谱序跋、论印诗以及篆刻作品的边款当中，与书画理论相比，印论起步晚，规模也有所逊色，但论述内容涉及面广，包括玺印源流的发展观、技法观、创作观、流派观、美学观、批评观等等，几乎涵盖了印章、篆刻研究的方方面面，作为一门印的知识、学问范畴得以确立。

一、20 世纪以来的印论研究特点出现划时代的变化

（一）印论的体例和叙述模式：从随笔散论到成系统体例的汇编、概论类著述

传统印论大多散见于印谱序跋、篆刻作品边款、诗文当中，随感而发，也有一些专述，涉及的有关印章篆刻的点比较丰富，但都是零散和不成体例的。比如《三十五

举》，清代有桂馥《续三十五举》、姚晏《再续三十五举》，民国有马光楣仿前者著录之《三续三十五举》^[1]，又如童大年《童子雕琢》跋、姚华《染仓室印集》序、王国维《印泥阐秘》跋等，延续古代印论的撰写模式，对刻印之取法、印材、印泥、封泥等都有所论述，虽都有独到之见解，但未成专门体系。

汇编类的著述体例从早期的无序编纂到有序分类编纂，也体现了著者印学思想的不断进步。清代顾湘就编有《篆学琐著》，又名《篆学丛书》^[2]，吴隐撰于 1921 年的《遯盒印学丛书》（又名《西泠印社印学丛书》），在《篆学琐著》收录印学文献基础上有所增补，共收印学论著成 17 卷 25 种，然其编纂没有时间顺序，也尚未形成明确的分类体例。1938 年劳笃文编纂《篆刻学类要》，是篆刻史上第一部类编性质的理论参考书。与同时期徐绍宋出版的《书画书录解题》首创按学理分类的书画类著作的分类体系有异曲同工之处^[3]，其类编方式是将篆刻理论文章进行拆分，分别按照文章中所述的内容进行归类，置于九大主题当中^[4]，而非对理论文章的整体框架体例和著述性质进行分类整理。1985 年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以时序为脉络，上自李唐下至民国，根据印论之性质分为四编，

^[5] 又附作者传略、书目概要和编者管见，相对先前类编著述，可谓创新之举。黄惇《中国印论类编》（2010）又与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编选方式不同，又重新回归以印论内容之特性和学理为分类标准^[6]，但20世纪30年代的《篆刻学类要》文字过于简约，而《中国印论类编》则更突出了学术自身的历史性和系统性，在印章审美的大框架下，互相融通、补充，是一部全面系统而富有学术性的印论汇编。

概论类著述如沙孟海1928年发表于《东方杂志》中国美术号上的《印学概论》，同时期也有黄宾虹《古印概论》（1930）、傅抱石的《刻印概论》（1937）、乔大壮《篆刻概论》（1947），20世纪后半叶有罗福颐、王人聪《印章概述》（1963）、罗福颐《古玺印概论》（1981）等等；虽然早期概论类的印学专著仍然比较偏重于技法和篆刻创作的介绍，但从体例上看，概论类的印学著作显然从偏重经验把握的零散的叙述发展为讲求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有一定框架的专门之学，它可以被认定是现代“印学”科学理论初步形成的标志。

（二）印论的内容：从侧重于技法和刻印经验之谈上升到讲求方法论的学科系统框架下的印学史学、美学等专门研究

20世纪上半叶的印学理论，基本没有跳出古代印论的研究范围，直到后半叶，在“方法论”和“学科”意识的关照下，印学概论类著述、史学专著、美学专著、教育专著、技法专著、篆刻批评、个案研究等等开始不断涌现，作为一门印学“学科”的框架内容才渐渐清晰起来。

早期以如钟以敬《篆刻约言》、马光楣《三续三十五举》等叙刻印之法的印论居多，虽然也有像吴贯因《东西印章之历史及其意义之变迁》涉及东西印章发展史、实用印章之源流功能等研究内容；王光烈《印学今义》包含取法、形制、派别等在内的内容，也有像杨钧《论刻印与刻印诀》这样的貌似谈论技法却涉及篆刻创作观、审美观、流派观的理论著述，但是论刻印相关之法还是占据主要的叙述内容。早期也有一些内容较为宏观的著述，如徐天嘯的《余之印话》，涉及篆印之关系、鉴藏、审美、流派、历史发展、印章之生存状态、印谱编辑、品评诸论，然叙述顺序较为随意，并未凸显其研究方法。孔云白《篆刻入门》（1936），虽有一定的框架，也涉及印章的发展和流

派甚至有印论的选编，但是观其内容，是知识普及介绍性的、作为篆刻入门的一部实用性教材。

20世纪下半叶的印学理论已经逐渐凸显出明显的方法论和学科体系框架，在专题研究上也更为细致和深入。虽然有些以“学”命名的理论著述与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概念名不副实，并不具有印论史料价值，也不关心印论发展史，如邓散木《篆刻学》（1979）作为篆刻讲义，与孔云白之《篆刻入门》体例、内容无甚区别，但也出现了很多在研究方法上焕然一新的印学论著。如20世纪60年代钱君匋、叶潞渊的《中国玺印源流》、沙孟海1981年发表的《印学形成的几个阶段》、1962至1984年完成的《印学史》，此后陈振濂《篆刻艺术纵横谈》（2017再版定新名为《篆刻艺术学通论》），韩天衡《九百年印谱史考略》、黄惇《中国古代印论史》等等，都从印学历史发展的特征上给予关照，从篆刻史学、美学、印章美学史、方法论、个案研究及考证、鉴定诸方面，充实了20世纪印学研究的框架，为印学学科框架的逐渐完善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西泠印社在20世纪以来印学理论研究方面的引领地位

作为全程参与、见证20世纪中国印学发展的西泠印社，活跃于整个20世纪篆刻界、印学理论界的印学家们，几乎都是西泠印社中人或与西泠印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说，西泠印社的学术研究成果、视野和格局更是引领了20世纪整个时代的风向，带动了中国印学史的不断向前发展。早在1913年，西泠印社召开第一次社员大会，就在会上宣布了“保存金石、研究印学”这样高屋建瓴的印社宗旨；到了20世纪80年代，沙孟海社长又提出“打造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的学术目标，21世纪以来，饶宗颐社长提出要以西泠印社为学术高地，开启“东学西渐”的新征程，将印社的学术目标置于放眼未来影响世界的新高度。一百多年来，印社同人始终奉行不断传承这一一脉相承的宗旨，并且发展创新，开拓印学研究领域，使其更上一层楼。通过梳理一百多年来西泠印社的印学研究发展趋势和各个阶段的成果，我们可以归纳出几个特点。

（一）从篆刻（刻印）理论到“印学”理论的发展
篆刻（刻印）理论也即偏重于实践操作的技法经验理

论。民国时期的印论，大部分以篆刻技法和治印心得、创作经验为主，西泠印社中人不例外。比如钟以敬《篆刻约言》谈篆刻技法中的篆法论、创作论；唐醉石《治印浅说》以白话文的叙述方式从三个方面对治印的书法、刀法、章法进行解说，是其对篆刻艺术创作实践的心得之作；童大年《童子雕琢》跋亦侧重刻印之法；邓散木《刀法辟谬》则主述用刀之法；王世（菊昆）之《治印杂说》虽开篇部分有关印章发展源流、印制的简要叙述，但大部分内容则为刻印之法，亦为篆刻教学之用。

民国时期西泠印社中人的印论研究，除技法理论外，也有少量的印学著作，像黄宾虹《周秦印谈》，述印史、考证印文文字、论玺印形制，已有深厚的学术价值。印论汇编有吴隐撰于1921年的《遯盦印学丛书》（又名《西泠印社印学丛书》），印人汇编有叶铭《广印人传》。较为系统的、具有印学理论框架的著作有如王个簃《个簃印旨》等^[7]，印学概论类的著述则有沙孟海、潘天寿、黄宾虹、乔大壮等人的著述。尤其沙孟海《印学概论》一文，以印学史演进的立场，提出以实用为主的“创制时期”和以艺术为主的“游艺时期”两大阶段，最早开创性地梳理了实用印章和文人篆刻艺术两大发展脉络，对后来的印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沙孟海1962至1984年完成的《印学史》在20世纪20年代《印学概论》的体例基础上，明确分上编“印章旧制”和下编“印学体系”，以印学历史发展为序，以出土文物和史籍文献为证，推陈出新，其印学观念至今仍被印学界奉为圭臬。

新中国成立以后，西泠印社的印学研究逐渐向更广泛的学术领域发展，20世纪60年代有钱君匋、叶潞渊的《中国玺印源流》，20世纪80年代以后如罗福颐《近百年来古玺印研究之发展》、韩天衡《九百年印谱史考略》、孙洵《民国篆刻艺术》、黄惇《中国古代印论史》、陈振濂《中国印谱史研究》等对于篆刻史、理论史的研究；篆刻美学方面的关照则有陈振濂《篆刻美学导论》等；个案研究和考证、鉴定方面，有罗福颐《西夏官印汇考》、刘江《吴昌硕篆刻艺术研究》、叶其峰《古玺印与古玺印鉴定》、陈振濂《关于印谱的创始者》等；篆刻高等教育有陈振濂《大学书法篆刻教程》《篆刻形式美学的展开——大学篆刻艺术形式与技巧的专业训练系统》，首次提出并清晰勾勒出高等篆刻艺术教育的学科内核与外延，与早期篆刻教

材注重实用性的实践操作和经验之谈不同，其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学科框架和内容，在篆刻教育史上画下浓重一笔。

篆刻的小众性使其不像美术、书画有大平台的驰骋空间，从事研究的人才也比较少，篆刻理论研究多流于工匠式的经验叙述而缺乏学理意识，早期的西泠印社同人们就已经超前意识到印学理论体系构建的重要性，并不断付诸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泠印社中青辈的印学家们更是在老一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与时俱进，思考学术界“方法论”之大讨论，在印学史、篆刻美学、美学史诸方面逐渐构建和体现出20世纪以来印学理论中的学科意识和框架，如果说至20世纪末，大部分的印学理论研究成果还未能达到与其他艺术学科那样有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构架，如篆刻美学研究大都还停留于篆刻欣赏层面而未进入诸如主客体、时空观、形式与内容等讨论的美学研究系统框架之中，那么进入21世纪以来对于印学研究视域的扩大、学科定位的准确性则逐渐得以显示，这有赖于西泠印社始终奉行的“研究印学”“打造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的学术宗旨，才能引领篆刻艺术、学术大发展。

（二）从单一的印学研究到金石学视域下的“大印学”研究

古代玺印从材质上讲本就属于金石范畴，从玺印的先篆后刻上讲，与古文字的发展演变也是息息相关，学者们也意识到对玺印的研究离不开金石学、文字学的支撑，因此与印相关的金石文字研究亦常有涉及，如古印文考释、印文辑略、印篆文字研究等等。但综观20世纪的印学研究，主要还是聚焦于印史、印人、印谱、印技、印章美学、玺印考证等方面，21世纪以来，印学研究的范围逐渐从局限于传统印学的话题范围中延伸开来，对原有的传统印学的理解深化，领域逐渐扩大，慢慢切入大印学范畴中来，表现在对金石书画与鉴藏的研究、碑帖学的研究、金石传拓学的研究等等，印学研究的外延和内涵也跟随着时代逐步发生改变。这从西泠印社20世纪末期的国际印学研讨会论文主题到21世纪以来的国际印学研讨会、国际印学峰会研讨主题范围的不断生发中可窥一斑。

从2009年西泠印社国际学术研讨会“重振金石学”主题的提出，西泠印社开始主导印学研究向金石学视域下的“大印学”领域延伸，包括金石学纵论、铭文碑帖研究、金石著录研究、金石家研究等。至此，每年的国际印学研

讨会和三年一次的印学峰会，几乎都有开辟金石研究专栏，金石与名物、金石铭刻（文字）与谱籍研究、金石书画与鉴藏研究、金石全形拓研究、两宋金石学与印学等等，在“坚守”传统印学研究的同时，重新建立起“金石学”这个既旧又新的领域和学问，从过去狭小的传统研究范围跨入更大的学术格局当中。

（三）从印学延伸到“印文化”领域的学术视野

相比早期印学理论研究关注于刻印技法和简要叙述印史，而相关印篆、印制的叙述也基于实用刻印的格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已经开始站在学科的立场，把视野放诸更广阔的文化层面上。1983年完稿的陈振濂《篆刻艺术纵横谈》^[8]就事先设定其明显的学术结构，以“印学”的学科立场，以篆刻作为艺术的审美立场出发，以形式为主导，与以往印论中对印制、印谱的一般叙述和关照不同，而是以社会传播和“印文化”的角度和视野来审视其对印学研究的意义，进而对社会文化应用环境产生的影响。

21世纪以来，西泠印社的印学研究更是将印学置于大文化、世界文化史的范围中进行探讨，比如“篆刻文献学”的建构、印学观念史的研究、印谱文化史、印学收藏史、古印文字史和域外印章文字的探讨、玺印文化的传承和印文化的域外传播等，尤其是近年来以世界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世界图纹与印记为视点，将印学研究扩展到对世界印章和印文化的关照，中国印章跨出国门，与世界印文化相接轨，正朝着“东学西渐”的目标迈出步伐。

三、印学研究特点及研究视野变迁的原因

（一）印学著作模式和体例受古代印论传统模式和新史学、美术史著叙述新模式的双重影响，同时出现了散论、札记类的印论，也出现了西学模式下的印学史著类、概论类以及以“印学”学科名称命名的著作。因为印章和篆刻属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特有的产物，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必然不像美术、绘画革命来得如此决绝，因此虽然早期有些印论以新式的“印学”“篆刻学”“印学史”等学科名称命名，但名不副实，实际上还是以介绍印章之发展、谈论篆刻创作之经验为主体。略有不同的是，民国时期有部分印论也不完全是随感而发，而是开始有了新式的体例和框架，如述史、形制、技法、

品评等方面共同构成印学理论的整体框架，这比传统的散论模式印论着实前进了一大步。当然，因为篆刻的小众化，无法与美术史著的西式化进程相提并论，哪怕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美术界进行轰轰烈烈的“方法论”大讨论之时，大部分的印学著作还是基于实践的经验之谈，自娱自乐，或者虽然已有印学发展之史观、美学定位之思考，但还是很难在美术领域的大平台上占有一席之地。而西泠印社领衔的以沙孟海先生“打造国际印学研究中心”为宏伟学术目标的努力，以及21世纪以来的“西学东渐”“重振金石学”“大印学”，正是带领印学研究往更高平台和视野的学术目标上不断前进。

（二）篆刻的实用功能导致其实践操作性比较强，因此技法解说类的印论占据主导地位，篆刻理论常常流于工匠的经验叙述而缺乏学理意识。技术虽然有难易高下之分，但若以实用为出发点，依赖的是经验和技术操作的熟练程度。从古代印章的实用功能上来说，它的确是属于一种技能，尽管它立足于传统文化这一特殊载体之上，尽管经验的判断和操作的熟练也需要有效的方法，但是技术研究与学术研究的在逻辑思维与抽象观念统领下对研究对象进行理性阐述、分析推理，以及总结历史发展规律和事物本质的探究目的、宏观构建上显然不能相提并论。因此，对于印章实用观念的认识，导致了在研究模式上自然偏重于技术性操作内容，在研究方法上，大都是零碎、片段的刻印经验总结，很少能够上升为专门的、系统的学术理论。

（三）篆刻理论家的身份和知识结构差异。篆刻理论家大多为篆刻实践家，善于从篆刻艺术本体的立场研究篆刻，篆刻艺术创作往往是篆刻家们最为关注的视点；而少数文字学家、金石学家、考古学家以古文字、考据立场来研究篆刻，则更为关注玺印文字的考证和发展流变，如裘锡圭《浅谈玺印文字的研究》、何琳仪《古玺杂识》、马承源《古玺秦汉印及其余绪》等等。此二者之外，如黄宾虹、容庚等作为金石篆刻文字学家、理论与创作兼具者，研究的视角则兼容二者，更为广阔。如黄宾虹《周秦印谈》，既有考证印文文字又有叙述印史的内容；容庚《雕虫小言》，既有对印章文字的详细阐述，又对流派印章史有所关注。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的学科体制下的高等教育篆刻专业，则逐渐具有科学性、体系化的专业研究方法和视野。因此，印学研究的特点也因为研究者的身份和

知识结构差异，在研究方法和关注内容上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丰富了印学研究的方法和内容。

（四）早期印学学科起步和独立比较晚，后期的框架和视野则更大。早期印章篆刻依附于古文字、书法和金石学，没有呈现出较为独立的学科意识。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马衡先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虽然指出了金石与篆刻的概念并不能等同，但他还是认为金石学可以独立，而篆刻学必须依附于金石学，当然更没有提出篆刻学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美术学门类：“刻印家欲知印之源流、沿革、形式、文字之变迁，应先研究古印自属当然之事。即以文字源流而言，不但古印应研究，即一切金石文字也在研究之列。故金石家不必为刻印家，而刻印家必出于金石家……”^[9]我们看到在早期的印论中，会有大篇幅的金石篆刻文字发展和运用的解说，会有篆书发展史的叙述，而早期西泠印社中人也会自谓金石学家，以金石家身份自居。

到20世纪80年代篆刻才作为美术学科中的一个门类，正如沙孟海先生的观点：“金石学是史学、考古学方面一门学问，篆刻学是美术方面一门学问，两者虽有联系，但不是一物……篆刻学是一门独立的艺术，有它自己的学术地位，不需要再顶金石家的‘老招牌’。”^[10]沙老站在现代学科概念的立场上提出这番言论，篆刻归到艺术学科中来，使其研究方向定于形式美学等方面，篆刻作为一门美术学科性质得以确立。作为美术学科的独立是学术分科的必然趋势，但是又因为早期篆刻属于金石文化的这一属性，使得西泠印社后来的印学研究在印的专业意识的立足点上超越印学、提升印学。如果不是因为在传统的观念中，认为“篆刻学”等同于“金石学”，“篆刻”是“金石”的一部分，西泠印社就会沿着印学单——条道路发展下去，可能很难在更大范围的学术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可能也就没有了后来丰富多彩的“大印学”的思路和内容，在金石领域乃至更大的文化领域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

【注 释】

[1] 马光晷《三续三十五举》云：“汇平日所见所闻，条次为篇，仍合三十五之数，名曰‘三续’。多事赘言之讥，盖所知不免云。”民国18年（1929）花石馆木刻红印本。

[2] 清顾湘编《篆学瑣著》，又名《篆学丛书》，成书于1840年，共收录

篆学论著三十种。

[3] 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全书设置史传、作法、论述、品藻、题赞、著录、杂识、丛辑、伪托、散佚十类。

[4] 九大主题分别为：学古第一、体裁第二、摹篆第三、章法第四、刀法第五、神韵第六、通论第七、边款第八、拓印第九。

[5] 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分印学论著、印谱序记、印章款识、论印诗词四编，印学论著四十四家、五十篇；印谱序记一百零八部、三百三十六篇；印章款识十八家、五百二十二则；论印诗词六十二家、二百四十九首。

[6] 黄惇《中国印论类编》以论印章源流沿革、论流派印人、论印谱、论印章审美、论篆刻创作技法及印材工具五类汇集了历代印论，又以印论作者传略、篆刻家、印论作者索引等角度加以细致分类，对历代印论重新进行了整理、点校、考证。

[7] 《个簪印旨》，南通市个簪艺术馆内部影印本2013年版，其虽不以印学或概论名称命名，但其中内容已涉及印学史、篆刻美学、篆刻技法、篆刻艺术批评、篆刻材料选取和制作等方方面面，颇具印学概论之规模。

[8] 2017再版定新名为《篆刻艺术学通论》，内容包括：印式、印篆、印技、印学、印家、印史、印谱、印制、印语九十章。

[9] 马衡先生在1944年发表于《说文月刊》的《谈刻印》一文中所述，参见《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西泠印社出版社2003年版，第332页。

[10] 沙孟海：《沙孟海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版，第638页。

【作者简介】

林 如：西泠印社社员、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美术系副教授。

20 世纪以来印学研究之流变与未来方向刍视

文 / 朱 琪

西泠印社建社已经 120 周年了。自西泠印社成立以来，印学研究（对实用古玺印与篆刻艺术的研究）对印社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指引作用。或者也可以说，20 世纪以来的印学研究史，与西泠印社的历史发展密不可分。这与西泠印社建社之初，就订立学术立社的原则有关。“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这一宗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引领了西泠印社发展壮大方向轨迹，而西泠印社所作出的学术贡献，也成为 20 世纪以来印学研究的坚实主体。

一、西泠印社建社以来的印学研究流变

总的来说，西泠印社建社以来印学研究大致经过这样几段时期：

（一）晚清民国——以印谱与印学书籍编辑出版为代表

第一阶段自西泠印社建社至新中国成立前，正值西学东渐，印刷技术进步时期，铜活字印刷、照相制版、石印、锌版制作等新的印刷技术盛行。在产业技术鼎革之际，丁

三在、丁仁等首创的“聚珍仿宋体”铜活字，先后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合作，风行一时，并运用于印学图籍的出版中。同时，以锌版制作印模印制印谱，也在吴隐创立的上海西泠印社的经营业务中占据很大比重。除不是原印铃拓以外，这类印谱其实际效果已经非常接近原石铃拓，在当时印人的鉴赏学习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辑录各家藏印，有王福庵《福庵藏印》、浙西四家《丁丑劫余印谱》、丁仁《西泠八家印选》等、吴隐《潜泉印丛》系列等。虽然制作方式不一，但西泠印社及社员制售的印谱，无疑成为当时篆刻界主流产品。

印社成员还十分注重印学书籍的出版。王福庵撰《作篆通假》，是有关篆刻创作的重要文字工具书。叶铭有感于《印人传》《续印人传》失载印人甚多，乃广于史传志乘、私家笔记中爬罗剔抉，撰成《再续印人传》三卷、《补遗》一卷，于清宣统二年（1910）付梓行世，共收录印人六百零四人。

此外，在新学风的影响下，社员重视印学丛书的编纂。叶铭辑周亮工《印人传》、汪启淑《续印人传》及自己所著《再续印人传》成《叶氏存古丛书》，并为三书编制索

引，以便检索。是为“印人”传记研究的专门丛书，于清宣统二年（1910）由西泠印社石印出版。随后又于清宣统三年（1911）修订增编为《广印人传》十六卷、《补遗》一卷，收录印人一千八百余人。《广印人传》虽同以“印人传”为名，但在艺术思想的深度上远不及周、汪二著，不过作为检索印人资料的工具书，十分具有实用价值。我们知道《印人传》经过了《再续印人传》到《广印人传》的演进，所以这个过程也是经过深思熟虑、不断改进的过程，也代表叶铭学术的进步轨迹。

此后较为重要的汇集明清印学论著的丛书还有吴隐编辑的《遯盦印学丛书》，西泠印社 1920 年出版。全书十七卷，二十六册。计有文彭《印史》（伪托之作，实为甘旸所著《印章集说》），万寿祺《印说》，沈野《印谈》，汪维堂《摹印秘论》，朱象贤《印典》，陈克恕《篆刻针度》，冯泌《印学集成》，阮充《云庄印话》，冯承辉《历朝印识》《国朝印识》，王之佐《宝印集》，陈澧《摹印述》，叶尔宽《摹印传灯（附紫泥法）》，董洵《多野斋印说》，魏锡曾《绩语堂论印汇录》，姚觐元《三十五举校勘记》，叶铭《叶氏印谱存目》，王世《治印杂说》。吴隐在民国年间编辑出版印谱、书籍多达数十种。《遯盦印学丛书》着重收录《篆学琐著》之外清代与时人印学论著，其中不少著作版本稀见，保存印学之功不可没^[1]。

（二）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复兴前——以沙孟海《印学史》与书法篆刻高等教育体系确立为标志

第二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复兴前，西泠印社在这一时期固受各方面因素影响而蛰伏，虽然在印学上的建树不多，但沙孟海社长的《印学史》却闪耀着璀璨光辉。《印学史》撰写于 1962 年春，正值百业待兴之际，沙孟海先生秉承“研究印学”的传统，以印章为核心，把整个印章之学的历史研究划分为“印章旧制”和“印学体系”（而非习见的明清篆刻）两部分。就像陈振濂先生评价的，沙先生一方面是从社会政治与文化制度来讨论实用玺印的形制、功能、用途、沿革等，另一方面是他以个人的参与行为（“人为”）脉络去探讨篆刻艺术的产生和相关学术的发展。^[2]两者结合成一个既全面又前后相接的科学化研究体系。所以《印学史》的出版，实际上标志着印学研究进入到正式的学科体系。我认为，沙先生撰写

《印学史》是与 1963 年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首度设立书法篆刻专业难以分割的学术与教育行为，“书法篆刻”并列而非单一的“书法”作为专业名称也隐藏地体现着西泠印社与浙江美术学院的学术关联，因此我把《印学史》与“书法篆刻专业”创立一起视为现代印学研究的起始。

（三）文化复兴以后——以西泠印社出版社、中国印学博物馆、社刊《西泠艺丛》及印学研讨会开展为标志

1978 年西泠印社出版社成立，出版社延续西泠印社早期学术出版事业，以广大擅长金石书画的社员为资源纽带，四十余年间编辑出版篆刻、书法、绘画等书籍千种，尤其对印学传播作出重要贡献。

其次是展示、捐赠和研究。社员捐赠是西泠印社学术发展的重要推动，从早期丁仁捐献私产用作社址开始，此风延绵不断，新中国成立后王福庵、张鲁庵、葛昌楹、张宗祥及广大社员均有不少重要捐赠，这也汇集为西泠印社的文物收藏，为印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1999 年，中国印学博物馆在赵朴初社长力促下成立。印学博物馆是首家专业印章文物资料展陈单位，辟有历代玺印厅、篆刻流派厅、西泠印社社史厅等，以历史演变和印学发展为脉络，陈列了各个时期不同的印章种类，其中有不少藏品为各个时期或流派的经典之作。这种常年的展示宣传，以及多个临展、特展的举办之功，实不可没。

2003 年，西泠印社社委会成立，设立艺术创研处，在韩天衡、孙慰祖、朱关田、陈振濂等先生引领下，定期开展印学学术层面的研讨活动。目前已经以印社为学术交流平台，举办了 20 多次（国际）印学研讨会，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印学研究者参与，培养了大量的印学研究人才。

《西泠艺丛》期刊创刊于 1979 年，是印社重要的学术刊物，是社员学术研究与交流的重要媒介。《西泠艺丛》至 1987 年出版共 17 期停刊，1989 年 1 月复刊至 1992 年 5 月出版到 31 期再度停刊，1996 年 12 月复刊至 2001 年 6 月出版到 36 期又停刊。2004 年更名《西泠印社》，以书代刊形式发行，每年 4 期。2015 年重新更名《西泠艺丛》作为月刊正式发行至今，并正式收录于中国知网学术论文检索体系，是现代独立的印学研究成果正式纳入科研体系的重要标志。

二、新时期印学研究的现状与思考

（一）研究现状

1. “大印学”观念下印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与领域的拓展

其实在“大印学”没有正式地揭示之初，已经可以看到这种观念意识的苗头，比如之前西泠印社提出的“重振金石学”主题，从古玺印和明清篆刻扩大到金石、域外印章、图形印等各领域，这本身就是一种研究视野的扩大化。另一方面，关于印章的衍生主题，如封泥、印谱、印文化、鉴藏史等，都是当下印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2. 学术展览、研讨、出版的推动

学术性展览、研讨和出版的推动作用，也是巨大的。西泠印社或主办或协办的一系列重要展览，在学术界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如“临淄新见战国两汉封泥展”“戎壹轩藏秦系陶文专题展”“宋韵文化系列展览”等，对学术研究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此外由创研处主办的每年一次的学术专题研讨会，以及三年一届的“孤山证印”国际印学峰会，每会必有相应的论文集正式出版，十多年来集成了厚重的学术成果，成为学术立社的根本。

3. 印学研究人才的吸引

西泠印社对各地印学研究人才有着重要聚集作用，随着研讨会评奖制度的确立和完善，设立了论文评奖以及评奖入社等环节，对广大青年学者的激励作用是巨大的。

4. 国际学术交流的开拓与影响

西泠印社的学术研究视野并没有仅仅聚焦在本土化的研究层面，而是涉及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比如美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地，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都有作者参与研讨会进行学术研讨。

现阶段西泠印社学术研究取得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是研究成果的丰富和细化。新时期以来，印社组织与社员个人出版了各种的论文集、专著、教材，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这些都是西泠印社社员的学术贡献，研究层次也非常丰富。

第二是研究规范的提高。早年的一些研讨会论文集，常有一些印学知识普及、回忆录、经验杂谈等类型文章。近年来在论文规范上的进步巨大，是有目共睹的。就笔者

担任论文评审过程来看，投稿论文需要经过三轮专家评审，以及知网机检查重。不符合学术规范的论文，根本无法进入到论文复评与评奖环节。这也促使投稿者必须注重学术研究的规范性。

第三是研究层次的提升。随着学科发展，印学研究从边缘化的、冷门的研究，逐渐上升到较高的层级。社员的研究成果能够获得国家级基金支持与重要奖项。比如林如的“20世纪中国篆刻与西泠印社之关系研究”、朱琪的“清代篆刻理论研究”等。孙慰祖《孙慰祖玺印封泥与篆刻研究文选》、朱琪《真水无香：蒋仁与清代浙派篆刻研究》等专著获得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理论方向奖金奖、铜奖等，都显示出篆刻研究取得的成果，并不输于书法学理论研究。此外，还有不少印学专著获得国家出版基金等高层次的出版资助。

第四是标志性学术成果的取得。这其中包括了像沙孟海先生的《印学史》，他的研究理念与框架体系，重要性如前所述。韩天衡、黄惇先生的“印论”研究，孙慰祖先生的“玺印封泥”研究，陈振濂、王佩智先生的“西泠印社社史”研究，林乾良、朱琪的“西泠八家”个案研究等，都是相当重要的标志性成果。

当然，现阶段的学术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第一是研究规范的提高。虽然研究规范的问题近来已经有很大提升，但是在原创性方面，依然存在薄弱之处。其中也包括存在着一些低质量的快速拼凑论文，我觉得这是需要警醒的。在印学这种学术外延并不广阔的研究领域，尤其在 AI 与 ChatGPT 背景下，很容易在无需广泛了解前人研究的情况下，快速拼凑论文，进而在论文评审中浑水摸鱼。另外一种现象也出现过，即所谓的“抄袭”，还有一些不规范的引用，包括有涉嫌洗稿的行为。

第二是要注意避免重复研究。比如一些经典的议题被反复论述，这其实也是篆刻学科研究的范围小、内容不够丰富造成的。但归根结底还是研究者的视野不开阔，对前人既有研究了解不足，这种低质量研究恐怕还会长期存在。

第三是重要印学问题的突破性研究不够。现在的印学研究力作还是不太多，具有研究方法上的开拓性的成果还很欠缺。还有印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的解决，也有不足。一些问题的关键点，以及长期困扰的老大难的问题，因为本身资料的缺环目前尚难以解决。

第四是与其他学科的融合还不够。其中包含的，一是印学研究者对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掌握程度，二是印学研究成果被其他学科门类的接受程度。目前看，虽然“大印学”概念已经提出一段时间了，但是如何去做大做强，完善我们自己的印学研究的架构，以及让其他的学科去接纳甚至参与进来，恐怕还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

三、印学研究的未来方向

（一）研究方向展望

印学研究的未来方向是一个具有未来感的议题，在西泠印社建社 120 周年之际讨论它，说明印社的主导者们思想从未僵化，没有因为背负厚重历史而沉湎于过去。所以这个未来感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关于印学研究的展望。以拙见论述如下：

首先是增强古玺印研究和篆刻学研究之间的联系。长期以来，古玺印研究与篆刻艺术研究是各自为政的，如何去进行整合，能否找到一个适当的契合点，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现在看来古玺印研究与历史、考古、地理、文字的联系非常强，这可能对印学研究或者篆刻学科的构建和发展有不利之处。传统学问中本来有一门“金石学”，维系着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现在传统金石学又被现代学科体系拆解掉了，那么如何加强实用玺印与篆刻艺术之间的关联性，使两者能真正贯穿联系成一个整体。因为现在习见的一个问题就是研究古玺印的不太关注篆刻，研究篆刻的对古玺印也有隔阂，所以如何去加强这种关联，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里带来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有待解决，那就是关于一些学术概念的再界定，比如说印学、篆刻学、金石学的联系与区别，还有所谓的明清流派印章、明清流派篆刻、文人篆刻。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其实比较含混，如何去把它再厘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不然就会出现一种学科命名上的混乱，但是目前相关的深入讨论几乎没有。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必也正名乎”，我觉得有必要展开一次大规模的讨论，也许这种讨论并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相信会厘清一些问题的边界。

其次是关于印学研究体系的建立，以及学科分支的完善，还有新方向的拓展，我觉得这也是需要同人去努力的

一个重要的方向。这个体系中包括哪些分支，建立程度又如何，现在也不明确。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这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但目前大家似乎又没有能力解决，所以说，120 年来我们恐怕仍处在这个学科发展的初级阶段，要做的事还有许多。

第三是篆刻艺术的理论研究，亟须进行学术化、体系化、普及化，及时总结当然是必要的，任何阶段都允许进行总结，但只有前期积累到位且有突破性发展之后，总结才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另外就是体系化与普及化的问题，印学理论体系化问题前面涉及了，完善需要众多学者努力。理论普及化的问题现在彰显出来，比如对印论的讨论和利用不像书论、画论那么普及，不利于广大爱好者与研究者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印学理论的宏博与独特之处^[3]，所以这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

第四是对篆刻艺术原理的深入探究和科学化，这其实是跟篆刻美学联系在一起的。印学研究同样需要寻找一种既立足于传统艺术理论，又能够借鉴西方美学的一些研究方法，进行新时代的一种阐释，保证它的继承性、民族性，保持中国艺术的本质精神，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去探讨的一个重要的方向。特别在篆刻美学这样一个领域，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探索空间。

第五是印章与书法、绘画等传统艺术形式，以及与古代文献的有机联系。我在《新出明代文人印章辑存与研究》一书中，曾经提出过“印迹学”的概念，它可以超脱于印章实体，而对历代遗留印迹进行科学研讨，比如经卷、书画、古籍善本、碑刻、历史档案当中，都有这种印记的留存。这方面研究其实一直在进行中，比如对书画鉴定中的印记研究，越来越细致、科学，并且与艺术史的勾连也很强。寻绎其中的研究方法，进行科学、系统的考察，真正打通印章、书法和绘画等其他载体形式之间关联，这将是印章进入艺术史研究领域的未来重点。

（二）研究方法展望

在印学研究的方法上，如何去面向未来，有这样一些地方值得注意。一是新材料的发掘，比如现在考古学的繁荣，大量新出土的印章资料如何进行利用，这方面印学研究者的表现是滞后的。再如当下古籍整理出版非常蓬勃，大量古籍稿本、稀见刻本的披露，我们怎么去充分地利用这些新出资料，为我印学研究所用。再比如如何合理使用

数据库进行研究，我一直呼吁建立印学资料数据库，开拓印学研究的新的增长点，就是努力引进一些新方法、新思路，一起把印学研究做好。

比如我自己写的一些书当中，会有意识地引入一些新的研究方法，比如说做蒋仁印谱我提出“印谱校勘学”的概念，利用这种文献学方法，找到前后相关的印迹排比出次序关系。还有研究明代篆刻的时候，我觉得也不能完全借助于文献，或者说依赖于明代印谱，所以加强对出土印章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我在做《小道可观：中国文人篆刻》这本书时，对社会学、文献学，甚至宗教思想也有所涉及，有时候这种关联是作者刻意的行为，但很可能正是这种学科的交叉，能打开新的研究大门。

除了注重新材料之外，熟读史书、文献、印谱，善于发现被忽略的问题也很重要。比如说沙孟海先生的《印学史》讲到米芾刻印的时候，他列举的《绍兴米帖》第九卷全为篆隶书的例子，得出结论米芾可能会自己刻印，这其实都是一些常见、常规的文献。

这就引申出一个问题，就是对现有材料的总结和对新研究思路的探寻。既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如何去运用，这其实也是在避免重复研究。比如我参与了孙慰祖先生主持的《上海千年书法图史·篆刻卷》编纂，其中就把一些资料性的文献，包括印谱等出版物、印学论文的目录做整理，这就起到版本目录学的作用。

（三）几点期盼

关于西泠印社的印学研究，最后说几点期盼。从前面的论述，我们看到西泠印社建社 120 周年以来，都处于国际印学研究的领军地位。作为百年名社，应该在下一历史阶段继续发挥这种领军作用。

从当下的学术氛围与规则来看，西泠印社作为印学研究的引领，是否可以和政府部门或其他机构合作，联合设立一些基金项目，对社员进行相关的印学研究课题进行扶持。或者在社员与印社联合申报国家级、省部级的课题时予以支持。因为印学研究虽然已有长足进步，但依然比较弱小，需要关心、支持与帮助，因此对研究的资金帮助，还是非常重要的。也能显示出这种研究是“师出有名”的学术研究。

其次是社员的研究成果，能不能借助西泠印社的平台来进行一些宣传，比如原来《西泠艺丛》有社员新书的推

荐解读，但后来这个栏目也取消了，我们社员的理论著作在印社的刊物都无法获得宣传，和印社研究印学、兼容开放的理念不合。同时我们强调学术立社，但印社公众号几乎没有对社员印学相关的学术专著进行网络介绍、宣传和推广，其实也是没能把“学术立社”的原则落到实处。

从某种程度上讲，当今印学研究的全部历史，西泠印社社员贡献出其中一个巨大的部分，而且我们现在的社员本身的研究又将成为新的印学史，或者说印学史研究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应该有一种历史使命感，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学科当中占据一个高地，倡导一种有深度、有高度、有广度，甚至于是一种有温度的印学研究，继续引领我们未来的研究方向。

【注 释】

- [1] 朱珙：《清代篆刻创作理论批评与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9 年。
- [2] 陈振濂：《考古学家的手段——沙孟海〈印学史〉发微》，沙孟海：《印学史》，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7 年版。
- [3] 朱珙：《〈中国印论辑要〉后记》，《中国印论辑要》，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23 年版。

【作者简介】

朱 珙：西泠印社社员、南京晓庄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

西泠印社建社以来印学研究 with 未来方向

文 / 张永强

不觉加入西泠印社、成为社员已经 12 年了。能够在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马衡先生、第四任社长沙孟海先生的故乡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参加西泠印社建社 120 周年春季雅集活动，我倍感荣幸。100 年前，也就是西泠印社 20 周年社庆之际，“三老石室”岿然矗立在孤山之上。有感于西泠印社“保存金石、传承印学”之立社初衷，结合新时代国家倡导的中心工作，以及当前学术研究的重点与前沿，围绕本次雅集与研讨的主题“印学研究流变与未来方向”，侧重于金石研究，我提出以下的设想与建议，请同人们批评。

一、阐发立社宗旨，踵步先贤馨德

清光绪三十年（1904）夏，丁辅之、吴隐、叶为铭、王福庵“四英”创立西泠印社以来，正值晚清、北洋民国政府时期，社会面临巨大变革，内忧外患，风雨如磐，印社前贤在“保存国粹、研究学问”、谋求稻粱之时，并没有忘记家国之心。创社以来，吴昌硕、马衡等先生，以及此后的历任社长，无不具备精深的学术与艺术造诣，并发挥各自的社会影响力，为国家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以实际行动阐释了西泠印社创社初始确立的“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宗旨。

据社史记载，1913 年，西泠印社同人仿晋永和九年兰亭脩禊故事，在孤山举行第一次社员大会，提出了《西泠印社社约》，明确了印社的宗旨是“保存金石，研究印学”，时年 69 岁的吴昌硕先生被推举为西泠印社首任社长。这是在晚清、民国“金石学”大兴的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也明确了西泠印社与传统文人结社的区别。距今 110 年。

1921 年，西泠印社首次成了社会新闻的一个热点，那

就是“汉三老忌日刻石”的抢救事件。当时，在江南地区发现了罕见东汉碑刻——《三老讳字忌日刻石》，面临流失海外的危险。由吴昌硕先生带头，在上海发起书画义卖，最终募资 8000 银圆，将刻石赎回，使之避免了流散的厄运。1923 年 9 月重阳，在西泠印社成立 20 周年雅集之际，印社同人在孤山之上所筑“三老石室”落成，将三老刻石永为陈列、保存，供后世瞻仰；并由吴昌硕先生撰写了《三老石室记》以纪念。这一义举虽然过去了百年，回想印社前辈们以艺为谋、挽救金石的高风亮节和爱国主义精神，仍令人肃然起敬。

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马衡先生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他毕生致力于金石学的研究，在“保存金石”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0 世纪 30 年代，“九一八”事变后，华北沦陷，平津危急，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先生，毅然组织精选故宫历代文物精华 2 万余箱“南迁”，其中包括 24 万余件中国古代图书、文献、古物艺术珍品，辗转万里，经南京、长沙、重庆、四川、云贵等地，终无损毁，创造了战争年代文物保护的奇迹，当永载史册。

其中，举世闻名的国宝石鼓文，元明清三朝均存放于北京国子监太学，也由故宫博物院搬运南迁。十个石鼓，每个大约有一吨重，历经两千四百多年的风雨剥蚀，十分脆弱。马衡先生多方请教，决定用高丽纸把石鼓裱糊起来，再用棉被包扎，捆上稻草绳，确保石鼓万无一失。抗战胜利后，石鼓完好无损地运回北平，入藏故宫，辟“石鼓馆”珍藏。以上，在不久前出版的《马衡年谱长编》中有着详细的记述。

围绕着“石鼓”，吴昌硕先生毕生探索其书艺，开创出大气磅礴的石鼓文书风，引领一代书坛。马衡先生在保护石鼓等珍贵金石、文物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西泠

印社前期的这两位社长的丰功伟绩，是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的。这只是两个例子。我建议，应该以多种形式，更多地举行纪念印社前贤的主题活动。历代印社前贤的高风亮节，不应该被遗忘。

二、继续拓宽视野，着眼具有时代特色的“大印学”

当前，丝绸之路、民族融合、石窟寺考古、中华民族溯源等领域，成为我国学术界、艺术界研究的热点；百年“敦煌学”更成为世界显学，也赋予了传统的“金石学”“印学”以新的使命。我们要提高认识，紧扣时代旋律，确定研究主题，加强研究与利用，开拓印学研究的时代新风。

第五任社长赵朴初先生，提倡并创建成立了中国印学博物馆，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以收藏和研究印学为标志的博物馆。近年来，西泠印社陆续接受捐献，征集了不同时期的古玺印、封泥、陶印等有关文物，丰富了馆藏，其中不少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民族融合、少数部族政权的用印，对于构筑丝绸之路印章史，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这些集中体现在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印学博物馆展陈印章精粹》一书里，使这本书突破了单纯作为“印谱”的功能。印社还每年举办了相关主题的研讨会，加深了这方面的研究和影响力。

20 世纪初，在英国斯坦因的名著《西域考古记》中，以及斯文赫定、伯希和、大谷光瑞等人的探险报告和游记中，都记录了尼雅、楼兰等地出土的汉、晋封检、封泥、印章和文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斯文赫定、黄文弼等“西北考察团”又在古居延额济纳、新疆等西北地区，以及在马王堆汉墓、徐州狮子山汉墓等地，均发现了大量与古代印鉴有关的汉帛书、封泥、印章、纸本文书等，都为篆刻史提供了新的、丰富的研究素材。

第七任社长饶宗颐先生，不仅是著名的敦煌学家，在古文字学、书法学、书画、音乐等领域都有突出的贡献。书法方面，他以法藏伯希和所得敦煌文献为基础，精选、编撰，在日本二玄社出版了《敦煌书法丛刊》这样的大型书法图录，是敦煌学、书法艺术结合的重要著作，其中也保存了许多早期（南北朝、唐宋、归义军时期）的印章资料，拓宽了印学研究视野。上海博物馆孙慰祖、孔品屏两位先生编著的《隋唐官印研究》一书，能够利用上述考古

资料，对传统的印学（隋唐部分）进行了新角度的研究与阐释，具有开拓意义。

当然，这方面的研究课题，探索的空间还很大。能否由西泠印社协调各方力量，重新编纂一部新的“篆刻（印章）史”，将零散的印学研究提升到“印学通史”的高度，以彰显新时代的需要，也许值得考虑。

三、崇尚经典，创新方法，“重振金石学”

随着时代的变迁，关于“金石”的概念，也在不断变化。早期的“西泠八家”无不在乾嘉金石学的大潮之下，立足金石，奏刀治印。丁敬开创了浙派，著《武林金石记》，对整个杭州地区的石刻进行了著录和研究。黄易亲自访碑、绘图，制作拓本，著《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嵩洛访碑日记》《岱岩访古日记》等，成为金石佳话。这是传统的金石学。“创社四英”之一的丁辅之，在王懿荣刚发现甲骨文不久，他就利用和借鉴了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编纂甲骨文的集联，用甲骨文来写扇面、创作对联。吴昌硕、马衡、王福庵等也都有临摹新出土金石的作品，可见他们都是善于汲取、与时俱进的。

“金”与“石”，不仅仅是篆刻、治印，有着更为广泛的概念与范畴。体系的建立与基本材料的整理，仍为当务之急。

马衡先生著《凡将斋金石丛稿》，对金、石做了近代意义的科学划分，尝试建立新的“金石学”体系，惜全书未就。他还对当时新出土的洛阳汉、魏石经，进行了实地考察与复原缀合，请王国维等知名学者研究、题跋（拓片今捐献于故宫博物院），对于当时最新的考古成果，做了探索性研究，至今仍有借鉴意义。我的恩师国家图书馆原古籍馆常务副馆长徐自强先生，主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100 册，目录 1 册。这本书以各省为地域，从国家图书馆当时馆藏的 22 万份拓片中精选 2 万份，按照各省和年代进行了图录式的编次，而且收录的绝大部分都是整幅的拓本。其编纂的基础，即据清代王昶《金石粹编》、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以及叶昌炽《语石》。徐自强先生与夫人吴梦麟先生著《中国石刻通论》，与上书对应，以建立石刻学研究体系。徐自强先生还撰写了《重振金石学刍议》等文章，参加 2009 年 10 月西泠印

社“重振金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彼时我有幸陪恩师参会，并提交了论文交流。当然，这个“石刻学”的体例，至今还是没有建立起来，任重道远。

对于金石的“石”这方面，跨学科的专题性研究与基础资料的整合，仍有待于加强。比如，第五任社长赵朴初先生，同时是中国佛教协会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精通佛学研究，擅长书法。在他的关怀下，对 1956—1958 年，由北京图书馆、中国佛教协会、北京大学联合在北京房山藏经洞发掘、拓印的《房山石刻大藏经》（简称房山石经）进行了系统的整理，20 世纪 80 年代先由中国佛教协会在“初分过目”的基础上，按照“大藏经”的排序出版刻经图录 30 册。此后，经过两代人的接力、60 多年的不懈工作，又按照考古学和文献整理的方法，至 2022 年房山石经的整理又告一段落，由我协助吴梦麟先生在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房山石经题记整理与研究》（三卷本，初版由赵朴初先生题写书名）。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拓印工程，全部隋唐辽金元明的石经共拓 7 份、近 22 万张（每份 24600 余石、近 3 万张拓片、总字数逾亿），也是我国石刻研究的重要成果，在赵朴初社长的关怀下完成。当然，以上还只是对卷帙浩繁、内容艰深的房山石经的初步整理，关于其内容和艺术性，还处于基础阶段。

如今，新中国的考古学日新月异，大量文物不断出土，对近现代出土文献四大发现（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书、内阁大库文档）的内容大为充实。比如宝鸡青铜器重器《史墙盘》《速钟》《速盘》《何尊》等，对传统金石学的内容大为增补；甲骨文、秦汉简牍、碑志、造像等，都为传统“金石学”的框架增加了丰富的内容。这些新的“金”“石”材料，都有必要进行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出版相关图录，辨伪存真，阐发其艺术价值，赋予其与时代相称的意义。2022 年，我主持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宝鸡青铜器书法菁华》一书，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此书将清代以来流散到海内外的宝鸡地区的青铜重器，以及新中国建立以来出土的重器，首次以铭文菁华为重点，萃于一编，出版后受到读者好评。我还编著了《永宣金石——古代碑帖拓本粹编》，以新出土的金石资料为主，附以题跋，尝试弥补《金石录》《集古录》《金石文字记》等金石学名著有目、有跋而无图的遗憾。

第四任社长沙孟海先生，不仅诸体兼善，在金石学、

考古学、篆刻学等诸多领域都有着杰出的造诣。他的代表作之一《中国书法史图录》，更是利用敦煌学、考古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来阐释中国书法史上里程碑式的杰作。其中，他利用敦煌壁画、绘画中的执笔图案，以及新疆吐鲁番市出土的高昌《画承墓表》，对古代执笔与书迹的研究，特别是《兰亭集序》论辩的根本问题在于写手与刻手的差异等方面的论述，至今仍是不刊之论。

沙孟海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写手好、刻手好，东魏时期也会出现（酷似）赵孟頫（风格的作品），如《高归彦造像记》；写手好、刻手不好，《兰亭》也会变成《鬻宝子》。”年前，西泠印社 115 周年社庆之际，了解到印社图书馆馆藏中并没有《高归彦造像记》，出于对沙先生的敬仰与崇拜，我就将珍藏的民国时期的初拓本捐献给印社，以弥补这个遗憾，并写了题跋，后来在孤山上展出。这也是我的荣幸。

目前，我们正在对沙孟海先生的杰作《中国书法史图录》（两卷本），进行再整理与再研究，重新加以扩充和编次，名为《中国书法史断代图录》（六卷本），2019 年已经通过了浙江省主题出版项目，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目前正在紧张地编纂之中。同时，申报了一个出版项目——《中国古代石窟寺铭刻书法精华》。此书将把从新疆到河西走廊，从内蒙古大兴安岭地区嘎仙洞到中原、山东地区，包括浙江一带，魏晋南北朝、唐宋时期最精华的石窟寺铭刻，都进行辑录，采取场景、石刻、拓片、释文、考释等综合研究，尝试对当代金石学做新的阐释。

十几年来，在陈振濂主席的领导下，西泠印社的工作卓有成效，“天下第一名社”的称号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加大。我本人也是深受印社濡溉，师友提携，受益匪浅，不断成长。最后，我有一点建议：

今年，恰逢西泠印社征集《汉三老忌日刻石》回归孤山百年。在 120 周年社庆之际，能否在孤山上立一个碑，名曰《西泠印社“重振金石学”碑记》，请陈振濂主席撰文并书丹，印社普宿篆额，参加 120 周年活动的印社社员均在碑阴题名，置于“汉三老石室”之畔，留下印社同人“重振金石学”的时代印记。

【作者简介】

张永强：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关于西泠印社印学研究未来方向的几点思考

文 / 杨 庆

西泠印社癸卯春季雅集期间，“西泠印社建社以来印学研究流变与未来方向”专题研讨会在宁波召开。与会者各抒己见，对西泠印社的印学研究成果进行回顾与总结，对西泠印社印学研究的未来方向进行展望。我借此机会结合自己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谈几点我对西泠印社印学研究未来方向的建议和想法。

一、西泠早期社员的研究与推广

《西泠印社志稿》卷二“志人”中著录的“印人及收藏家”计 61 人，其中有不少早期社员鲜为人知，需要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系统的研究和专门的推广。以谢光为例，《志稿》小传称：“谢光，字烈珊，一字磊明，号玄三，又号磊庐。永嘉人，刻印得徐三庚风致。富收藏，得上海《顾氏集古印谱》，为海内孤本，因名所居曰顾谱楼。著有《春草庐印谱（存）》六卷、《磊庐印存》五集。”笔者曾在“大印学 2——印学收藏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了《千金顾谱秘石渠，铁画银钩北魏书——谢磊明的印学收藏与篆刻艺术》一文，该文研究指出谢磊明之于印学史的意义在于：其一，谢磊明为《西泠印社志稿》有载的早期社员；其二，他是明代《顾氏集古印谱》孤本的收藏者；其三，他以其丰富的印学收藏滋养了蜚声印坛的方氏昆仲——方介堪得入其室，观其所藏，并得其亲承指授，方节龢、方去疾为之婿；其四，他自身篆刻艺术（尤其是边款）成就斐然。文章得到会议评委会的认可，有幸获得二等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评委们对谢磊明印学成就的

认可。当代印学界对谢磊明的篆刻艺术成就有所关注。孙洵《民国书法篆刻史》将谢磊明列入“重要篆刻家”一节中的“篆刻书法兼擅”类进行专题介绍。王家葵《近代印坛点将录》有“地全星鬼脸儿杜兴·谢光（磊明）”专文讨论。戴家妙《西泠百年印举》中作《谢磊明传·评》等。可惜这些成果多为人物介绍类的文章，学界尚缺少关于谢磊明的较为深入的专题研究。较为遗憾的是，马国权《近代印人传》中未见谢磊明小传。马国权先生甚至误将谢磊明刻“鹤庐”一印，收入丁辅之自刻印图例中。直至朱琪《丁辅之“鹤庐”别号小考》（2019 年 3 月）一文才发现并进行正讹。可见，马国权先生对谢磊明其人其艺并不熟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谢磊明并未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在“大印学”语境下，印学收藏逐渐成为印学研究的重要论题。又社人、社史研究历来为西泠印社所重。作为明代《顾氏集古印谱》孤本的收藏者，以其丰富的印学收藏滋养了蜚声印坛的方氏昆仲，且自身篆刻艺术成就斐然的西泠印社早期社员谢磊明，有必要被学界重新认识和重点关注。^[1]类似谢磊明这样的早期社员，西泠印社可以组织相关专家，向他们定向约稿，在《西泠艺丛》上进行主题刊登，并利用西泠印社藏品及社会征集藏品举办相应的展览。如若有计划地每年推出几位早期社员的专题研究及展览，甚至出版著作、作品集，可以展现西泠印社早期社员风采，彰显西泠印社深厚底蕴，扩大西泠印社的影响。

《西泠印社志稿》卷二“志人”另著录赞助社员 10 人，卷六“志馀”中“西泠印社丁亥重九题名”中著录部分社员，“又故赞助诸公姓名”著录 1949 年前已故赞助

社员 45 人，“又故社友姓名”著录 1949 年前已故社员 38 人，这些社员于西泠印社而言均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必要进行研究和推广。

二、重要印学史料的修订与增补

现有印学文献著作主要有韩天衡先生《历代印学论文选》、郁重今先生《历代印谱序跋汇编》、黄惇先生《中国印论类编》等，分别出版于 1999 年、2008 年和 2010 年。这三种印学文献著作对古代印学史料搜集和整理有筚路蓝缕之功，影响深远。但是，囿于所见资料的局限性，难免存在一定的问题。

以汪启淑《安拙窝印寄》序文为例，学界主要依据郁重今《历代印谱序跋汇编》所载文献。然郁重今先生以西泠印社藏《安拙窝印寄》前序言为底本辑录，由于西泠印社藏汪启淑《安拙窝印寄》残损严重，郁重今先生所辑录魏攀龙《安拙窝印寄序》中至少有十字未能释读。然而，学界关于汪启淑所辑印谱谱名的认知，主要依据魏攀龙《安拙窝印谱序》一文中所载印谱谱名，因此其中《□□胜景》《听泉精舍印□》《国香□》三谱谱名未完全释读。暨南大学图书馆藏《安拙窝印寄》，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刻钤印本完整未损。笔者《汪启淑编辑印谱谱名及数量新考》一文对是谱进行了刊布。经过对暨南大学图书馆藏汪启淑《安拙窝印寄》卷首魏攀龙序文的重新辑录，我们发现：第一（A）页第三列第一字为“订”，郁重今先生释作“相”；第一（A）页第四列第三字为“香”，郁重今先生释作“藏”；第一（B）页第三列第一字为“粹”，郁重今先生释作“萃”，第一（B）页第四列第一、二字为“武”“夷”，郁重今先生未能释读，以“□”“□”标识；第二（A）页第一列第九字为“胜”，郁重今先生释作“剩”；第二（A）页第五列第一字为“楼”，郁重今先生释作“谱”；第二（B）页第而列第二、二字为“士”“林”，郁重今先生释作“人”“所”；第三（A）页第一列第六字为“托”，郁重今先生释作“托”；第三（A）页第二列第一、二字为“所”“寄”，郁重今先生释作“□”“□”“可”；第三（A）页第三列第一、二字为“秀”“峰”，郁重今先生未能释读，以“□”“□”标识；第三（A）页第四列第一、二字为“诗”“文”，郁重今先生未能释读，

以“□”“□”标识；第三（B）页第二列第一、二字为“嘉”“禾”，郁重今先生未能释读，以“□”“□”标识。从文字校补可知，郁重今先生所辑录魏攀龙《安拙窝印寄》中，涉及汪启淑所辑印谱谱名的错误有：《秋室印萃》应为《秋室印粹》，《秋室印剩》应为《秋室印胜》。另外，未能完全释读的《□□胜景》，应为《武夷胜景》；在“二十七种说”中未能完全释读的《听泉精舍印□》，释作《听泉精舍印谱》无误；在“二十七种说”中未能完全释读的《国香□》，释作《国香谱》有误，应为《国香楼》。所以，基于魏攀龙《安拙窝印寄序》的校补，我们可以知道，魏攀龙《安拙窝印寄序》所载汪启淑所辑印谱准确谱名为《集古印存》《飞鸿堂印谱》《汉铜印丛》《退斋印类》《古铜印丛》《秋室印粹》《袖珍印赏》《春晖堂印始》《武夷胜景》《静乐居印娱》《归去来辞印谱》《临学山堂印谱》《戒淫歌印谱》《秋室印胜》《锦囊印林》《阴鹭文印谱》《悔堂印外》《黄杨印零》《听泉精舍印谱》《居易庵印醇》《印忆》《国香楼》《印勺》《西千十景印谱》，共计二十四种。^[2]

所以，由于出版时间较早，传统文献的辑录难免会有一些疏漏讹错，需要我们进行系统的校订和完善。西泠印社是印谱收藏重镇，郁重今先生《历代印谱序跋汇编》编撰，便以印社社藏印谱资料为主要资料。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研究者而言，存在的现实困难是，很难进行长时间大规模地查阅印社库房所藏印谱。所以，系统整理和点校社藏印谱序跋可能还需要印社的组织和统筹。对于老先生们所未能目见的新的印学史料，如私人藏家所藏印谱等，则需要我们去进一步地增加和补充。

三、冷门印谱资料的关注与出版

汪启淑辑有《飞鸿堂印馀》一谱存世，并不为学界所周知，笔者有幸于重庆市图书馆得见此谱，因撰写有《新见汪启淑辑〈飞鸿堂印馀〉考》一文。文章从递藏、题跋、选印等方面对新见《飞鸿堂印馀》进行考证，认为是谱确为汪启淑所辑印谱无疑，且谱中添注涂乙书迹皆为汪启淑手书。《飞鸿堂印馀》的发现，可为汪启淑辑谱数量提供新证。另外，《飞鸿堂印馀》使用的《飞鸿堂印谱》专用稿本版框版式也是学界所未见的，这为古代专用稿本印谱

版框的刻制和使用提供了实物证据，对汪启淑藏印辑谱活动乃至中国印谱史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3]汪启淑在中国印谱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陈振濂先生于《中国印谱史研究导论》从五个方面总结了其历史价值：其一，平生辑谱最多。其二，开拓印谱体制、履有创新。其三，尝试各种专题、摹古印谱。其四，开创编谱新格式。其五，著有《飞鸿堂印人传》。诚如陈振濂先生所言，汪启淑系中国印谱史上的集大成者。汪启淑所辑除《飞鸿堂印谱》《安拙窝印寄》《汉铜印丛》《汉铜印原》《古铜印丛》《春晖堂印始》《切菴集古印存》《袖珍印赏》《锦囊印林》《退斋印类》《静乐居印娱》《悔堂印外》《临学山堂印谱》外，尚有《飞鸿堂印馀》一谱存世，既往有关汪启淑及其藏印活动研究对此谱多未涉及。因此，汪启淑《飞鸿堂印馀》有必要作为西泠印社重点影印和出版的重要印谱。目前，印谱出版多受市场因素影响，部分经济价值较小的印谱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又由于馆藏方出版授权等多种复杂原因，需要西泠印社出面进行协调，并给予出版经费方面的支持。另外，如前所述，西泠印社早期社员有大量印谱存世，西泠印社亦藏有大量藏品。如西泠印社藏谢磊明辑《春草庐印存》，合计涉及印人46人次，印作148方。其中，明代唐寅、文彭、何震，清代赵穆、陈祖望，西泠八家之丁敬、陈鸿寿、赵之琛、钱松诸家印作最为难得，有较高学术价值。西泠印社藏谢磊明本人印谱《磊庐印存》《谢磊明印痕》等亦具有较高艺术价值。但是，这部分印人印谱就只能被尘封于库房之中，不得面世。由于市场原因，名家印谱五花八门，越出越多，而冷门印人印谱出版则寥寥无几，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进入热门印人越来越热，冷门印人则越来越冷的“死胡同”。事实上，印学史绝不是名家史，冷门印人需要被挖掘和研究才能变热。热门印谱的刊布自有市场来推动，而冷门印谱则需要西泠印社这样的印学研究团体在学术规划和资金投入上予以更多地扶持。

四、社藏古籍数据库建设与资源共享

2019年11月，复旦大学“印谱文献虚拟图书馆”正式启用。数据库以林章松先生所藏印谱为主，收录印谱全文高清图版，编撰书志目录方便检索，收录历代印谱500

种，极大促进了印谱的传播，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

众所周知，2013年，西泠印社获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西泠印社收藏有各类古籍8000余册，其中古籍善本近4000册，国家一级文物38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7种。但是，这些古籍资料仅有少数真正被研究，且使用者亦少。近年来，西泠印社也正在着手整理藏品并进行出版，如《中国珍惜印谱原典大系》《西泠印社社藏名家大系》等大部头丛书，但发行量毕竟有限。可以将印社所藏古籍资料进行电子化，参照复旦大学“印谱文献虚拟图书馆”，建立西泠印社社藏古籍数据库，共享文献资源。此外，西泠印社社藏玺印较多，当下玺印拍摄技术成熟，玺印图像资料也可以一并收入数据库，让社藏文物“活”起来。如果能够实现印社社藏古籍、文物的资源公开、共享，一定能让更多研究者参与西泠印社社史的研究，凸显西泠印社作为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的权威地位。

五、结语

西泠印社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为宗旨。在印社120周年社庆的时间节点，对印社印学研究进行回顾和展望确有必要。就印社印学研究的未来方向而言，笔者认为或可从西泠早期社员的研究与推广，重要印学史料的修订与增补，冷门印谱资料的关注与出版，社藏古籍数据库建设与资源共享几方面多做努力。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16批特别资助（资助编号：2023T160272）项目阶段性成果。

【注 释】

- [1] 杨庆：《千金顾谱秘石渠，铁画银钩北魏书——谢磊明的印学收藏与篆刻艺术》，《西泠印社壬寅秋季雅集大印学（2）——印学收藏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22年版，第334页。
- [2] 杨庆：《汪启淑编辑印谱谱名及数量新考》，《中国书法》2021年8期，第193—196页。
- [3] 杨庆：《新见汪启淑〈飞鸿堂印余〉考》，《“中国印谱史与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年版，第150页。

【作者简介】

杨 庆：西泠印社社员，暨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从篆刻史到大印学 ——西泠印社近二十年印学研究刍议

文 / 金 丹

一、印学研究的重镇

印学研究相对于文学史、美术史、书法史来说，是明显滞后的，这源于对印学史的关注较晚，关注度不高，及其受众面较少，研究者匮乏，而且其中有些还是冷门绝学，故而它难以像其他门类那样迅猛发展。

即使如此，从西泠印社100周年到120周年的这二十年中，西泠印社在印学研究领域走过了极为重要的二十年。这二十年印学研究成果显著，西泠印社早就成为中国印学研究的重镇，也成为国际印学研究的中心，现在每年持续的国际印学研讨会的召开，全国乃至世界能有几家？因此西泠印社每年的坚持不懈，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使之成为第一重镇，或者说很难找出第二个这样的团体，印学研究几乎是难以超越了。从创社四子提出的“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宗旨，到沙孟海社长的“打造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的理念，再到新时期西泠印社的学术视野，与只专注篆刻创作和社员交流的其他篆刻社团拉开了极大的距离。

作为亲历者，第一次参加西泠印社的活动，是2003年建社100周年的“百年名社千秋印学：西泠印社国际印学研讨会”，我的投稿论文《阮元与浙派印人交游考》经评审入选，当时我刚刚硕士毕业不久，这是学位论文研究方向的延伸，注意到印人交友与文化圈之间的关系。2009年我的论文《论阮元金石学研究的新视域》入选“西泠印社重振金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持续深入地将我的阮元研究向纵深发展，并且由于研讨主题的要求，从篆刻史延伸到金石学，虽相近，却有着很大差异，甚至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其后，西泠印社不断发出特约征稿函，我的论文《吴熙载印学观与包世臣交游之关系》参加“第三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2011年）、论文《游幕与刻印：陈鸿寿在阮元幕府之游历与篆刻考述》参加“明清篆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论文《邓石如与梁巘、梅镠交谊之考辨》参加“西泠印社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年）、论文《〈云庄印话〉与清代扬州印坛》参加“第四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2014年）、

论文《二十世纪中叶的扬州印坛及其现象——以蔡易庵、孙龙父、桑宝松为中心》参加“西泠印社当代篆刻学术研讨会”（2015年）。之所以有这些成果，好像一步一步被西泠印社往前赶着走。此后我参与了多场西泠印社学术研讨会的学术主持、学术评议和评审工作，见证着它印学研究的这二十年。

我的印学研究是和西泠印社分不开的，我相信很多印学研究者也是如此。二十年来，西泠印社的印学研讨会给全国乃至国际的学者提供了平台，也成为硕博生们研究印学、发表印学成果的重要平台。因此，沙孟海社长提出的打造“国际印学研究中心”这一设想已经完全实现。一方面，这样的影响力归结于西泠印社作为百年名社极高的声誉，能够凝聚大批印学研究的学者和硕博生。另一方面，是西泠印社今天的发展思路，将印学研究作为重中之重来打造，这种具有学术性和前瞻性的思考，给百年名社带来了新的生机，甚至是生命力。因为西泠印社已经不是一百年前的印社，不能光靠雅集和创作交流，而是要依靠学术才能使印社在新时代发挥它的作用，这一点，西泠印社做得很出色。

二、印学研究的拓展

二十年来，我从参加西泠印社100周年国际学书研讨会以来，一直参与其中。近几年的研讨会参加的少了，我在想为什么？这是因为我突然发现跟不上了，很多选题是自己从未涉及或不擅长的，比如域外印章、图文印等等。

我们来看一下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我觉得二十年来的第一次突破是“重振金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金石学和印学本不是一个概念，属于相关学科，既有联系，又彼此独立，并有着各自的研究群体。这次突破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使印学研究和金石学研究都有了拓展。拿我的参会文章《论阮元金石学研究的新视域》来说，是我研究阮元书学、印学发展的成果。阮元的金石学正处于两者的交叉地带，笔者论证了阮氏的金石研究虽是着眼于经史考证的，但对于书法艺术实践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既有直接作用，又有间接影响。如他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刊行后，钱泳谓：“近时阮云台宫保又刻《积



◎ 大印学（二）——印学收藏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现场

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洋洋大观，愈博愈精，不特可补经传之未备，且可益许氏之所未及者，岂仅足资考订而助翰墨哉！”助翰墨，即对艺术实践的帮助。于是笔者提出阮氏以经考金、以金证经、由经及书、由金涉书这一论点，这是阮元经学、金石学、书学研究互相贯通的表现，也是其金石学研究的独特视域，单单研究书学、印学或金石学的往往都会忽略，这便是交叉学科研究和拓宽边界研究的重要意义。

此后的几次重大突破是：篆物铭形——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国际学术研讨会（2016年）、第五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之“域外印章研究”（2017年）、世界图纹与印记国际学术研讨会（2018年）、朱蜕华典——中国历代印谱特展暨中国印谱史与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9年）、金相椎痕——百年金石学发展与青铜器传拓（全形拓）精品展暨第六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之“金石全形拓研究”专题（2020年）、大印学（一）——两宋金石学与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21年）、大印学（二）——印学收藏史国际学术研讨会（2022年）等等，可见西泠印社已经将目光放在“世界印章史”的视野，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是西泠印社“研究印学”的重大拓展，是打造“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的具体实施。将学术视野放远、研究边界扩大，使得西泠印社的印学研究有了一个华丽的转身，由小及大、由中而外、由字到图，从篆刻到金石、从印内到印外，从本土到域外，只有立足本土，走向世界，才能彰显出文化自信，其开拓程度、研究

成果都远超我们的预设，可见其涉及面的博大精深。这不仅让中国了解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中国。它既是内容的拓展，也是视野的拓展，更是研究方法的拓展。

这样的一种改变是与时俱进的，我觉得也有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作者队伍因此也涌现了一批新面孔，不完全是一些篆刻史研究的老作者，新鲜血液的注入，必将使得西泠印社“大印学”研究充满活力。

三、印学研究的展望

我觉得，对于印学研究的展望，是开拓视野，但不是无限扩大研究的边界，而是不断向纵深发展，既要探索更多新的可能性，同时也要深入挖掘旧的东西，并与高等院校一起完善篆刻学学科建设。在当今书法学科升级的前提下，篆刻学一般是依附于书法学学科之下的，我觉得书法学科的升级应该给我们篆刻学的学科发展带来了一线生机，所以篆刻学的发展应该紧紧跟上。

首先，在构建大印学理念的背景下，探索印学研究更多的可能性、印学的未知领域、空白盲区和跨学科研究，以“世界印章史”的视野，逐渐建立起新的研究框架，使印文化引起世界的关注，使古代文化和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域外印章、图纹印记之外，还如族徽符节、器物模范、金石题跋、镌刻传拓等等，都是开拓疆野的选题。

其次，印学研究迈上一个新台阶，即从传统印学研究，到以“全印史”的挖掘和研究，还原历史的真实。不仅包括西泠印社以往一贯的研究类型：篆刻流派与创作研究、印谱与文献研究、西泠印社社史研究、铭文碑帖研究、印章典制研究、古玺印研究、人物与交游、技法与审美等等，还需继续将篆刻发展史、篆刻理论史、篆刻教育史、篆刻传播史、篆刻技法史、篆刻材料史、篆刻鉴藏史等等深入挖掘，并在热点研究之外，探索冷门绝学的突破，只有将传统的“印学”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同时，“大印学”才能更加显示出开拓的意义。当然，坚持传统印学的研究，不代表坚守和沿袭一成不变的研究方法，而是要摆脱保守的观念，寻求突破，找到新的研究方法。

再次，西泠印社除了学术研讨会以外，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策划选题，做主题性研究，打造一些印学研究项目，出版研究成果。以西泠印社为中心，并关注各地区区域印

学，收集公私收藏精品，挖掘更多的实物和文献资料。可将原有老社员的回忆类文章，转向口述历史的方向，抢救性收集整理，为近现代篆刻研究保留一手资料。

第四，要利用西泠印社藏这样有利的条件，向社会公开社藏，特别是一些善本、孤本，不要束之高阁。印学研究的一大难题，便是资料的收集，这也给印学研究带来了限制。西泠印社近年推出的“遯庵印学丛书”“中国珍稀印谱原典大系”是一个极好的公开西泠宝藏的开端，如持续不断地推出，就会有更多学者对印谱、印史、印论、印人作持续深入探究的可能性。西泠印社本身是一个丰富的印学宝藏，如能在此基础上，再收集和整理他山之宝，引领国际印学研究前沿，为“大印学”作出更大的贡献。

时至今日，西泠印社的印学研究也进入了新时代的转型时期，即进入到以第一个百年为根基而又充满生机和未来的第二个百年。

【作者简介】

金丹：西泠印社社员、南京艺术学院书法系主任。

浅论西泠印社建社以来的印学研究流变与未来方向

文 / 杜志强

值此西泠印社诞辰一百二十年之际，《西泠艺丛》组织“西泠印社建社以来的印学研究流变与未来方向”专题研讨，恰逢其时。

以下从自身出发，谈谈对西泠印社的认识以及对西泠百年来印学研究过程的学习体会，至于“印学研究流变与未来方向”之会议主旨，更愿意抱着学习的态度聆听受教。

一、印人心中的西泠——我所感受到的

我认识的第一位西泠印社社员，是南京艺术学院的丁吉甫先生（丁吉甫，1907—1984，名守谦。书画启蒙于岳老弟子李苦李，1935年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深造，受王个簃、方介堪等教授的教益。1958年入职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编著《现代印章选》《印章参考资料》）1983年由其时教导我学写“石鼓文”书法的南京名宿金成生老介绍认识（金成生，1911—2000，字无尘，70岁后号石城翁。江苏省文史馆馆员。擅长古典诗词、金石书画、精通英文。陈大羽誉其书法“各体兼擅，功力精湛”）。丁先生为我批阅印章习作，教导我取字要从《说文》中来，并钐自用

印印蜕供我学习。同时，他热情地为我题写“印签”留念鼓励。那时的我只知道先生与成生老交好，出版过《现代印章选》，至于其他的身份，懵懂无知，先生在接触过程中也未言及。交往约半年，我服兵役离开南京，没多久传来丁先生故去的消息，心中为此难过了许久。随着阅历的增长和对西泠印社史、江苏篆刻发展史认识的深入，愈加体会到丁吉甫先生所具有的勤勉踏实、任劳任怨的工作作风和平实厚重的篆刻风格^[1]。

在古都南京，改革开放后爱好篆刻的我们，尚可亲近到一批民国以来即追求篆刻艺术，积极创作的老先生，如业师石学鸿先生。（石学鸿，1921—2009，字云孙。江苏省文史馆馆员。1950年在杨仲子、胡小石的支持下，创办新安印社。其书法工篆隶，精于铁线篆，治印秀雅，擅长累黍小玺与细朱鉴藏印。著《云孙篆刻》等）。还有南京博物院的王敦化先生（王敦化，1901—1991，字熙如，别署“沂风堂”。早年入私立齐鲁大学国文系求学，毕业后留校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供职于南京博物院，从事文物鉴定和研究工作。编著《印谱知见传本书目料》）。再如南京市博物

院的王一羽先生（王一羽，1921—2007，字兆翔，号羽翁。幼承庭训，16岁得金铁芝亲授，24岁拜王禔为师，苦习大、小二篆，得窥浙派篆刻门径。1987年与武中奇、陈大羽等共同创立南京印社，同时创办南京业余书法篆刻学校，主持校务。著《兰楼印存》《兰楼遗珍》等）。以及秦士蔚先生（秦士蔚，1922—1999，江苏淮安人。江苏省文史馆名誉馆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书协江苏分会理事）。从六十年代初试以甲骨文制印，其印章刀法爽利，浑朴奇崛，别开印坛新面。另外还有诸多老先生，他们均具实力和资力与西泠结缘，惜乎！因缘际会，失之交臂。但在他们平时的言语交谈中，充满了对西泠印社的敬重。一次，在印友的聚会中，有朋友说起：刚从杭州出差回来，去探望病重中的宋朗先生（宋朗，1936—2011，江苏苏州人，早年为江苏省京剧演员，演艺之余，醉心书画、治印，师王敦化、钱君匋、钱瘦铁诸先生，976年调任江苏省国画院专职篆刻创作，有《宋朗印存》存世），学生递上“西泠印社纪念徽章”，老人接过徽章，摩挲中流下无声的泪水。大家静默了……

二、永作小学生——我的西泠“作业”

丁吉甫先生有方“永作小学生”的朱文印，语义浅显而深邃。我从一名普通的篆刻爱好者，幸而忝列于“社员”之末。从往昔每年随兴散漫的篆刻创作，到近十余年几乎每年必须完成的西泠“作业”，这既是自我压力，也是自觉作为。如果说篆刻创作需要有“艺术家”的激情与潇洒，那么做“作业”必须有“小学生”的恭谦与敬畏。

2005年起，随着兴趣爱好开始转向对篆刻文献史料的留意，初始以对顾从德《集古印谱》的版本探究为目标，经过三年的知识积累，第一次投稿西泠印社第二届“孤山证印”，幸得认可，获取信心。从此立足于此，结识先生君子，游弋印海学涯，喜怒哀乐，冷暖自知。其间，虽然也偶有“命题作业”，但更多的是在资料整理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点滴认识。书囊无底，在相对集中收集某一主题材料时，总是希望竭泽而渔，发现新的可以说明问题的一手文献样本，并案对雝，予以史实确认。但所有的努力都是在现有条件下进行的，在深入探究的过程中，往往会有

因所掌握材料的尚不充分，而使某一节点的解决无法通畅，就此也无须强而为之，极力避免主观偏执，静待机缘。

经过这十余年的实践摸索，在潜意识中似乎有了横亘于胸的主题要义。在未来的学习研究中，将会拾遗补阙，逐步完善。只要还保持着对印学研究的兴趣，加之先生君子的同行勉励，“作业”将是永远写不完的！

三、取之不竭的源泉——我心里的西泠

追寻着西泠百年的历史进程，体味着百年间西泠走过的每一个坚实步履，我们由衷地欣慰于赶上了西泠印社踔厉奋发的新时代。

百年西泠的深厚积淀，始于“人倚楼集同人收藏旧印拓之成谱，兴趣盎然”^[2]，“研究印学，保存金石”宗旨的确立，十年后推举吴昌硕为社长，而吴隐上海西泠印社创造性的铎板印谱，大范围的在社会上印行流传，“遥通声闻，以张其事”^[3]，客观上成为西泠印社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至1949年，早期的西泠印社在印学文献的积累整理上作出了重要成绩，主要体现在印章的收藏及印谱的辑集、传拓上，从创社四子到印社诸前贤，留存丰富，成绩斐然。而叶铭《叶氏存古丛书》、吴隐《遁庵印学丛书》则是对印学史重要文献所作的赓续文脉，校勘整理工作。建社20周年之《金石家书画集》、30周年之《西泠印社三十周年纪念刊》的出版则为西泠印学的研究、积累开启了另一种可能。

1963年，在西泠印社假社庆60年筹备、恢复活动中，商议制订的一些学术出版计划，如沙孟海《印学史》、丁吉甫《现代印章选集》等，虽然迟之十余年后才陆续完成出版^[4]，但西泠印社在此次活动中，成功完成“由松散型的民间组织演变为由政府文化部门管理的有组织的文化单位”^[5]历史性跨越，进入“获得永固、新生和不断向前发展的阶段”^[6]。

1979年，西泠印社75周年庆期间沙孟海先生被选举为第四任社长，在其“应该在学术研究方面多做一些”^[7]的号召下，“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的构想，成为西泠印社学术发展的新理念、新目标。

2003年，百年社庆期间，有组织、有计划、较为系统地开展对西泠印社的研究，推出《西泠印社百年图史》和

80 万字的《西泠印社百年社史资料长编》《“百年名社·千秋印学”国际印学研讨会论文集》，为深入展开对西泠印社的研究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对西泠印社自身史实的及时总结，也为西泠印社将目光视野转向更为开阔意义上的印学提供了可能，事实也证明了这点。

两年后的“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不用说“孤山证印”这一标题的确立，单从《论文集》开篇刘江先生的“印学与学科建设”一文，足以表明印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以后“西泠印社艺术创研处”为认真贯彻社委决策的积极落实、推进做了大量事务性工作，保证了一场场学术盛会的圆满完成。

我平时较为关注的印学文献中的印谱版本，不可避免地兼及诸如收藏、分类、著录、散佚等方面。如果纯粹站在印谱与印学研究关系的立场上来看，个人觉得未来至少在三个方面可以展开新的图景：首先是对现有存世印谱的整体认知；其次是对印人通过印谱的制作、传播，如何获得社会认同；再就是印谱本体的演变历史。其他还有：谱本文献的著录与印章实体互为印证等具体问题。其实，只要愿意坐下来学习思考，认真研究，就时常会发现一些大家尚未意识到，或有那么一点儿认识，也仅停留在感觉、印象的层面上的问题。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印学研究一定会朝“深刻”方向发展，现在我所能做的仅仅是“整理、揭示”，而更多的“解释、阐发”工作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要求，这是驽钝如我所不及的。

印社中有一批志于印学研究的青年学人，具有完整的知识结构，不俗的文化志趣和宽阔视野，以及掌握互联网时代下信息采集的先进手法，印学整体研究前景值得我们期待。同时，希望社会上有志于此的青年俊彦，充分利用西泠印社所搭建得如此开放、优质的印学研究学术平台，详人所未详，发人所未发。

- 印社三十周年纪念刊》，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97 页。
- [3] 丁仁：《咏西泠印社同人诗》跋，载余正注释本《西泠印社志稿》，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4 页。
- [4] 柴子英、秦康祥、韩登安合纂：《广印人传》（成稿后遗失）；钱君匋、叶露园合著：《历代玺印浅说》（后易名《玺印源流》），载王佩智《西泠印社 1963》，西泠印社出版社，2006 年，第 130 页。
- [5] 王佩智：《西泠印社旧事拾遗（1949—1962）》，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32 页。
- [6] 韩登安起草：《西泠印社的历史作用及今后任务（稿）》，载王佩智《西泠印社旧事拾遗（1949—1962）》，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65 页。
- [7] 吕国璋：《搞好学术研究》，《西泠印社百年图史》，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9 页。

西泠代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十年 ——略论西泠印社二十年印学研究的变化与发展

文 / 沈慧兴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清代赵翼的诗，已经传诵近三百年，似乎也觉得不新鲜了，但赵翼提倡与时俱进的文艺创作观，一直是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西泠印社在经历了百年风华之后，恰好进入了快速发展的二十一世纪。2003 年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西泠印社在组织架构、社务管理、学术研究、举办评展、对外交流等方面，都进入了与时俱进的新时代。在 2023 年的春季雅集中，及时总结和整理西泠印社的当代印学研究史，群策群力，为未来的印学研究发展提出意见建议，也是印社与时俱进的一个新举措。

本文根据西泠印社二十年来学术研讨会的主要活动内容，总结梳理出历次研讨会在论文数量、作者递进、学术主旨等方面的变化与发展，并对其历史地位和学术贡献作初步的论述，使读者对西泠印社二十年来的印学研究情况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和认识。

一、学术研讨会论文质量和作者递进的变化

从时间不可往复的特性来讲，昨天就是历史。及时总结和梳理西泠印社二十年来开展学术研讨的历史，是社史研究的重要篇章，也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印学研究的基础。为了比较直观地了解印社二十年来印学研究的基本情况，笔者对西泠印社 2003—2023 年开展学术研讨会的名称主题、论文篇数及历年作者递进情况进行了梳理，见表 1。

说明：

1. 本表自 2003 年百年名社·千秋印学国际印学研讨会开始统计，此前多位社中前辈具有数次参加西泠印社学

术研讨会的经历，并非指作者到 2003 年或 2004 年才第一次参加西泠印社印学研讨会；递进作者名单排列顺序按论文集目录先后为准。

2. 从 2004 年开始，递进作者根据历次研讨会论文集发表时的顺序依次排列而出，与上年重复的人选名单，统计在上一年的作者名单中，以后递进作者名单以此类推。

3. 因部分论文的作者有 2—3 名，故作者名单并非与研讨会的论文数量相等。一篇论文二名作者的，如其中有一名作者在往年中出现的，统计到前几年作者名单中；前面未出现的，计入新进作者名单。如具名作者前面都没有出现的，则全部计入新进作者名单。外文和中文都刊登的论文，数量只计入 1 篇。论文翻译者不统计在作者名单中。

4. 通过本表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到研讨会论文作者的历年递进数量及人员变化情况，以及作者队伍新老交替的渐变过程。

5. 同一作者分别用本名和笔名的，已知为同一作者的，参加次数统计在本名之下。由于时间较长，前后可能有作者重名的情况，但印学研究队伍本来不大，重名的概率很小。如有发现敬请读者告知为谢。

从以上统计表中，我们不仅得到了西泠印社学术研讨会二十年共 1079 篇印学论文的总数，还可以从入选论文的数量上看到规模不断扩大的事实，2013 年和 2017 年的研讨会入选论文数都超过了 100 篇，这在国内的印学研究机构中独树一帜，在印学理论学术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就连续举办的届次和总数而言，西泠印社“研究印学”的宗旨不仅没有弱化，反而有逐年增强的趋势，并且与沙孟海社长提出的“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的宏伟目标不断接近。

【注 释】

- [1] 丁吉甫对江苏篆刻的贡献，见拙作《初暖乍寒——1960 年前后以“江苏省书法印章研究会”为中心的江苏篆刻》，《西泠印社当代篆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74—292 页。
- [2] 叶铭编著：《西泠印社三十周年纪念刊》后记，载陈墨注释本《西泠

【作者简介】

杜志强：西泠印社社员、江苏省篆刻研究会副会长。

表 1：西泠印社 2003–2022 年学术研讨会论文主题、篇数及历年作者递进表

年度	研讨会名单	发表数量	递进作者名单	递进人数	备注
2003 年	百年名社·千秋印学国际印学研讨会	62	刘江、陈振濂、余正、方爱龙、史长虹、沈玉、菅野智明、松村茂树、徐清、戴家妙、张炜羽、卞孝萱、王巍立、李中华、陈大中、丘石、王庆忠、祝遂之、孙慰祖、徐畅、王大中、久米雅雄、陈建平、龙乐恒、梁晓庄、沈慧兴、胡志平、林乾良、于良子、方小壮、盛东涛、陈道义、周新月、姜寿田、蔡显良、薛龙春、李彤、黄惇、杨炳坤、胡小罕、金丹、朱天曙、盛诗澜、俞丰、高申杰、前田秀雄、石剑波、童衍方、孙向群、董建、葛贤镇、蔡树农、许敏雄、罗荣、谷松章、张耕源、河内利治、李崧峻、方国梁、桑建华、袁慧敏、童启熊、童启庆	63	童启熊、童启庆为同一论文作者
2004 年	纪念吴昌硕诞辰 160 周年学术研讨会	23	丁羲元、洪惠镇、卢旸、韩天衡、任道斌、徐建融、梅墨生、黄华源、简英智、诸涵、杜高杰、曹工化、舒文扬、周建国	14	
2005 年	首届“孤山证印”学术研讨会	32	李刚田、张建军、王人聪、尾琦苍石、萧春源、叶其峰、郭福祥、孙洵、冯宝麟、梅舒适、邹涛、唐吟方、王佩智、杉村邦彦、张郁明、朱关田	16	本年二次研讨会 共递进 36 人。
	陈介祺学术思想及成就研讨会	29	张业法、孙敬明、范正红、王恩田、姜寿民、田上惠一、俞葵华、陈继揆、陆明君、余彦焱、贺文荣、林如、清原实门、萩信雄、曲彬、古心、张其凤、吕金成、松丸道雄、江涵	20	
2006 年	早期社员社史研讨会	35	丁利年、邓京、寿勤泽、陈一梅、张斌海、陈星、侯立新、薛帅杰、朱妙根、黄镇中、方广强、金煜、楼浩之、唐存才、张永敏、盛欣夫	16	
2007 年	明清徽州篆刻学术研讨会	23	王东明、翟屯建、刘东芹、乔中石、蔡孟辰、王霖、晨欣、柳向春	8	
2008 年	第二届“孤山证印”国际印学峰会	42	孙家潭、吴鹏、崔祖菁、朱琪、顾工、祝竹、潘敏钟、敖普安、施谢捷、杜志强、鲍复兴、刘恒、侯开嘉	13	
2009 年	重振金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45	徐自强、陶喻之、张光远、刘德武、潘永耀、刘钊、曹锦炎、路远、张永强、鱼住和晃、巩宝生、巩朋、内田诚一、陈松长、张明珠、仲威、王亮、赵超、施安昌、杨鲁安、吴琦幸、张中发	22	
2010 年	“青泥遗珍”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	18	刘庆柱、李毓芳、李银德、马骥、董珊、王辉、陈昭容、林文彦、张懋容、高久由美、杨广泰	11	
2011 年	第三届“孤山证印”国际学术研讨会	52	胡俊峰、刘洪辉、孔品屏、游国庆、陈岩、乐游、莫小不	7	
2012 年	明清篆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44	邱世鸿、徐千涵、张胜利、陈国成、彭砺志、刘镇、刘珊、杨东建、孙晓涛、陆昱华、高石、孙志强、胡广跃、杨帆、邵宇、张恨无、刘创新、朱金国、李军、郭清华	20	
2013 年	国际学术研讨会	112	徐春燕、张今、楼纪洋、邓振宇、徐海东、徐咏平、邝以明、郭锋利、乔国强、李育华、曾子云、张浪、杨瑾琪、王昊宁、祝帅、赵广青、杨刚、张恒凯、肖世孟、马徐浩、方建勋、杨亮、钱超、林进忠、肖楠、许洪国、范邦瑾、陆德富、吕金柱、江继甚、瞿林江、何碧琪、许湘琴、秦明、蒋瑾琦、梅松、李长钰、孙立仁、河野隆、徐学毅、刘晓生、刘晓峰、周铁柱、叶公平、陈思远、费秀旭、刘天琪、王太雄、土屋明美、王建磊、吕文明、余晖、郭超英、井谷五云、夏法起	55	
2014 年	第四届“孤山证印”国际学术研讨会	71	汪凯、蒋七二、吴生道、孙长铭、刘聪泉、黄辉、陈艺、洪权、卢康华、郑晨、夏俊、程渤、潘池勇、静慈圆	14	
2015 年	当代篆刻学术研讨会	38	舒鸣、盛雪燕、蔡泓杰、赵明、李庶民、刘锦堂、谭文选、杨鹰、王梦笔、汤传胜、张华飏、张伟然、张学津、荀海、公丕普、刘小平、陈治军、韩瑞龙、靳慧慧、邹典飞、余巨力、梁达涛	22	
2016 年	篆物铭形—图形印非汉字系统印章国际学术研讨会	50	刘昌玉、杨斌、胡嘉麟、尚磊明、刘作胜、韩回之、刘健、陈哲、王晓光、王彦为、葛欣、何边海、蒋曼萝、华汀、林振岳、钟诗奇、张志一、黄家祥、刘振宇、余乃谦、张总	21	
2017 年	第五届“孤山证印”国际印学峰会	131	田炜、谷丰信、谭若丽、石黒ひさ子、叶莹、向净卿、庄哲彦、陈斯鹏、罗恰、苏玉清、陈培站、马其伟、王文涛、梁基永、蒋明、许道坤、李路平、李宗焜、辛尘、刘宝民、杜延平、管树强、王洪真、赵冲、王炳学、王维、周子牛、戎恺凯、陈述、钮震江、谢俊峰、王潘、吴凡、陈谊、赵鹏、吴炬、金林西、诸葛慧、程俊英、李砺、郑付忠、徐裴越、戴丛洁、高骏华、钟雅伦、石川日出志、大塚纪宣、曾经纬、俞佳迪、邱云、袁恩东、窦永锋、石连坤、田振宇、王延智、谭频璇、黄修珠、陈野、马涛、刘晓峰、蒋志琴、陈昊月、宋立、史正浩、刘策原、陈颖君、邬志远、黄耀忠、黄燕婷	69	
2018 年	世界图纹与印记国际学术研讨会	68	谭晶、杨庆、柳博赞、吴佳玮、陈天镜、赵生泉、石永峰、周松林、施锡斌、蔡志伟、冷东、罗章鑫、李德军、苏浩、刘方、刘浩敏、杨二斌、王文超、刘昕、李瑞振、赵维江、许隽超、张武装、高敏、赵熊	25	

续表：

年度	研讨会名单	发表数量	递进作者名单	递进人数	备注
2019 年	中国印谱史与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62	吴云峰、邵军耀、颜新新、郝长宁、江兴祐、黄天美、段成贵、胡鹏、宋一明、杨小琪、陈文妍、刘峰、李惠明、朱艳萍、雷德侯、古菲、赖伟宏、绳博、康佳琦、唐柱华、林立、吴格、秦颖	23	
2020 年	第六届“孤山证印”国际学术研讨会	56	郑力胜、周逸阳、沈必晟、宋长昊、张惠琪、孙迦南、刘勇、徐发、孙海燕、李霏、陆蕾平、冯健、王艳明、葛复昌、祝童、张雷、王仁海、邓君浩	18	
2021 年	大印学（1）“两宋金石学与印学、文献、实物、图像”国际学术研讨会	46	申俭、耿鑫、刘万磊、宋雪云鹤、江蓝天、许力、张焱、张曙光、郑道骏、颜景波、秦瑞、徐梦晨、唐雪康、陶淑慧、黄汉霖、韩建杰、雷浩鑫、潘捷	18	
2022 年	大印学（2）印学收藏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40	王博、王思浩、王丽艳、李兴涛、李阳洪、王伟、李柯霖、张姣、周赞、刘玮琳、赵作龙、程昱、袁文甲、曾毓晟、臧坤	15	
合计		1079 篇		490 人	

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一）论文写作日趋规范，文章质量明显提高

2003 年以来，由于研讨会学术主题明确与学术规范要求提高，二十年来研讨会论文都比较规范，学术性明显提高，基本消除了以往论文注释不明、缺少图片、重记叙轻论述的问题。20 世纪的印学研讨会文章，很少有论文提要 and 主题词，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的印学论文，大部分是作者与印人亲身交往的“三亲材料”，所用材料基本无规范的注释，也很少使用图片，论文基本以纯文字为主。近年来，随着专业文博研究机构作者和各大院校博硕士生的加入，研讨会论文的学术性与规范性不断增强，当然更与目前征稿的学术要求有相当大的关系。目前印社的征稿要求，除了明确的讨论范围，也明确了不收录的论文内容，当然也有注释、图片等学术规范的示例。在印社的引领和规范下，目前参加研讨会的论文质量明显提升，一些最前沿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都在研讨会上有所发表。印学论文实现了从纯文字到有文有图，再到有文有图有数据的提升转变。在当今的印学研究中，不仅大量应用了图像、表格等现代科技文明成果，还尝试以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科学，使印学论文的数据更加精准，论证过程更有说服力。

（二）研究范围日益扩大，研究高度逐年攀升

从 2003 年“国际印学研讨会”概念的提出，2009 年重振金石学的提出与实践，再到 2016 年“图形印非汉字系统印章”研究主题，直到 2021 年“大印学”构想的实施，

无不体现了西泠印社在研究主题和范围的不断扩大和突破。2017 年的国际印学研讨会，收录了古玺印、篆刻流派与地域、篆刻技法与审美、印学文献、印人、域外印章、西泠印社史、金石书画与鉴藏等八个方面的研究论文，共 132 篇，创下了研讨会入选论文数量之最。陈振濂副社长在 2017 年的《第五届“孤山证印”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的序言中说：“西泠印社的篆刻创作与印学研究，在全国首屈一指，享有崇高的领军地位，今年秋季的这两场分别指向艺术与学术的大活动，一定会在西泠印社史上留下辉煌灿烂的一笔。”这样的自信与抱负、这样的突破和创新，需要印社领导的责任担当和学术勇气，需要社内外研究者的积极响应，需要杭州市委和西泠印社委会的大力支持。通过以上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充分地证明了印社在研究主题方面的决策是十分准确的，也是西泠印社在“研究印学”方面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最好体现。

（三）论文作者队伍的递进和扩大

近二十年，印学理论研究的作者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为了全面了解 2003 年以来西泠印社研讨会入选论文作者的情况，笔者根据近二十年印社举办的 21 次学术研讨会的目录，对论文作者的参与次数进行了统计和分析。从统计情况看，2003 年以来共有 490 名国内外印学研究者参加了西泠印社的研讨会，其中参加次数 10 次以上的有 16 人，分别是：张炜羽 21 次、徐畅 16 次、孙洵 16 次、林乾良 14 次、朱琪 14 次、孙慰祖 13 次、孙向群 12 次、董建 12 次、久米雅雄 11 次、蔡显良 11 次、杜志强 11 次、林文彦 11 次、沈慧兴 10

次、陈道义 10 次、简英智 10 次、王东明 10 次。参加 9 次的有孙志强 1 人；8 次的有陈振濂、黄惇等 5 人；7 次的有韩天衡、龙乐恒等 8 人；6 次的有松村茂树、孔品屏等 14 人；5 次的有张耕源、柳向春等 13 人；4 次的有刘江、余正等 18 人；3 次的有范正红、萩信雄等 41 人；2 次的有童衍方、河内利治等 81 人；1 次的有方爱龙、菅野智明等 293 人。因统计表格太长，本文只作简要的文字叙述，本次会议后再作修改完善。通过以上统计，作者队伍已经呈现二个比较明显的转变：

一是论文作者从篆刻家到专业文博艺术理论研究者的转变。据笔者初步统计，从 2003 年到 2008 年，论文作者的名单中篆刻家约占全部作者的三分之二。2003 年百年名社·千秋印学国际印学研讨会上，除个别作者外，绝大部分都是书法篆刻家。从 2009 年开始，专业文博艺术理论研究者的人数逐年增加，到目前为止，随着高等院校博硕士生和专业文博机构作者的不断增加，篆刻家作者的人数降到全部作者的约三分之一。

从前面的统计表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参加次数较多的作者，都是理论和创作兼擅的篆刻家。特别是张炜羽先生，二十年来连续参加 21 次，成为西泠印社学术研讨会的唯一大满贯作者，这样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是每一位印学理论研究者的榜样。当然，笔者还对多次参加西泠印社学术研讨会的西泠印社前辈韩天衡、徐畅、孙洵、林乾良、孙慰祖、陈振濂等表示由衷的敬意，正是他们的学术坚守和艺术传承，才使中国印学研究薪传有序、枝繁叶茂。同时西泠印社孙向群、陈道义、梁晓庄、董建、杜志强、林文彦、简英智、朱琪等印学研究的中坚作者，积极参与西泠印社学术研讨会，为繁荣印学理论研究，作出了一名社员的学术贡献。

二是论文作者的总数空前扩大，新进作者明显增多。据笔者统计，自 2003 年以来的二十年中，共有 490 位作者参加了西泠印社的学术研讨会，其中 2013 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新参加作者有 55 人；2017 年第五届“孤山证印”国际印学峰会新参加作者竟有 69 人。这些新作者的加入，无疑为西泠印社的理论研究增添了新生力量，同时也证明了西泠印社印学理论研讨会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在持续扩大。西泠印社学术研讨会新作者的增加，当然还与印社副秘书长、理论研究室主任黄镇中、孙慰祖等人的前期组织与邀请有很大的关系。在 2008 年前，社外专业文博机构研究者参加

西泠印社学术研讨会的人数是比较少的，故印社采取特邀的形式，吸引了国内外专业研究人员的加入，为提升学术研究水平，扩大印社学术影响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表 1 中，读者还会发现一些外国作者的名字，根据国家来稿情况，笔者进行了简单了罗列：

日本作者 28 人，先后有菅野智明、松村茂树、李中华、久米雅雄、前田秀雄、河内利治、尾琦苍石、梅舒适、邹涛、杉村邦彦、田上惠一、清原实门、萩信雄、松丸道雄、鱼住和晃、内田诚一、高久由美、河野隆、土屋明美、井谷五云、静慈圆、刘作胜、谷丰信、石黒ひさ子、石川日出志、大塚纪宜、石永峰、苏浩等人参加。

美国作者 3 人：李育华、许湘苓、钟雅伦；法国 1 人：龙乐恒；加拿大 1 人：范邦瑾；德国 1 人：雷德侯；新加坡 1 人：杨斌；马来西亚 1 人：刘创新。

以上 36 名国外印学专家，大部分是西泠印社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资深投稿者，如在 2003 年举办“百年名社·千秋印学——国际印学研讨会”上，就有日本的菅野智明、松村茂树、李中华、久米雅雄、前田秀雄、河内利治，法国的龙乐恒参加研讨。在 2005 年首届“孤山证印”学术研讨会上，有尾琦苍石、梅舒适、邹涛、杉村邦彦、田上惠一、清原实门、萩信雄、松丸道雄参与其中。这些国外作者的参与，使西泠印社的印学峰会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会作者来自 7 个国家，西泠印社的世界学术影响力由此可见，基本实现了沙孟海社长提出的打造“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的宏伟目标。

对于以上 490 位作者的研究，当然还可以从年龄、学历、地区分布、是否社员等维度进行深入的统计分析，以获取更多的规律性结论。如果时间充分，还可以将作者来源再往前推进到 1963 年或 1913 年，甚至到西泠印社成立时的印学理论研究，以求得更精确完整的印学理论研究大数据研究分析成果。

二、举办者主旨和理念的新变化

西泠印社学术研讨会的主旨和理念，在 2009 年和 2021 年发生了二次比较重大的变化。这二次学术思想上的变化，直接影响了西泠印社学术研讨会的来稿内容和作者结构，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印社的学术影响力。

（一）重振金石学的提出和实践

2009 年西泠印社“重振金石学”的提出，是在当代金石学逐年衰落的大背景下，以印社“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特殊历史使命，振臂高呼，旨在重新解读传统金石学，并在当代条件下重构金石学，保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而实现西泠印社“名家之社”、“天下之社”、“博雅之社”的新时代宏伟目标。当年的学术研讨会，分金石学综论、玺印研究、铭文碑帖、金石著录、金石家研究及附录等部分，基本涵盖了金石学研究的范围。研讨会吸引了徐自强、陶喻之、张光远、曹锦炎、路远、张永强、鱼住和晃、内田诚一、陈松长、仲威、施安昌、杨鲁安等 22 位国内外的金石学家和古文字研究者的参与，研究对象从印内扩展到了印外，论文作者从篆刻家扩展到古文字学家和各类文博研究者。特别是国家图书馆徐自强的《重振金石学刍议》、金石学者张永强的《海内孤本〈大代华岳庙碑〉考》等论文，都突破了以往印学研究的范围，为重振金石学奏响了序曲。次年，印社又举办了“青泥遗珍”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专题就封泥文字进行了学术研讨，吸引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吉林大学教授董珊、收藏家杨广泰等专家学者的参与，在封泥研究方面又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二）“大印学”概念的推出和响应

2016 年举办篆物铭形——图形印非汉字系统印章国际学术研讨会，则是西泠印社实施“大印学”概念的先期试验。在这次研讨会中，由于论文主题的要求，一些传统的印学理论研究者一时感到无所适从。但又有刘昌玉、杨斌、胡嘉麟、尚磊明、刘作胜、韩回之、刘健、陈哲、王晓光、王彦为、葛欣、何边海、蒋曼萝、华汀、林振岳、钟诗奇、张志一、黄家祥、刘振宇、余乃谦、张总等 21 位新进作者欣然参与其中，占入选作者的 42%。这说明印学研究的范围，除了传统的印学研究、金石学研究外，还有更加广阔的天地，非汉字系统印章的研究者也不乏其人。当然，通过论文获奖而能加入西泠印社，对社外作者也是一个比较有吸引力的重要因素。

2018 年，西泠印社即成立 115 年，作为社庆活动的核心学术项目，“世界图纹与印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举行。本次会议旨在从美术考古、印章史及艺术学的角度，对世界各地古代文明发展阶段中存在的图形纹饰、文字铭刻、汉字

及非汉字印章进行考察和研究。研讨会共收录论文 69 篇，其中谭晶、杨庆、柳博赞、吴佳玮、陈天镜、赵生泉、石永峰、周松林、施锡斌、蔡志伟、冷东、罗章鑫、李德军、苏浩、刘方、刘浩敏、杨二斌、王文超、刘昕、李瑞振、赵维江、许隽超、张武装、高敏、赵熊等 25 位作者首次参加西泠印社的研讨会，占入选作者的 36%。江山代有才人出，这些新作者的不断加入，正是西泠印社印学研究的活水源头。

2021 年西泠印社举办“大印学（1）——‘两宋金石学与印学：文献、实物、图像’”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范围包括：宋代金石学、金石学家研究，宋代金石收藏研究、宋代文字学研究，宋代碑帖研究，宋代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以及传统印学研究等方向。本次研讨会，不仅是西泠印社重振金石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大印学”理念的前提下，对研讨内容的进一步拓展和延伸。从定向约稿和自由来稿的情况看，基本实现了研讨会承前启后、学贯中西的初衷和目标。2022 年“大印学（2）——印学收藏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研究范围，是对 2021 年研讨会的巩固和提升，除了传承宋韵文化之宋代金石学与印学收藏研究、古玺印收藏史研究外，还涉及文人篆刻收藏、印学文献与印具印材收藏史的研究，所谓“印之大者”，在这二年的研讨会中得以充分彰显。

西泠印社学术研讨会二十年来的变化，还有举办组织和经费筹集等变化，以及举办形式的创新。如 2022 年在线上进行学术研讨，就是“新冠”情况下的权宜之计，虽然现场参加作者不多，但还是实现了学术交流的初衷。

总之，西泠印社二十年来研讨会的变化和发展，是印社学术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也是大家亲身经历的历史过程。昨天就是历史，对于这段历史的总结和回顾，还是有很多时代意义的创新和突破。本文用统计学的方法，对历次研讨会的论文作者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出了论文与作者的总数，以及个人的参加次数比例。同时对历年研讨会作者的逐年递进关系进行了例表说明，对研讨会的主旨和理念变化进行了初步的概述。希望通过本文，能对西泠印社二十年学术研讨会会有一个全面的统计和评价，为社内外研究者提供基础性的材料，为进一步弘扬西泠印社的印学研究和学术精神，作出一个社员应有的贡献。

【作者简介】

沈慧兴：西泠印社社员、青桐印社社长。

《西泠艺丛》公开发行人以来专题内容发微

文 / 孔品屏

2015 年 1 月自《西泠艺丛》公开发行人以来至 2022 年 12 月，共计 96 期，皆以专题形式出刊。可以说在引领当代印学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且各专题极具特色。其中印人个案专题最为集中，计有 48 期，占了一半比例，也就是说它是《西泠艺丛》最为重要的内容，这一现象在 2015 至 2019 年间表现得较为集中。以印人研究丰富印史确实是的一种重要手法，印人也是传统的研究对象。在 2020 年开始，这种现象有所改变。

在 2020 年 12 期中，虽仍有“启功、马氏昆仲、经亨颐、张廷济、今井凌雪”5 期印人专题，但数量已不过半。另有“民国巴蜀书学研究”“简牍研究”“荆楚书学研究”“唐诗之路研究”“百年西泠·古韵中原”和两期印学峰会论文选粹。可以看出，社刊在选题上开始突破“印学”。这是一种指向，也说明了当代印学研究人员视野的拓展。

2021 年的社刊专题内容更加多元，分别是“‘一带一路’碑刻研究”“西泠印社新人藏古玺印研究”“徐森玉鉴藏研究”“全国‘书法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选萃”“秦陶文陶印研究”“大印学概念的产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徐渭绘画创作研究”“清代金石主题诗词研究”“传抄古文与书法篆刻”“沈尹默书风研究”“‘两宋金石学与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粹”。涉及碑刻、古玺印、陶文陶印、鉴藏、书法、绘画、诗词、印人等。《西泠艺丛》似乎在 2021 年打开了一个新的维度，可将其视为对印学外延的探索。这个外延似乎不仅是社刊专题的外延，更是西泠印社的外延，也许还包含了社员构成的外延。

在 2021 年的众多专题中，将对后期产生持续影响的可



◎ 2020 年《西泠艺丛》第九期
百年西泠·古韵中原



◎ 2020 年《西泠艺丛》第四期
民国巴蜀书学研究



◎ 2021 年《西泠艺丛》第六期
“大印学”概念的产生

能是第 6 期“大印学概念的产生”。概念的突破有时是本质的突破。它突破的是印学研究不仅仅是古玺封泥中的自名、考证、艺术风格，也不仅仅是印人、印石、印作、印谱这些印学本体范畴的内容，而是开始拓展到“大印学”。“大印学”是什么？也许现在对它的定义和范畴，不同的学者尚有不同的解读，但是这并不能妨碍引领广大研究者推开新的视窗。引发争论、引人思索，或许意义更为重大。

在 2022 年，《西泠艺丛》中的“金石”专题表现得极为抢眼：第 1 期“清代金石书目研究”、第 5 期“两宋金石学研究”、第 7 期“巴蜀金石研究”、第 8 期“晚清民国京畿金石活动研究”和第 10 期“宋淳化阁帖传拓与典藏研究（上）”，共计 5 期，几近半数。其他专题如印人、印谱、鉴藏和当年研讨会论文选萃等，这些多元的印学本体研究也是重要内容。

除了西泠印社每年举办的专题学术会议之外，《西泠艺丛》对于很多印学研究人员而言，更重要的是引领、指向作用，以及完成学术成果的分享。如何引导，如何让更多的研究人员去研究印学体系的缺环、填补印学体系的空白点？在印学本体方面，无论古玺印还是篆刻，有很多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部分时代印章的重要性也许现在还没有被充分认知。比如说之前做的“亚洲印章研究”这个专题，就非常有价值。我们对汉字圈印章的认知可能比我们自己想象中的更为薄弱，而现在汉字圈国家基本上不用汉字，其本国研究力量也极为薄弱。以越南为例，越南国家博物馆官网上面的印章，文字是倒放的。越南印章跟我国印章的关系实际上是极为密切。其他域外印章的研究也是如此。国际会议上，在他国印章研究领域，在讨论世界艺术史的时候，我们需要有研究人员能够代表中国发出声音。当然中国印章自身的很多专题也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究。当下，书法学升级为一级学科，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印学的研究尚且薄弱，需要更多力量的参与。我认为《西泠艺丛》是有能力和影响力来做这件事的。

为了使整个印学体系的构建更加丰满，很多前辈们已经做了巨大的贡献。如今，印学的边缘不断地被拓展，在书法学科升级的背景之下，当前的环境对于年轻的研究人员来说是一个机遇，也是挑战和义务。这带给《西泠艺丛》的也同样是挑战和义务。

我在浏览西泠印社官网时，发现网站内容很丰富，可

以检索到历年各期专题，但检索文章还需移步知网。每年学术研讨会文章官网上也有部分，如果能完整地呈现将更有利于被使用。可惜实际使用西泠印社官网的人并不多。比如在官网上有社藏的分享，浏览量多是个位数或两位数，我觉得比较可惜。文物、文物的研究和展览，是三位一体的，如何引导公众更为充分地利用这些资源是值得探索的问题。开放是趋势，各大博物馆也都在做数字化文物。以上海博物馆印章门类为例，公开的印章高清图数量目前已超 1000 枚。这些是可以免于申请，直接用于研究、临摹、观赏的。如果《西泠艺丛》能够把西泠印社的藏品和研究成果进一步公共化，那么，我们的服务对象会突破专业研究人员和爱好者，可能还会吸引一些社会民众。西泠印社的另一社会义务是向公众传播中国传统玺印文化和世界非遗“中国篆刻”。《西泠艺丛》是印社的窗口，这一个维度或许也是需要的。

【作者简介】

孔品屏：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玺印封泥研究对历史地理学的推进

文 / 张伟然

近年玺印封泥研究对历史地理学的推进，目前来看，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方面，增添文献失载的政区名称。这方面例证很多，最显著的例证是“江南”。《史记·货殖列传》载：“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自唐以降，都是将“江南”理解为一个地区。张守节《正义》谓：“此言大江之南”。清代杰出史家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摘引此句：“《史记·货殖传》：‘江南、豫章、长沙’，又言‘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皆谓今湖广、江西之地。《项羽本纪》‘江东虽小’‘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今人所谓江南，古之江东也。”这很显然将“江南”与“江东”等量齐观，全都当作地区名了。

我本科时读《货殖列传》，就觉得这句话很不对劲。“江南”前面的衡山、九江，后面的豫章、长沙，都是郡名，中间掺杂一个地区名，显得不伦不类。太史公文法严密，当不至此。但要说“江南”与上下文一样，也是郡名，又没有依据。近年孙慰祖先生发表《浙江、江东、江南为秦郡说》一文^[1]，明确指出“江南”当为秦郡名，此外秦代还当有浙江郡和江东郡。由于岳麓秦简第1159简中有“江东、江南郡吏”之文，慰祖先生的这一判断可谓不刊之论。

类似例证不胜枚举。由于《史记》中没有秦代政区地理专篇，以致秦郡沿革至今仍聚讼纷纭。最高级别政区尚

且如此，县级及以下地名可想而知^[2]。此类发现对于历史地理学，特别是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弥足珍贵，可补传世文献之阙。

第二个方面，传世文献中有些关于政区的记载语焉不详，玺印封泥资料可以对其加以确证。如《史记·项羽本纪》载立番君吴芮为衡山王，谭其骧先生据此判断衡山应属秦郡。今存有“衡山发弩”和“衡山马丞”封泥，足证其说可从。

第三个方面，可提供地名正字依据。一些历史地名在文献中往往有多种写法，到底哪一种写法是正字，玺印封泥能提供第一手资料。例如，秦有“三川”郡，封泥所见为“叁川尉印”“叁川邸丞”；战国齐都临淄，秦封泥有“临菑司马”；显然，“叁”“菑”才是当时的正字。秦有东海郡，秦封泥有“东晦口马”，傅嘉仪先生认为“东晦”即“东海”。秦封泥有“潦东守印”，汉印有“辽东太守章”，孙慰祖先生认为“潦”“辽”均为正字，“不同时期的印文都反映了当时正式的地名正体”。

在此需说明的是，书写层面的同文异写与正字法无关。曾有学者据《后汉书·马援传》注引《东观记》中的一条著名史料，即马援上书称：“臣所假伏波将军印，书伏字犬外向。城皋令印，皋字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县长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为信也，所宜齐同。”同时还“荐晓古文字者”，

由此“事下大司空正郡县印章”。该学者断定“东汉同一县的官印上用字尚且不同，可以推知秦代这样的例子应当更多”，并以此解释“出土文献中的郡名写法与史书中记载的有些不同。”事实上，马援说的“印文不同”只是书写层面的差异，并不牵涉到用字层面的统一。而且，即使同一时期的出土文献存在用字不同的现象，从法律意义来说，自然当以官印文字为准。

第四个方面，可增加对古代地名管理规则的一些理解。这方面，众所周知的是“慈溪县”，本来自唐代以降一直写作“慈溪”。明永乐十六年（1418），县令失印，重新铸印时“议者恐所失之印还复得之，必覆出为奸”，因而“更印文从谷”，即把“溪”改成“谿”。

类似情形在历史上不乏其例。《隋书·地理志上》记载：“褒城，开皇初曰褒内，仁寿九年因失印更给，改名焉。”这条史料中“九年”当作“元年”。仁寿仅三年（公元601—604）。《元和郡县志》谓此县本汉褒山县，梁改褒中县，“隋开皇元年，以避庙讳改为褒内县，仁寿元年改为褒城。”元、九形近，《隋志》所谓“九年”盖系传抄之误。《唐会要》卷七十《州县改置上》“河南道”条下称：“豪州，元和三年六月改豪州字为濠，失印故也。”《元和郡县志》卷二八信州弋阳县下亦载：该地于后汉分余汗东界立葛阳县，“隋开皇中，因失印改为弋阳县”。就是说，每当地方官失印，改铸时都要更改地名。

《汉书·地理志》汝南郡慎阳县下，颜师古注曰：“慎字本作滇，音真，后误为慎耳。今犹有真丘、真阳县，字并单作真，知其音不改也。阍駟云，永平五年失印更刻，遂误以水为心。”此说在历史上流传甚广。一般认为，该“永平”为汉明帝年号，永平五年为公元62年。2005年前后，河南省平舆县发现一批封泥，时代从秦、西汉绵延至新莽以后，而以东汉为主。其中两汉与“慎阳”相关的封泥，西汉有“慎阳丞印”“慎阳国丞”“慎阳尉印”，东汉有“慎阳丞印”“慎阳侯相”“慎阳长印”^[3]。就是说，颜师古所谓“慎字本作滇”的说法根本就不存在。经研究可知，应该是晋惠帝永平元年（291），发生了“慎阳”更名“真阳”之事。更名缘由，应确与“失印更刻”有关。所谓“误以水为心”，应该是不明就里的人推演出来的一个传说。^[4]

官印涉及国家制度。地方官失印重刻，如果刻一个跟

旧印一模一样的，万一旧印落到其他人手里，就会造成政府信用体系的混乱。一定要刻个与旧印明显不一样的，才能让旧印自动失效。然而官印的印面形制、尺寸大小、文字格式、职官信息、书写风格，都不容更改；唯一可变的便是地名信息。因此，历史上每一次地方官失印重制，必然伴随一次地名更改。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对于地名管理的一个很明显的规则。

目前关注玺印封泥资料中历史地理信息的，主要有三大群体。一是考古学者。他们有机会接触第一手资料，包括一些没发布的资料，可谓近水楼台。他们用考古手段整理玺印封泥资料，其资料的准确性和条理性基本上是可以保证的。例如王伟的《秦玺印封泥职官地理研究》一书^[5]，内容相当结实，具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二是历史地理学者。历史学研究本来主要靠文献资料，但有时文献不足证，不得不借助于出土文献和考古证据。二十四史中，只有十六部地理志，好些朝代的疆域政区缺乏系统资料。而秦代及之前的春秋战国，疆域政区状况更是散珠一地，离开玺印封泥资料，简直让研究者无所措手足。

由于专业所限，史地学者对于玺印封泥资料基本上只是利用，很少对资料本身加以质疑、检讨。偏偏有些资料来历不明，真贋难辨，以致到目前为止，史地学者对于玺印封泥资料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的利用并不十分理想。

第三是一些专业的玺印研究者，这个群体兼通文物考古、玺印文字、典章制度，对历史地理典籍也非常熟稔，因而做出了到目前为止最突出的贡献。个中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孙慰祖先生和他的团队。慰祖先生发表了大量富有卓识的研究文章，上面已经多次提到。最近他带领团队编撰了一套巨著《中国古代封泥全集》^[6]，这是一项划时代的工作。该书共15册，前12册收录10163件从战国秦汉到魏晋南北朝直至唐宋时期的封泥，内容包括图片及释文，并注明出土地、著录及收藏单位信息，基本囊括了现存于公藏机构和私藏大家手中所有可见的出土品和流传品。每个断代的地理资料按正史地理志的秩序加以排列。后3册“研究编”收录百余年来65篇经典研究文献。为学界了解和利用历代封泥资料提供了极大便利。

我曾与一些研究历史政治地理的同行讨论。马梦龙教授说，以前研究历史政区地理，对于玺印封泥资料不太敢碰；近年来由于孙慰祖先生和他团队卓有成效的工



提奚长印 执金吾印章 中山穰庙

◎ 图 1 残损封泥复原

作，已经能够让这些玺印资料能够为历史政区研究者放心地使用。

我个人感到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考古发现中有些玺印封泥资料只残存局部，在其他人的眼里只能阙疑，而慰祖先生屡有重要破获。此前在马王堆汉墓的出土资料中，他成功地将数十年无人辨识的一方残泥释读为“利豨”，大大推进了对马王堆三号墓主身份的认识。此次在编撰《中国古代封泥全集》的过程中，孙慰祖先生发挥其长技，复原出来的残泥更多，个别残泥的残损程度更加匪夷所思（图 1）。这不仅得益于他深厚的研究积累、对历代玺印封泥资料的烂熟于心，更有高水平篆刻家身份赋予他的特殊灵感。要是篆刻技术、篆刻艺术没有足够高层次的理解，断不可能凭空产生篆刻学术层面的妙悟。就这一意义而言，篆刻实践堪称玺印封泥研究的一项核心竞争力。

玺印封泥资料中的历史地理信息主要是历史政区，历史政区研究是历史地理学最重要的基础。它不仅反映历史时期政治势力的空间分布，更重要的是它作为历史地名的主体，承担着为历史资料作空间定位的作用。传世史料绝大部分是靠历史政区来定位的。在传统的沿革地理时代，研究水准是以朝代为精度单位。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将政区地理研究的精度推进到以年为单位的水平。当时研究力量有限，每个朝代只能复原一或两个标准年。之后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就讲究纵成线、横成片。即纵向时间轴上，每个政区的逐年沿革要弄清楚；横向空间轴上，每一年所有政区的共存状况要一目了然。

从这一目标出发，玺印封泥资料要充分融入历史政区

地理的研究成果当中去，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现存玺印封泥资料中的政区信息，基本上属于点状，搞清楚其来龙去脉，将沿革过程连缀成线都殊为不易，遑论成片。但无论如何，玺印封泥资料中包含那么多传世文献失载的信息，大大地提升了过去以传世文献为主要依据的历史政区地理研究的天花板。虽然目前这两个领域的交叉融合状况还不尽如人意，但可以预见，玺印封泥研究为历史地理学拓展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注 释】

- [1] 孙慰祖：《可斋论印四集》，吉林美术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81—183 页。按，此文初刊于《中国文物报·文物考古周刊》2010 年 9 月 17 日，题为《从秦官印和封泥看浙江、江东在秦代的隶属关系》。
- [2] 庞任隆：《秦郡县封泥的历史地理学意义》（载《文博》2009 年第 3 期）一文披露，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所藏秦封泥含新见地名 29 品，其中关中诸郡 10 品，山东南部诸郡 12 品，山东北部诸郡 4 品，淮汉以南诸郡 3 品，增加的都是秦县名。
- [3] 王玉清、傅春喜：《新出汝南郡封泥集》，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8、119、166、73、167 页。
- [4] 张伟然、蔡允贤：《官印与地名——“慎阳”及相关地名变迁的传说与史实》，《复旦学报》2019 年第 3 期，第 91—100 页。
- [5] 王伟：《秦玺印封泥职官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 [6] 孙慰祖：《中国古代封泥全集》，吉林美术出版社 2022 年版。

【作者简介】

张伟然：西泠印社社员、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略说早期印谱在古玺印整理方面的意义

文 / 施谢捷

搜集古玺印并辑编印谱的风气肇始于北宋。目前可以考知的最早印谱，是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杨克一辑《集古印格》。南宋至明初，陆续出现了一些辑录有古玺印的印谱，如南宋时期有颜叔夏辑《古印谱》二卷，姜夔辑《姜氏集古印谱》四卷（见吾丘衍《学古编》、徐上达《印法参同》），另有宋淳熙三年（1176）王俅辑《啸堂集古录》二卷，非专门印谱，其中收录古玺印 37 件。元代有钱选摹辑《钱舜举印谱》，亦名《钱氏印谱》，见徐上达《印法参同》、叶为铭《广印人传》；佚名辑《宝章集古》，见赵孟頫《松雪斋文集》卷六载《印史序》：“一日，过程仪父，示余《宝章集古》二编，则古印文也，皆以印印纸，可信不诬。因借以归，采其尤古雅者，凡摹得三百四十枚，且修其考证之文，集为《印史》，汉魏而下典型质朴之意，可仿佛而见之矣。”赵孟頫摹辑《印史》二卷，见赵孟頫《松雪斋文集》卷六、卢文弨《补辽金元史艺文志》、钱大昕《元史艺文志》等；吾丘衍辑《古印式》二卷，亦名《学古印式编》《汉官威仪》；吴福孙辑《古印史》，见黄缙《吴君墓志》、叶为铭《广印人传》；吴叡摹辑《汉晋印章图谱》一卷，亦名《吴氏印谱》《吴叡集古印谱》《吴孟思印谱》，见沈明臣《顾氏集古印谱序》、徐上达《印法参同》、卢文弨《补辽金元史艺文志》、钱大昕《元史艺文志》，明、清学者所称

南王厚之辑《复斋印章图谱》即为此谱，收录古玺印 92 件；杨遵辑《杨氏集古印谱》，见沈明臣《顾氏集古印谱序》；申屠致远辑《申屠致远集古印章》二卷，见《山东通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卢文弨《补辽金元史艺文志》、钱大昕《元史艺文志》、叶森辑《汉唐篆刻图书韵释》等；明代初有沈津辑《沈润卿刻谱》、陶宗仪九成辑《古人印式》、郑烨辑《汉印式》等，另郎瑛仁宝《七修类稿》五十一卷，其中卷四十二古图书收录汉魏印 56 枚。以上印谱或相关图籍除吴叡摹辑《汉晋印章图谱》一卷，亦名《吴氏印谱》《吴叡集古印谱》《吴孟思印谱》；沈津辑《沈润卿刻谱》及王俅（子弁）辑《啸堂集古录》二卷、郎瑛仁宝辑《七修类稿》五十一卷尚存传本，其他诸印谱皆已亡佚。所存者均是雕版印刷而成，印文经过摹写翻刻，失真的情况非常严重。

直到明隆庆六年（1572），顾从德辑《集古印谱》（后称《顾氏集古印谱》），首次采用古玺印原印铃盖成谱，共收印一千八百余方，在印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影响极大。《顾氏集古印谱》与稍后编成的杨元祥《杨氏集古印章》、范汝桐《范氏集古印谱》、汪关《宝印斋印式》（卷一为古玺印）、郭宗昌《松谈阁印史》、王季安《清华阁印史》、赵子函《霏香馆印史》等，都是早期原铃印谱的代表。原铃印谱出现后，由于珍贵不易得，用木板翻

刻并附以释文的印谱大量出现，如王常先后编集的《印藪》（又名《王氏集古印谱》）、《秦汉印统》等。因为篆刻的印人需求量大，像本来由顾从德监修的《王氏集古印谱》更是出现了大量现在意义上的“盗版”。同时，还陆续出现了一批以印石摹刻古印铃盖而成的印谱，如张学礼《考古正文印藪》，甘旻《集古印正》，程远《古今印则》、陆鏞《片玉堂集古印章》、潘云杰《集古印范》、赵凡夫《赵凡夫先生印谱》（1625 年前刻就）等。这类版刻和摹刻印谱基本都是取材于《顾氏集古印谱》《杨氏集古印章》《范氏集古印谱》等原铃印谱，因为刻工的原因，质量良莠不齐。与《顾氏集古印谱》等原铃印谱相较，其中赵凡夫摹刻《赵凡夫先生印谱》诸印最为逼真，除了赵本人摹刻功夫高明，显然是有原铃印谱对照的。但大多版刻和摹刻类印谱印文经刻工或印人摹刻，往往存在程度不同的失真。尽管如此，明代的版刻和摹刻印谱中收录有不少没有流传到后世的玺印，其印文内容无疑还是很有意义的资料，而且对我们了解当时诸家所藏所见玺印状况，也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在整理诸印谱收录古玺印资料的过程中，发现早期印谱中著录的子母套印有在流传过程中子母印失散的情况，如《范氏集古印谱》第 3 册第 37a_2 著录的一件“袁子游印·袁偷之印”子母套印，后来子母两印分散，母印现藏湖南省博物馆，铃本及印体照片见于《湖南古代玺印》等印谱；子印下落不明，《十钟山房印举》等印谱，其间关系被完全割裂。如果没有《范氏集古印谱》著录的帮助，可以说是完全无法发现这种子母印失散情况的。

	《范氏集古印谱》第 3 册第 37a_2	袁子游印·袁偷之印
	《湖南古印萃珍》第 087 页_5 《湖南省博物馆藏古玺印集》294（有照片） 《湖南古代玺印》第 073 页_17（有照片）	母印
	《十钟山房印举》第 5 册第 1390 页_5	子印

自明代《顾氏集古印谱》问世以来，古玺印收藏及辑录印谱之风渐盛，伪仿之印也随之大量出现。由于《顾氏集古印谱》《范氏集古印谱》等原铃印谱制作数量极少，流传不广，当时的伪仿之印所据的应该大多是失真程度不一且流传较广的明代版刻或摹刻印谱。在清代初期就有不少明代的伪仿之印进入了内府的收藏，如《金薤留真》《清内府藏古玉印》所收录伪仿之印多仿自明代印谱。清末、民国是藏印辑谱的空前兴盛时期，几乎没有不收伪仿之印的印谱，甚至有个别的所谓集古印谱几乎没有真印，如汪启淑的《汉铜印原》、杨守敬的《缪篆丛雅》（亦名《激素飞青阁藏印》）、沈煦孙《师米斋所藏古铜印》（一、二集），其他的只是收录伪仿之印数量多寡不同。在不知古玺印实物或实物不存的情况下，像《顾氏集古印谱》《范氏集古印谱》一类原铃印谱对我们鉴别、判断伪仿之印也有特别的意义，下面试举五例说明。

一、《古玺汇编》266 著录下揭一铜印

此印（图 1）最早出现在《读雪斋印谱》，后为罗振玉所得，著录于《赫连泉馆古印续存》《雪堂藏古玺印》及《陈簠斋手拓古印集》等谱，近年出版的《印典》《中国玺印类编》《篆字印汇》《先秦印风》等亦据以收录。其实此印当是仿自《顾氏集古印谱》上图本第 11 册（亦见于西泠印社藏本卷五、王绍尊藏长卷本）著录的一件同文玉印（图 2）。



◎ 图 1 《古玺汇编》266 著录下揭一铜印



◎ 图 2 《顾氏集古印谱》上图本№ 11 同文玉印

《赵凡夫先生印谱》日本服部氏藏本第 9 册、日本平盒藏本第 6 册、日本帝图藏本第 9 册及《甘氏集古印谱》第 4 册第 24a、《古印选》第 4 册第 25b 收录此印摹刻铃本，《古玉印汇》第 25 页收录此印颖拓本。铜印印文当是据明《王氏集古印谱》北大藏姚起刻本第 5 册第 6b、《秦汉印统》第 7 册第 10a 一类失真版刻或摹刻印谱所收录此玉印的印文仿作，笔画稍有改变。



◎ 图 3 《善斋玺印录》卷上著录下揭一铜印



◎ 图 4 《俞氏爱园印藪玉章》4-7a 有下揭一坛钮玉印



◎ 图 5 《善斋玺印录》卷上著录下揭一铜印



图 7 《古玺汇编》3702 著录下揭一故宫博物院藏玉印



◎ 图 7 《古玺汇编》3702 著录下揭一故宫博物院藏玉印



◎ 图 8 上图本《顾氏集古印谱》№ 12 有覆斗钮铜印

二、《善斋玺印录》卷上著录下揭一铜印

此印（图 3）较早著录于《徵赏斋秦汉古铜印存》第 5 册，《中国玺印类编》亦据以收录。检《顾氏集古印谱》上图本第 11 册及王绍尊藏长卷本、《俞氏爱园印藪玉章》第 4 册第 7a 有下揭一坛钮玉印（图 4）。

《赵凡夫先生印谱》日本服部氏藏本第 12 册、日本平盒藏本第 8 册、日本帝图藏本第 6 册收录此印摹刻铃本，《古玉印汇》第 21 页收录此印颖拓本。《善斋玺印录》著录铜印印文当是据明《王氏集古印谱》北大藏姚起刻本第 6 册第 17a、《秦汉印统》第 8 册第 28b 所收录此玉印的失真刻本仿作。至于印钮则应该出于猎奇臆造。

三、《善斋玺印录》卷上著录下揭一铜印

此印（图 5）较早著录于《徵赏斋秦汉古铜印存》第 5 册，《中国玺印类编》亦据以收录。检《顾氏集古印

谱》上图本第 11 册（亦见于西泠印社藏本卷二、王绍尊藏长卷本）有覆斗钮铜印（图 6）。《赵凡夫先生印谱》日本服部氏藏本第 12 册、日本平盒藏本第 8 册、日本帝图藏本第 12 册、徐林藏本第 12 册，《集古印范》日本帝图藏本第 2 册、《秦汉印范》东北图藏本第 2 册收录此印摹刻铃本，《王氏集古印谱》北大藏姚起刻本№亦收录玺印木刻摹本。《善斋玺印录》著录铜印印文与《顾氏集古印谱》著录者极为近似，唯文字点画细节稍有差异，显然也是伪仿之作。

四、《古玺汇编》3702 著录下揭一

此印（图 7）亦见于《尊古斋古玉印选》一册本、二册本（第 1 册）、《石庐古铜印赏》第 1 册、《玺印集林》第 1 册、《陈簠斋手拓古印集》第 1 册等，近些年的《先秦印风》第 98 页、《中国篆刻全集》第 1 册、《古印精粹》第 13 页、《战国玺印分域编》、《中国玺印类编》等



◎ 图 9 《王氏集古印谱》
木刻摹本



◎ 图 10 小林斗盒旧藏
玉印名品铃本



◎ 图 11 小林斗盒旧藏
玉印名品拓本



◎ 图 12 《古玉印集存》
456 著录印文



◎ 图 13 《顾氏集古印谱》
王绍尊藏长卷印文铃本



◎ 图 14 《古玉印汇》
p77 摹写作



◎ 图 15 《顾氏集古印谱》
印文形体



◎ 图 16 小林斗盒《枫园集
古印谱》原印铃本

亦据以收录。检上图本《顾氏集古印谱》第 12 册有覆斗钮铜印（图 8）。重出一印拓。《王氏集古印谱》北大藏姚起刻本第 6 册、《秦汉印统》第 8 册、《集古印范》第 10 册、《秦汉印范》东北图藏本第 6 册亦收录此印，其中《王氏集古印谱》木刻摹本作（图 9）。知前揭《古玺汇编》所著录故宫博物院藏玉印显然是伪仿之作，制作者也可确定未见过原印铃本，所据亦是《王氏集古印谱》《集古印范》一类版刻或摹刻印谱。

五、小林斗盒旧藏玉印名品

铃本（图 10—11）曾著录于《枫园集古印谱》第 5 册、《好晴楼藏玉印》第 45 页、《太田孝太郎コレクション中国古印》第 8 页、《小林斗盒先生文化勋章受赏纪念——斗盒藏印》第 31 页、《怀玉印室藏印选》第 23 页、《书道全集》第廿七卷第 118 页、《战国秦汉古印式》

十六、《秦汉鸟虫篆印选》第 92 页、《鸟虫篆大鉴·鸟虫篆印谱》44、《中国玺印篆刻全集·玺印下》986、《古玉印精萃》第 97 页、《古玉印集存》456、《中国篆刻全集》第 2 册第 116 页、《汉晋南北朝印风》第 3 册第 144 页、《秦汉印典》第 610 页、《中国古代玺印大典》06623、《古印精粹》第 242 页、《汉印精华》521 等；拓本著录于《新见古代玉印选续》045、《好晴楼藏玉印》。其中《古玉印集存》456 著录印文如图 12。来源标注作“顾”，即《顾氏集古印谱》。检《顾氏集古印谱》王绍尊藏长卷（亦见于西泠印社藏本卷三）印文铃本作（图 13），《古玉印汇》p77 摹写作（图 14）。《赵凡夫先生印谱》日本平盒藏本第 4 册、日本服部氏藏本第 6 册、日本帝图藏本第 6 册、徐林藏本第 6 册亦如此，与《顾氏集古印谱》印文形体（图 15）完全吻合。至于《篆字印汇》p1083 收录印文则当取自《古玉印汇》。仔细比对《顾氏集古印谱》与小林斗盒《枫园集古印谱》的著录的原印铃本（图 16），二

者还是有差异的，主要是“程”字所从“禾”旁、“竈”的“𦉰”旁所从“𠂔”的写法。可见小林斗盒旧藏应该与《顾氏集古印谱》所著录的并非同一印。《古玉印集存》456 选用小林斗盒藏印之印拓，出处却标注“顾”，可能是疏于对二者的仔细比对所致。《古今印则》尚古斋藏本“玉印”第 4a_6 亦著录一同文玉印摹刻铃本（图 17）。

从印文笔画的细节特征看，这应该是与《顾氏集古印谱》所著录者不同的另一件同文玉印，印主应该是同一个人。小林斗盒旧藏玉印或许就是《古今印则》原先所依据摹刻之玉印。不过，如果《古今印则》著录之玉印确实系依据《顾氏集古印谱》所著录之玉印摹刻，呈现的印文笔画的差异系摹刻失真所致，则又该另当别论了。

附录：同一人两印或多印同出例

铃本	摹本	印文	出处
		刘先臣	铃本：《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玺印》244、《顾氏印藪》《原拓顾氏印藪选粹》102、《顾氏集古印谱》（鲁庵本）第 3 册第 76 页_11、《古玉印集存》236。 摹本：《古玉印汇》第 141 页_2、《篆字印汇》第 116 页、《王氏集古印谱》（北大藏姚起刻本）第 3 册第 47b（未注钮式）、《秦汉印统》第 5 册第 30a_5（未注钮式）、《秦汉印范》（东北图藏本）第 3 册第 39b、《古今印则·玉印》第 5a_3。
		刘先臣	摹本：《秦汉印统》第 5 册第 30a_6（螭钮）。
		刘犯	铃本：友人提供印蜕。 摹本：《虚无有斋摹辑古玉印（增订本）》453（318）、《虚无有斋摹辑汉印》1428。
		刘犯	铃本：友人提供印蜕。 摹本：《虚无有斋摹辑古玉印（增订本）》453（318）、《虚无有斋摹辑汉印》1428；徐州博物馆藏；另有同人的铜质穿带印“刘犯·臣犯”。
		刘慎	摹本：《虚无有斋摹辑古玉印（增订本）》458（323）、《虚无有斋摹辑汉印》1439、《图说鸟虫印》第 17 页。
		刘慎	摹本：《虚无有斋摹辑古玉印（增订本）》459（324）、《虚无有斋摹辑汉印》1440、《图说鸟虫印》第 17 页；徐州博物馆藏；另有同人的铜质穿带印“刘犯·臣犯”。

续表：

钤本	摹本	印文	出处
		蛮禾	钤本：《古玉印集存》450（文物）、《篆字印汇》第 1073 页。
		蛮禾	钤本：《古玉印集存》451（文物）
		陈请士	钤本：《陕西新出土古代玺印》1133、《古印趣话》第 52 页、《篆刻——中国国粹艺术读本》第 66 页、《西安龙首原汉墓》第 191 页图一一五：5、《西安文物精华·印章》223、《古玉印集存》326（考古）、《中国玺印篆刻全集·玺印（下）》616、《陕西出土汉代玉器图版》7（有照片）、《汉晋南北朝印风》第 2 册第 66 页 _2。 摹本：《虚无有斋摹辑古玉印（增订本）329。
		陈请士	钤本：《陕西新出土古代玺印》1132、《中国美术全集·篆刻》第 42 页 _2、《古印趣话》第 51 页、《篆刻——中国国粹艺术读本》第 66 页、《西安龙首原汉墓》第 191 页图一一五：4、《中国玺印篆刻全集·玺印（下）》614、《西安文物精华·印章》224、《陕西出土汉代玉器图版》8（有照片）、《汉晋南北朝印风》第 2 册第 66 页 _1。 摹本：《虚无有斋摹辑古玉印（增订本）330。
		赵召臣	摹本：《虚无有斋摹辑古玉印（增订本）720（521）。
		赵召臣	摹本：《虚无有斋摹辑古玉印（增订本）721（522）。
		赵召臣	摹本：《虚无有斋摹辑古玉印（增订本）722（523）。

【作者简介】

施谢捷：西泠印社社员、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

关于印学研究学院化的观察与思考

文 / 田振宇

不只是印学研究，包括书法、绘画的理论研究，近数十年来，已呈现出学院化的显著倾向。所谓学院化，是指来自高等院校书法艺术专业，经过系统学术训练的学者撰写的研究文章已经成为相关领域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前些年，书画篆刻创作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学院派的称呼，并成为关注焦点，笔者认为在理论研究方面，“学院化”同样是不可忽视的现象。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关于书学、印学的文章很多均来自杂志，如上海的《书法》《书法研究》，北京的《中国书法》《书法丛刊》，杭州的《西泠艺丛》，还有专业类报纸如《书法报》《书法导报》等，信息渠道相对单一。刊载内容方面，除名家名作、技法介绍等普及性文章占比较大外，也有艺术批评、史料考证等专业研究文章。当时这些文章的作者来源多元，除专业从事书法教育的工作人员外，更多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专家及民间爱好者，很多做理论研究的同时也是书法篆刻的创作者和实践者，尤其老一辈书法家、篆刻家，往往身兼二职，还有本身从事文史领域、兼善书法篆刻的专家，为包括印学在内的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改革开放后，由浙江美术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等院校开辟的高等书法专业教育登上历史舞台，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从本科到博士的高等书法教育，已成为培养人才的主要途径。约十年前，刘天琪在《当代书法发展与学院式书法教育的几个相关问题》一文中指出：“中国书法家协会近五年举办的全国展、单项展中，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人选、入展和获奖的作者都有受过书法高等教育或者有过在高等院校书法专业进修的经历。而在这百分之七十五的作者中，30 岁以下的作者中百分之九十是书法专业的毕业生。另一个数字更能说明问题，在全国第七届、八届书学讨论会的人选及获奖作者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都是书法专业毕业的本科生或研究生。”^{〔1〕}时至今日，这个数字比例恐怕只会更高，尤其在理论研究领域，“学院化”的程度相比创作更为普遍。

在此简要分析形成理论研究“学院化”的背景与原因。第一，源于高等书法专业教育的迅速发展。伴随着中国大学扩招的方兴未艾，在提高全民教育水平的国策方针指引下，开设书法专业，或者设立有关方向的院校比例大幅上升，涵盖艺术类、师范类、高职类、综

合类院校，截至 2022 年的统计，目前有近 300 家高校开设书法专业，具有本科招生资格有 145 所，有硕士研究点的 110 所，设立书法博士研究点有 22 所。书法学科或作为独立艺术门类，或附属于美术、设计等其他专业，招收的学生数量和教师岗位数量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随着近年国家对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视，加大包括书法篆刻在内的传统艺术的普及教育，书法正成为各高等院校的常设专业。就学书法专业的学生、从事相关教育的老师，二者绝对数量的提升，成为书法印学理论研究目前和未来的主力军来源。客观上，近年各高等院校已经成为培养书学以及印学理论人才的高地。

第二，高等学院教育本身具有的优势。

目前的高等院校书法专业师资力量都会要求除技法创作外，还需要配备负责理论研究的师资，课程也会包括书法史（印学史），书学（印学）理论、美学、文史基础、学术论文撰写等课目，要求学生在掌握书法技能的同时，了解关于书法的基本理论，进而有独立研究的能力。经过多年发展，课程设置、进度安排等都已比较成熟，学生在求学中，可以得到循序渐进的系统教育，掌握文献检索、学术研究、论文撰写等正规的方法技巧。完成学术论文的撰写，也是各级书法专业学生毕业的基本要求。高层次研究生教育，对于求学期间发表的论文数量、刊物等级等都有更高更细的要求。一般博士研究生都要求在学期间至少发表 2 至 3 篇核心期刊，方能取得毕业资格。

另一方面，高校教师群体，也是学术理论研究的主体。评估教师资格能力中关于科研的部分，目前主要依靠的还是论文和课题申报，与职称待遇等直接挂钩。另外知网等学术检索评价平台的出现，科研评分对学校排名的影响等等，都增强了学校对教师科研方面的重视程度，论文写作水平，发表数量和刊物等级，成为与教师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大事。

在高校从教的教师和经过高校教育培养的学生，在学术论文写作上体现了很强的优势，不论在论题的选择、讨

论过程中的问题意识、论文的结构组织，还是论据的查找、文字语言引证的规范性等方面，经过学术训练的往往更容易脱颖而出。

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各级研讨交流、竞赛活动、期刊编审、课题申报等学术相关的活动中，拥有高校专业背景的专家学者占据了评审或特邀出席嘉宾中对高的比例。可以说，目前的学术生态中，高校占据了理论研究的学术话语权，因此相对创作而言，理论研究更能凸显“学院化”的倾向。

综上所述，包括印学在内的书学研究，呈现“学院化”的局面是改革开放后近数十年来艺术教育、学科建设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提升学术研究的规范化、提高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培养理论研究人才等方面都有积极正面的引领作用。

在承认理论研究已经学院化的前提下，我们也有必要审视和反思其中存在的潜在问题。

首先，需正视研究时间和研究深度的矛盾。

学术研究本身有其规律，需要一定时间和相当精力的投注。就高校学生而言，一般本科或研究生，在 3 至 4 年的学时中，会选择某一课题作学位论文，从无到有，投入研究，完成论文，并由导师给出指导建议，把控论文质量。掐头去尾，大部分情况下，真正能投入钻研的时间最多 1 至 2 年。除非先前已经有较好的积累，这些时间要把研究做到深入透彻是远远不够的，并且这期间还要兼顾发表其他论文，因此，往往只能从个案或者粗泛的角度讨论，以求时效性，尽快能出成果，这难免会使得研究的质量受到局限。另一方面，在完成毕业论文后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的学生比例很低，严峻的就业压力造成很多原本在学校中已取得一定成绩者，在毕业后需要面对放弃原有研究方向甚至转行的局面，开了好头却没有机会继续研究下去，也常常是令人扼腕的。

其二，要警惕学术研究中的“万金油”现象。

作为包括在校学生在内的年轻学者，能够在有限时间内做好某一课题已实属不易，但在现实情况中，往往是为了投稿中选，需要面对主题跨越幅度很大的状况。每年各机构主办的研讨会主题不一，从古代到当代，从艺术史到艺术教育，从理论批评到人物研究，一般来说需要有针对性，特别是学有所长的学者论文，但这也为一些精于写作套路者提供了机会。他们往往不需要对相应的课题有足够积累，只需通过日益发达的数据库，快速检索以往研究成果，迅速阅读提炼作者观点，或者找某一本某一件新公布出版的资料，使用在学校中学到的，已经驾馭熟练的学术论文写作技巧，就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一篇像模像样的论文来。这种作文手法，与目前正当红的人工智能问答方式实乃异曲同工，即综合前人成果经验，结合一点相关的新材料，找一个角度或观点，用一套行文格式，快速成文。快餐化的论文，形式规范均无可挑剔，有些投稿中选概率还很高。而等论文入选以后，作者大概率是再也不会碰同类题材，除非再有相近的主题征稿。像这样什么题目都能写的“万金油”式研究，实质是不想靠费时费力的积累，企图用一套速成办法走捷径。如同现在各种书法篆刻展览常见的情况一样，不管什么字体风格，只要事先做好集字功课，完成布局，加上一顿突击练习，再迎合一点评委的趣味，就能搞出一件看似像样的作品来。但如果认真去看他们的作品，阅读他们的文章，往往会有选题观点似曾相识之感，由于缺少真正的原创，而难以留下深刻印象。

媒体环境的变化，书法从业者人员结构的变化，都导致了今天的印学研究书学研究不可能再回到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主要来自民间自发的局面。从书法界的几十年发展可以看到，书法高等教育的出现，已经使全民参与的书法学习创作向“学院化”占主体的方向转化，而社会对书法篆刻的认知标准与学院教育之间已然形成了一定的鸿沟。这个过程是伴随着书法篆刻在大众生活中的地位不断削弱而产生的，也就是说这类传统艺术，正在从民间不断退缩到象牙塔，创作实践如此，理论研究也是如此。这是从业者

们需要警觉的，即如何让今后的书学、印学研究突破“学院”围墙所限，从象牙塔出发，进而带动民间研究力量，让更多人认识和关心，鼓励大众参与，鼓励有深度和广度的研究，这需要高校还有包括西泠印社在内的专业社团继续努力。

【注 释】

[1] 刘天琪：《当代书法发展与学院式书法教育的几个相关问题》，2012“中国书法金陵论坛”入选论文，全文见于求雨山文化名人纪念馆网站之学术动态板块“金陵论坛”栏目，网址：<http://www.njgys.com/content.html?id=154>。

【作者简介】

田振宇：西泠印社社员、嘉兴南湖学院书法教师。

书籍史：明代印谱研究的一个面向

文 / 孙志强

明代印谱数量众多，目前尚传世与已佚明刊本印谱数量超过 200 种。从外在形态上来说，印谱是一种形式特殊的书籍，它的核心内容是印章。对明刊本印谱的研究，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版本学、目录学与艺术学方法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应当将明刊本印谱放置在明代书籍刊刻的大背景中进行讨论。一方面，要还原印谱本身的生成史，不能孤立地将印谱抽离出明代晚期的刻书环境。这种关注视角，强调的是印谱这一事物动态的生成变化，而非静止的“物”。另一方面，要从单纯关注文本转向关注印谱与读者的关系史。印谱是印学知识的物质载体，只有当印谱被阅读，知识才能得以交流，此时的文本才有意义。前者是书籍史的研究角度，后者可看作阅读史 (History of Reading) 的研究角度。

这里并非说传统的版本学、艺术学研究没有意义。版本学所关注的一部印谱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最终要落实到艺术史层面上。作为特殊类型的古籍，与明清小说刊本、版画书籍等领域研究相比较，目前学术界对于明刊本印谱的认识尚需进一步深入，小林宏光对万历年刊本画谱的研究颇具提示意义：

在我们进一步讨论之前，我想在这里指出“出版程序”的概念。当根据某些问题分析个人绘画手册时——谁编辑了它？包括哪些信息？省略了什么？在哪里发表的？谁可能是它的目标受众？它的出版目的是什么？……明代出版商的市场定位可以通过这些书籍的布局和格式、插图的选择以及出版的环境和背景来识别。从这些方面来看，综合画谱的演变，将其置于万历时代的历史语境中，呈现出一幅晚明文化发展的时空图景。^[1]

何 谷 理 (Robert E.Hegel) 在 其《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明清插图本小说阅读》) 中译本序言也曾论及：

关于原始读者群的问题必须涉及对小说创作者文学社交圈的研究，这也是中国学者经常采用的研究方法。这样的研究能够给书籍传播问题一些启示：谁能够购买这些书籍？他们在哪里购买？这些书的印数有多少？它们在出版印刷时长中的寿命是多长？它们会被传播到发行城市之外的地区吗？^[2]

这一系列问题的追问实际上是西方书籍史的研究范

式。西方书籍史的研究特点之一是“强调书籍史中的各种动态过程，不将书籍看作静态之物，而是将书籍看作具有广泛社会联系的、活跃的、有生命的主体。这一动态过程包括书籍的生产、印刷、销售、流通等。”^[3]以下以明刊本印谱的出版地与书坊为例，略谈书籍史角度研究明刊本印谱的可能性。

一、明刊本印谱出版地点

明刊本印谱的出版地点十分重要，如果单纯依靠编纂者的籍贯来判定印谱的出版地，往往会与史实不符，典型的例子是休宁海阳人程原《忍草堂印选》一谱。明天启六年（1626），海阳程原集何震印章五千余方，令其子程朴从中选择部分摹刻成《忍草堂印选》二卷。因是谱卷端页署“海阳何震长卿篆，同邑程原孟长选，男程朴元素摹”，所以历来讨论该谱的研究，大部分都将该谱看作徽州地区印谱的代表，更有学者依据是谱论证晚明何震印风在其家乡徽州的传播与影响，这实际上是有悖于史实的。在是谱《自序》中，程原云：

甲子九月，潘长公藻生自白门归，茅次公远士自武林归，或购石，或蒐谱，一流传有自，绝无赝鼎，又檄四方好事邮寄者，共得五千有奇……天启丙寅阳至日，广平程原敬识于苕上之忍草堂。

程原上述序言包含信息量极大。首先程原署款中所记“敬识于苕上之忍草堂”，已经表明忍草堂的地点在“苕上”。“苕上”即是苕溪，在湖州。又如陈赤《序忍草堂印选》云：“过吴兴而不识六水氏父子，识六水父子而不观其篆，犹之买椟而还珠也。”董斯张《吴兴艺文补》卷七十载卢舜治《程六水过草堂写余小像》一诗。^[4]皆是程原父子客居湖州的证据。到这里，实际上已经确定《忍草堂印选》的出版地点在湖州。其次，程原序中表明该谱虽由其主事，但尚有潘藻生、茅远士二人参与其中“或购石，或蒐谱”。即已确证该谱在湖州刊刻，则序中之“茅次公远士”其人不能不令人联想起湖州刻书家族归安茅氏。茅远士正是归安茅暎。茅暎又名茅元玠，茅坤之孙，茅国缙之子，茅元仪之弟。归安茅氏是湖州重要的世家大族与刻书家族，自茅坤之后，茅氏刊刻书籍百余部，约 1800 卷。^[5]茅暎也有重要的刊刻活动，泰昌元年（1620）

茅暎刻本汤显祖《牡丹亭》朱墨套印本四卷^[6]，另有评辑《词的》朱墨套印本四卷。

程原文中的潘藻生生平不详，但在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中有其蛛丝马迹，《书志》卷十八著录宋代湖州士人倪思《经鉏堂杂志》八卷，此本刊刻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吴兴潘大复刻本，丁丙云：“前有万历庚子仲春花旦吴兴居实子潘大复序，又倪文节公《宋史》本传后有潘振藻藻生跋。”丁丙所言“潘振藩”乃潘振之误，笔者阅到国家图书馆所藏此版本《经鉏堂杂志》，书末存潘振跋，署款“辛丑（明天启元年，1621）改元菊月，潘振藻生识于听莺山房。”^[7]由此可知，潘振及其父皆有刻书活动。

现在再来看程远序言中所言“潘长公藻生自白门归，茅次公远士自武林归，或购石，或蒐谱”即可对茅暎与潘振在《忍草堂印选》成谱过程中的作用有不一样的认识，“购石”与“蒐谱”表明此二人参与了具体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忍草堂印选》中选取了四方茅坤四子茅维的印章，分别为卷二第五页后幅“茅孝若”白文印、第六页前幅“茅维之印”白文印、第十二页后幅“茅维之印”白文印、第十六页“孝若”白文印，茅维是茅暎之叔父，这四方印极有可能是茅暎所定，看作茅暎的私心也未尝不可。

确定了是谱的出版地与参与者，另一个问题又呼之欲出——即该谱与湖州地区刻书氛围有没有联系？董捷在研究明末湖州地区所刻版画时，特意指出明末湖州晟舍（闵氏、凌氏）、花林（茅氏）两镇的刻书业“是一种趋于专业化的工商业行为”，这一论调虽然不针对明刊本印谱而发，但对于明刊本印谱研究不无启发意义。尤其是在《忍草堂印选》中发现茅氏家族成员的参与，更能确定这一点。《忍草堂印选》虽然不是茅暎主持编刊，但茅暎家族专业化的刻书活动，在该谱的成书过程中定会发挥其作用。如果再将《忍草堂印选》放置到晚明湖州刻书氛围中来观察，恐怕该谱并非程原、程朴父子推崇何震印作这么简单。明万历末年与天启年间正是何震印风最为流行的时候，虽然天启年间世上已无何震之人，但印学史上的“文何印风”之变仍在继续，何震印风已经逐渐取代文氏典范，成为印坛主流。取法何震就必须看到何震原作，但原作并非易见，据其印作重新摹刻成谱，是最为便捷的方

式，这一点其实在陈继儒为程原所作《印选序》中已经能够体会到：

新安何雪渔先生去世二十余年，海内购其印章如古玉铜器，近见程长公《印选》，又雪渔之后世子云也。

以湖州归安茅氏的出版嗅觉，加之潘振的刻书经历，不难发觉其中的奥秘，故而也就容易理解为何程原非要等到明天启四年（1624）潘振、茅暎从南京与杭州回到湖州再行购石、蒐谱，展开该谱的编刊工作了。我们再来回忆一下程原的自序：

甲子（1624）九月，潘长公藻生自白门归，茅次公远士自武林归，或购石，或蒐谱，一一流传有自，绝无贗鼎，又檄四方好事邮寄者，共得五千有奇。

“绝无贗鼎”的说法正是表明该谱对何震印作的忠实程度，在后期发行过程中起到广告效应。明万历以降，不惟集古类印谱具有商品、范本性质，名家自刻印印谱也同样应作如是观，像程原《忍草堂印选》异地刊印成谱的例子还有许多，暂不枝蔓。

二、书坊

对印谱出版地的讨论集中于某一地区的印谱刊行之风，书坊则进一步将讨论的范围缩小至具体的成谱空间。对印谱出版地的讨论，更多地集中于地域印学传播，而对于书坊的讨论，则更集中于印谱刊刻的商业行为。“书坊”一词多涉及商业出版，所刊刻的书籍多以“坊刻本”称之。通常而言，书坊主的社会阶层与地位相对较低，在书籍质量上坊刻本较官刻本、家刻本要差。但也要注意，有些时候坊刻本与家刻本并不容易清晰区分，尤其是明代嘉靖、万历以降，坊刻本中的精刻本又有超越家刻本之趋势，大木康已经指出坊刻本的这种特性。^{〔8〕}坊刻本与家刻本之间的界线渐趋消解的原因，一是从书坊这一实体来看，明代嘉靖、万历时期“书坊”“坊刻”的称谓涵盖了多种刻书实体，如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指出的，书坊“包括以家族为基础进行长期经营的印刷者（如建阳的出版者）、参与到出版业中来的书铺老板或书商、出版藏书以盈利的藏书家”，并且周绍明特别强调：“可能还有那些转向出版业的士人家庭，他们把出版作为一种增加声望、或许还有收入的体面的方式。”^{〔9〕}二是从书坊主这一群体

来看，明嘉靖、万历时期，传统四民之界线渐趋消解，士人参与商业出版之现象也屡见不鲜，如无锡顾起经、顾起纶家族、乌程闵齐伋家族、凌濛初家族等的商业刻书，这使得坊刻与家刻之间的界线渐为模糊。此时，“书坊”仅代表一个刻书的场所，而不作为判别社会阶层与身份贵贱的指征。^{〔10〕}

明嘉靖、万历时期的书坊刻书，不论书坊主的身份如何，对利益的追求是一致的，反映到明刊本印谱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在明刊本印谱中明确标注书坊名号的，绝大部分为集古（摹古）类印谱，少量为摹古与名家自刻相结合印谱，纯粹的名家自刻印印谱仅一二件。这些带有书坊名号的集古类印谱的共同之处是体量大，耗时久，费资多，它们的刊刻、发行需经由专业的书坊为之操持是符合书籍成书规律的，这就提示我们注意，经由书坊所刊行的印谱带有商业性质，并且是以篆刻范本的性质流通、发行、销售。（经由书坊刊行的明刊本印谱一般会有书坊名称，部分印谱虽未明确标注出书坊名称，但通过其他史料，能够确定该谱出自书坊，如刊行陈钜昌《古印选》的沈氏梅居。）

以上书坊绝大多数都有多种书籍刊印行世，印谱仅仅是这些书坊刻书活动中的一部分，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书坊所刻其他书籍基本以集部为主，并且非为家族成员所刻文集，而是以较为流行的、受众面较大的历代文集为主，故而它们并非家刻本，合理的解释即是这些集部书籍是作为商品流通的，与这些集部书籍同出自一个书坊的印谱其性质也就不言自明。

余论

对于明刊本印谱动态地生成变化的考察，首先要突破将印谱看作静止的“物”的局限，对明刊本印谱成书过程的“人”，如编纂者、篆刻者、编集者与编著者，印谱中的校、阅、选、注人员、序跋人等考察对于我们理解明刊本印谱的性质至关重要。此外，明刊本印谱的出版时长、成本与资金来源，流通过程中的广告营销策略、发售价格、流通渠道与版权意识也可以归入印谱书籍史研究之内。同时，明刊本印谱中的刻书字体（匠体、手写体）、刻工（包括写工、刊工）的选择，与印谱成本息息相关，也需要格

附明代书坊所刻印谱举隅（部分）：

书坊	书坊主	地点	所刻印谱	所刻其他书籍
顾氏芸阁	顾从德	上海	《印藪》	杨循吉《松筹堂集》十二卷（三十二卷）[顾氏家族另刻有《医说》十卷、《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二十四卷、《类编草堂诗余》四卷、《南唐书》三十卷等。]
沈氏梅居	沈思	云间	陈钜昌《古印选》	唐寅《唐伯虎集》（翠竺山房本）、莫是龙《莫廷韩遗稿》十六卷、钱福《钱太史鹤滩稿》
吴氏树滋堂	吴元维	歙县	《秦汉印统》	
孙氏知希斋	孙如兰	睢阳	《印选》	都穆《玉壶冰》一卷、孙如兰自编《荷叶露》一卷，黄松林《秋潭月》一卷
来氏宝印斋	来行学	萧山	《宣和集古印史》	《花间集》巾箱本、《杜甫诗集》《李白诗集》《王维诗集》《孟浩然诗集》（参与《镌古香岑批点草堂诗余》正集六卷续集二卷别集四卷新集五卷）
项氏宛委堂	项德葵（即项梦原）	嘉兴	《古今印则》	叶梦得《避暑录话》四卷、陆友仁《研北杂志》二卷、夏树芳《奇姓通》十四卷
周氏六书阁	周应麀	秀水	《印问》	许癭《许钟斗文集》五卷、袁宏道《袁中郎十集》十六卷
程氏滋荪馆	程大宪（《程氏墨苑》作者程大约之兄）	休宁	《程氏竹印二谱》（又名《程敬敷竹谱印章》）	《程氏雪斋竹谱》二卷等

外注意。最后，印谱读者群体的分化与印学知识共同体生成的关系是明刊本印谱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最终内容。

活动及其特征》，《古典文献研究》（第二十三辑上卷）2021年第1期。
〔6〕有关该本的叙录可参见董捷《版画及其创作者——明末湖州刻书与版画创作》附录一“明末湖州闵、凌、茅三氏刊版画录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203页。

〔7〕倪思：《经鉏堂杂志》，天启元年潘振增修万历二十八年潘大复刻本，国家图书馆藏（郑振铎旧藏本）（索书号：善15976）

〔8〕（日）大木康著，周保雄译：《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21页。

〔9〕（美）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著，何朝晖译：《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页。

〔10〕何朝晖《晚明士人与商业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267页。

【作者简介】

孙志强：西泠印社社员、华侨大学美术学院讲师。

【注 释】

〔1〕（日）小林宏光：《Publishers and their Hua-p’u in the Wan-li Period: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Painting Manual in the Late Ming》，《故宫学术季刊》2004年第2期，第168页。

〔2〕（美）何谷理（Robert E.Hegel）著，刘诗秋译：《明清插图本小说阅读》，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4页。

〔3〕程章灿：《书籍史研究的回望与前瞻》，《文献》2020年第4期，第7页。

〔4〕董斯张：《吴兴艺文补》卷七十卢舜治《程六水过草堂写余小像》，明崇祯六年刻本。

〔5〕关于归安茅氏家族的编刊活动可参见赵红娟：《明代茅坤家族的编刊

怀念方介堪先生

文 / 徐无闻

去年八月下旬，当我接到方先生逝世的电报时，不禁潸然泪下，沉痛的心情连续了好几天。蜀越万里，不及奔赴追悼，只得发出唁电，绝艺不朽，教泽长存。

我虽是五十岁时才执贄于方先生门下，但事实上在我十五六岁时，方先生已经是很敬佩的老师。我父亲益生先生从事篆刻，一以秦汉为宗，我十岁左右在他的教诲下，开始学习篆刻。那时在成都，经常看见张大千的画，对大千用印非常喜爱，但不知道刻者是谁。十五六岁时，在旧书店里认识了先师易均室先生。不久，到易先生家里，谈及大千用印，易先生便说大半都是永嘉方介堪先生刻的，随即盛赞方先生是他所结交的印家中的杰出者之一。尔后，易先生陆续拓了方先生为他刻的几十方印赐我，勉励我刻印要多向方先生学。易先生把王福厂，唐醉石，李鈇斋和方先生为他刻的印各选五方，拓成横幅，广赠同好，并系以题辞：“右耜园行笈王唐李方印十之一，海宇名胜，最此四家……介堪冥搜玉篆，旁挹邓吴……”四川人知道方先生的卓越成就，除了大千用印外，易先生的热心揄扬，起了很大的作用。

五十年代，易先生留滞成都，常以不知昔年一些印友的消息为憾。1963年夏，我游学上海，一个偶然的机会拜

识了马公愚先生，才知道方先生在温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我回成都告诉了易先生，易先生非常高兴，立即与方先生通信，并向方先生介绍了我。随后，我直接写信向方先生请教。不到一个月，方先生厚厚的一封信到我手中，他认为我的刻印路子正，有前途，他愿介绍我加入西泠印社，并亲手抄录了一份西泠印社章程。在这封信里，他不仅赐我近作印拓数十方，而且还画了一幅墨竹赐我。对一个素不识面的后辈，先生是这样的古道热肠。这虽然已是三十六年前的事了，此刻回忆起来，仍然不免很激动。我认为，这正是先生高尚品质的体现。如果我们都像方先生这样对待后辈青年，我国的文化艺术，乃至一切事业，必然会代代不断地繁荣昌盛。

从1964年起，我就遭到“左”的政治迫害，生怕许多师友受到牵连，只好中断通信。“文革”开始后，我常常悬念方先生，恐亦难逃灾祸。到了1972年，易先生已含恨逝世三年之后，我怀着一种冒风险的心情，写信与方先生联系。从方先生的回信中，果然证实了他也遭到了很大的冲击，而且经常生病。从此以后的几年，先生与我通信较多。我好几次寄呈印稿请教，先生耐心为我改稿，并亲手写稿，指示我同一印文，多种设计，最后选定的方法。先

生的亲笔印稿，和沈尹默先生教我执笔，行笔时所写尺幅，是我一生中难得的双璧，自当永为家珍。先生除应我的请求，先后为我刻印七方示范外，在他七十六岁生日那天，还刻了一方近两寸的大印赐我，印文是“成都徐永年字嘉龄号无闻收藏经籍金石书画之印”。在十年浩劫中，先生对我无私的教诲，无非是希望篆刻艺术后继有人。那时先生患病，需要四川所产贝母和大黄，这种药那时在四川也不易买到，我几次拜托在石渠等地的朋友购求，往往三四个月才寄到温州，耽误了先生的需要，至今引以为憾。

由于方先生多年的函授，我事实上已是他的学生，常常希望东赴温州，立雪程门。先生八十大庆时，我因工作紧迫，不能远行，谨撰《方介堪先生的篆刻艺术》一文，并媵诗一首为祝。1981年10月，我为整理鲍廷博校《白石道人歌曲》赴杭州查阅资料，迁道至温州，拜谒了方先生。我奉上原石已毁的《唐千秋亭记》拓本为贄，先生大为高兴。虽是初次见面，但先生视我为老学生，直爽自然，无话不谈。先生招呼我见了师母和广武、广强两兄，并嘱同门林剑丹兄于次日陪我游览江心孤屿。在这大诗人谢灵运行吟的地方，我看到了方先生多年辛勤地访求和保护乡邦文物的业绩。是日晚上，宴饮于先生家，有幸拜识了先生的老友——名诗人王敬身先生和同门张如元兄诸位。先生在饭后应我的请求，出示他的巨著《玺印文综》稿本，搜罗完备，摹写精到，都可谓空前。我深深感到，先生成为一代大家，绝非偶然，这部巨著便是他长期艰苦修炼的铁证。先生又遗憾地告诉我，这部书稿已残缺多年，他总想把它补齐，可是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实现。一年后他又写信告诉我，这部书稿准备交张如元兄补辑整理。我深感先生所托得人，因为张如元兄在文字训诂方面有很深厚的功底，为人忠厚，治学严谨，敬师尊友，都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我草拟此文时，又得悉张如元兄已将此书整理完毕送往上海出版，这部篆刻文字大型工具书不久将公之于世，造福于后世千万篆刻艺术爱好者。那天临别时，先生深感欣慰的是，他的学生们都有所成就，特别夸奖同门韩天衡兄的篆刻，并写了封介绍信给我，叫我到上海后，一定去会见天衡。

拜谒方先生后，我更感到要向先生学的东西还很多，再会甚难，而先生年逾八旬，常在病中，也不能像往年那样多通信了。1983年春，因参加《书法》杂志主办的全国

篆刻评选，方去疾先生告诉我，介堪先生正在上海住医院，我匆匆赶到医院看望他。先生说：你和你父亲对我很好，四川的一些未见面的朋友，都代我问候。我顿时觉得心酸，似乎已是最后一面了。这几年来，我老是想，等到先生九十诞辰时再去温州……

方先生将永远住在温州。他那满头丰盛的华发，爽朗的笑容，洪亮的语音，他那双筋骨突起的攻金琢玉的手，凡是见过他的人，永远也忘不了。在中国美术史上，他已归入不朽的行列。

1988年5月11日夜

早期女社员孙锦行实简述

文 / 丁如霞

我的外公吴金培，又名吴隐，字石潜，号潜泉，又号遁庵，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州山柯桥里庄村。1867年农历六月廿四日生，1922年农历四月廿三日去世。清光绪三十年（1904）始与挚友叶铭、王褀、丁仁在杭州孤山捐地筑室，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以地处西泠为名创立“西泠印社”。

外公的原配妻子姓王，山阴州山柯桥三佳村人。生有二子：潜生和熊生。潜生于1897年出生，七岁时夭折。熊生，即吴熊，字幼潜，于1902年10月出生，1967年7月去世。吴熊出生一个月，母亲王氏去世。

孙锦是外公的继室，山阴柯桥六合乡州山村人。1883年农历七月初七生，1942年农历五月十九日去世，享年59岁。生有三个儿子，即锦生、鸿生、钰生，一个女儿，即我妈妈华英。锦生生于1907年7月，于1979年2月去世。鸿生出生于1908年12月，1909年11月夭折。钰生出生于1914年11月，1919年10月去世。女儿华英生于1912年农历九月初七，1969年农历十一月十六日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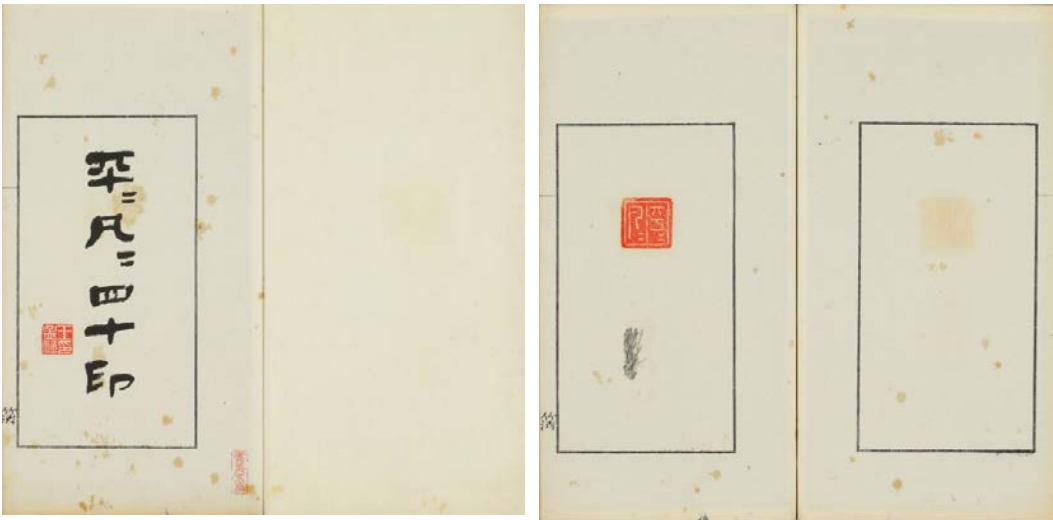
孙锦字织云，典出苏东坡《潮州韩文公庙碑》，文有“天孙为织云锦裳”句。外公吴隐于1906年娶外婆孙锦，妈妈曾回忆说，外婆很聪敏，是西泠印社最早的女社员。外婆很有才干，写得一手娟秀的楷书，擅作诗吟词。西泠印社成立后第一个修复改建的建筑物，便是粉墙黛瓦、古



◎ 图1 孙锦像

朴雅致的仰贤亭。仰贤亭里除28位先贤的篆像外，还刻有孙锦醒目的题跋一则：“仰贤亭畔锲贞珉，列宿元精妙写真。莫与云台冠箭比，昆吾寸铁更无论。”与仰贤亭旁连着的建筑是“宝印山房”。1912年孙锦在宝印山房作诗云：“颇文史籀归曾谳，周鼓奏碑子细参。底事旁搜金螭谱，令人不薄赵悲庵。”同年，建山川雨露图书室，孙锦亦作书云：“东壁图书惜古芬，山川雨露亦奇文。牙签玉轴谖觴馆，何止芝英辨五云。”

1915年吴隐在孤山西面买下了一块地，先造好的一处房子以自己的号“遁庵”为名。外婆则赋诗：“窗户青红



◎ 图2 《平平凡凡四十印》三村竹清（1876—1953）编

湿未干，水云佳处一凭栏。西湖山色玲珑甚，并作蟠螭翥凤看。”

2010年9月，时任西泠印社文物处处长的王佩智先生编著的《诗意浓浓：西泠印社园林》，考据孙锦在西泠印社曾有诗词字迹20处，可惜百年风雨沧桑，多数没能留下。

外公外婆年龄相差16岁，二人志同道合，佳偶天成。外婆也会篆刻，并善拓印、拓砖及拓金属器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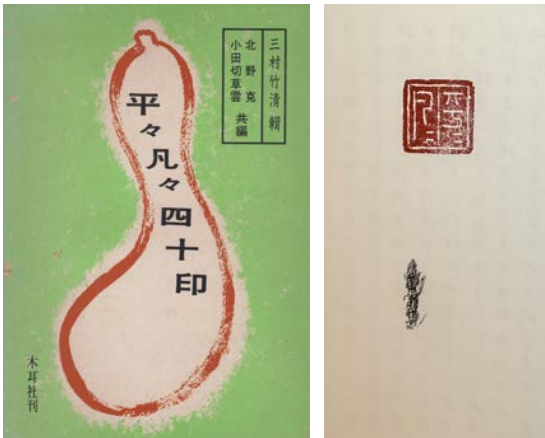
1913年11月，孙锦与吴隐合刻“罗刹江民”白文印一方赠王福庵先生。1917年初春，孙锦为《蕙风词话》作者，后来成为陈巨来岳父的晚清词家况周颐，刻“况周颐印”白文印一方。

丁仁曾在《咏西泠印社同人诗》赞孙锦：“蝇头细篆析毫厘，匕首夫人擅巧思。珍重芳名劳弱腕，前惟何媛后韩姬。”

我深入认识外婆是在旅居日本之后。2009年，有一天我的好朋友——全日本篆刻联盟副理事长、大东文化大学书道学科教授、西泠印社名誉社员河野隆先生举办《平平凡凡四十印》展览赏析会，邀我参加。那是我第一次受邀参加日本篆刻界的学术活动，不懂业务，也没有人际。我很拘束地进入会场，只见展厅里都是玻璃柜台，里面并列放着大小、形状不一共40个印文为“平平凡凡”的篆刻作品，另外还专列有6个方“平平凡凡”四字篆刻作品。原

来是河野隆先生为纪念日本诗书画印一代名人的三村竹清先生。三村竹清先生（1876—1953）在1907至1916的十年之间，收集了38位当时日本和中国的篆刻名人创作的“平平凡凡”印章。这38位篆刻家，有27位是日本篆刻名人，11位是中国的篆刻名家。这11位分别是西泠印社创始人丁仁、王褀、叶铭、吴隐，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及孙锦、徐新周、童大年、胡然、汪厚昌、方若。在这些人中，我感到惊奇的是其中唯一的女性篆刻家，居然是我的外婆孙锦！38位中日名家每人一方，加上三村竹清先生自己的两方印章，共40方。展场的另外一角是现代日本篆刻名家（二世）中村兰台，松丸东鱼，小林斗庵等6位的作品，可谓篆刻界的盛会！

《平平凡凡四十印》一百年来公诸于世的记载有三次。第一次是三村竹清先生以十年时间收集的38家作品和自己篆刻的两件作品，共40方印影和边款拓做的善本（图2）。第二次是由1985年木耳社出版社印刷（图3），加上印章采用的石材用料，刻章人的出生年月，刻成年月，刻印时年龄及报酬，全做分别说明。这些记载清楚反应了除吴昌硕之外，孙锦是润格最高的。第三次是2009年，在河野隆先生举办的《平平凡凡四十印》展览赏析会上，令我大开眼界，亲眼目睹的金石之缘。此展增加了6方现代名人的印章，并为45位篆刻家详作说明，图录为《平平凡



◎ 图3 《平平凡凡四十印》 木耳出版社 1985 年



◎ 图4 《平平凡凡四十印》 河野隆编 晨风会 2009 年



◎ 图5 《遁盒古砖存》



◎ 图6 《遁盒古砖存》中孙锦印

凡印谱》，河野隆先生自己书写扉页。我如持至宝，珍藏这本历经一百年之久，有我爷爷、外公、外婆作品的《平平凡凡印谱》（图4）。

书坛院是 1919 年创立的日本老牌书法团体，至今逾 104 载，院内图书馆藏有中日等国书法、篆刻、碑文等古籍。2008 年为准备和日本泰书会在上野森之美术馆举办首届丁鹤庐作品展览会，我和会友李忠和一起去书坛院参观。时任书坛院副理事长饭山素木先生知道我是吴隐的后代，非常高兴地说：“我们有吴隐的宝书。”他马上去库房捧出一个很重的红木盒子，然后恭恭敬敬地将它放置在桌上。

看得出红木盒子年份很久，上面刻着《遁盒古砖存》（图5），饭山先生小心地打开盒子，里面一套八册的拓本原件展现在我们眼前，他拿出后，又一次讲：“这是吴隐先生的书，在日本很少。”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一页一页拜看，然后被一个特殊的红印“织云精拓”吸引住了，情不自禁叫出声来：“这不是我外婆的印吗！”这套《遁盒古砖存》（图6）居然有 9 页，盖着孙锦不同的红印，载有孙锦拓的古砖作品。

2010 年 9 月，饭山素木先生为书坛院的月刊《书坛》九月号“书的鉴赏”撰写文章（图7），把这件事的前后过程完整记录在他们的院刊上，作为吴隐和孙锦百年不朽的作品原件的见证。

每年 5 月和 11 月，书坛院会举行院内会员和学生的作品展，他们都给我发邀请函，我也至少一年要去一次观摩学习，至今已与四代理事长们有过交流，并一直保持友好关系。若有机会，我还要慢慢再拜看他们保存着的吴隐等先贤的其他作品，特别要找寻里面外婆孙锦的珍贵的作品。

吴隐在事业上的成功，离不开孙锦的心心相印与合力促成。在西泠印社初创的十年间，吴隐前后四次共计捐赠 490 银元，另捐赠 30 余部印谱和大量书画物品，这与贤内助孙锦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社史记载，孙锦自己还拿出过 20 银元的私房钱捐赠社用。可见她非同一般女流之辈，才有艺更有越女豪情。

孙锦还擅长制作印泥，吴隐的潜泉印泥就是夫人兢兢业业专研调制的。上海西泠印社的印泥秘方一直由外婆改进并完善质量，最终成为海内外知名的印泥品牌。吴隐去世后，上海西泠印社的经营业务由大舅吴幼潜任经理执管。二舅吴振平任副经理，两兄弟继续父亲的事业。

1934 年大舅二舅分家。外婆就随着二舅吴振平迁往新居广东路 239 号，那是沿街 5 层楼的店面房子。一楼店堂，对外营业；二楼印泥生产工场；三楼为二舅二舅妈和两个孩子（表哥表姐）的住所；四楼为外婆和一直跟着外婆的佣工（老娘姨）的住所；五楼是店的仓库。二舅吴振平掌管店铺和营业。外婆则专心改良和制作印泥。她把做印泥的配方、生产流程、秘诀都手把手传授给了二舅妈。由于常年劳累，外婆晚年多病，逐渐瘫痪卧床不起。1942 年农历五月十九日外婆仙逝，归葬杭州留下杨家牌楼的杨家坝。后来，1979 年 2 月去世的二舅，1983 年去世的二舅妈与外婆三人合葬。

今年正值有“天下第一名社”盛誉的西泠印社建社 120 年，又逢西泠印社首位女社员孙锦先外祖母诞辰 140 周年，以此缅怀和纪念！先祖们在九泉之下定亦为今日印社胜景欣慰，笑逐颜开！

二〇二三年十月丁如霞拜记

【作者简介】

丁如霞：丁仁孙女，日本丁鹤庐研究会会长。



◎ 图7 书坛院的月刊《书坛》九月号

历届社庆献礼作品精选

【编者按】

星霜荏苒，转瞬百廿。西泠印社即将迎来建社一百廿年庆典。百廿年来，印社每逢大庆，社内外艺术家献礼庆典作品精彩纷呈。值此双甲子之际，特遴选其中精品若干，以飨读者，以志庆贺。



◎ 东山图 傅抱石



◎ 丛菊图 诸乐三



◎ 秃鹫图 潘天寿



◎ 双女图 程十发



◎水墨竹石图 启功

篆刻有道、非易博學始能精一藝
清華雄渾見詩心奇正陰陽通畫意
印人結社重西泠七十五年觀波興傳
承豈止八家法境界方開千載新

西泠印社成立七十五周年志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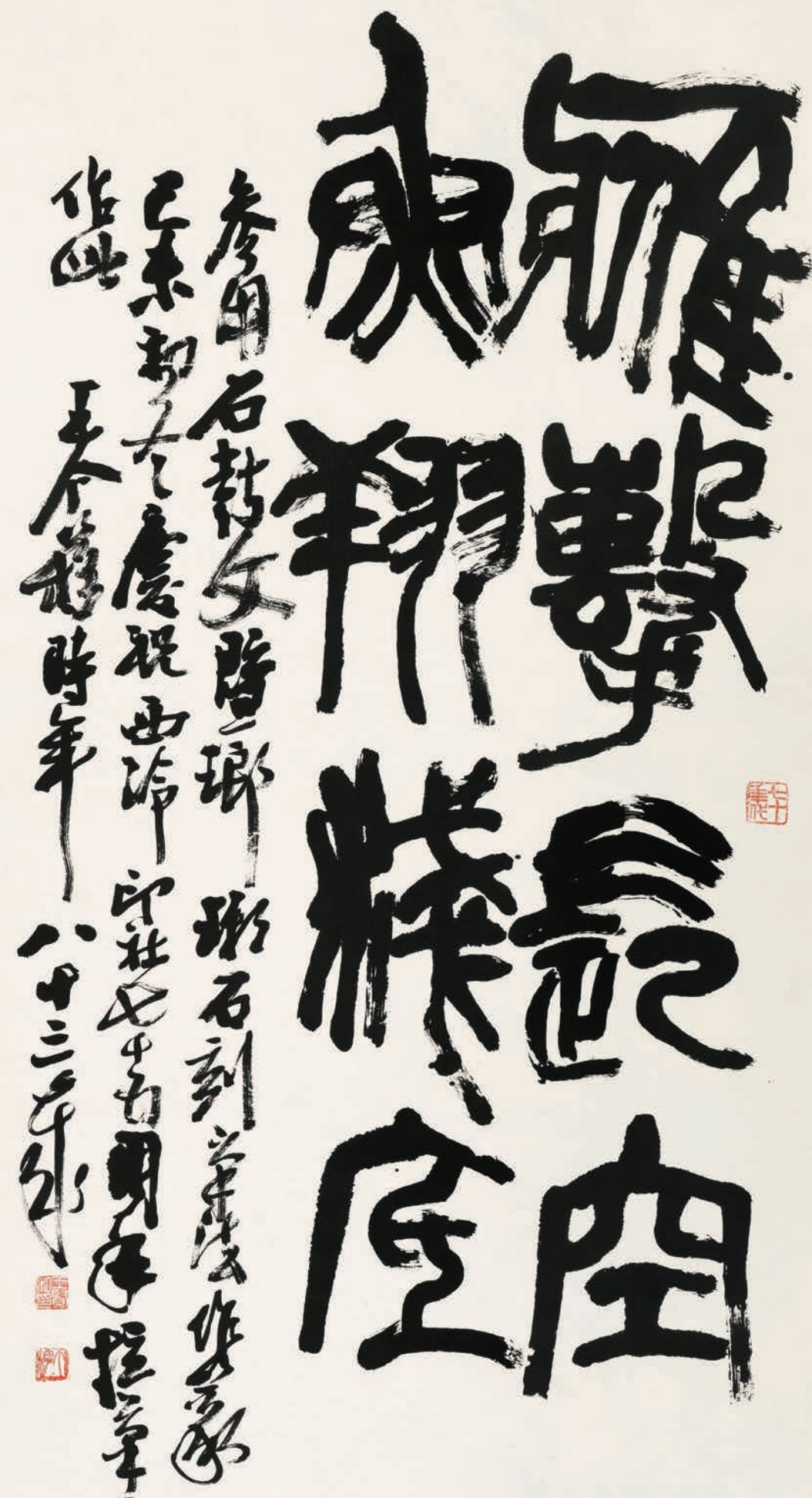
趙樸初



◎七十五周年賀詩 趙朴初



◎ 华堂上寿图 诸乐三



◎ 篆书鹄击长空轴 王个簪

篆刻有術術非易博學始能精一
藝清華雄渾見壯心奇正陰陽通
畫竟印入結社重西泠七十五
觀復興傳承豈止八家法境界方
開千載新

敬祝大會成功為西泠印社七十五周年大會獻詩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七日趙樣初電賀 錢君匋書

◎七十五周年賀詩 錢君匋



◎葵花圖 錢君匋

西泠印社八十五周年紀念碑記

印學晚起印學立社更是本世紀之事西泠首出人才多業績彰迺譽海內外迄今八十五周年矣一九〇四年
丁輔之王福金葉品三吳石潛諸先生度地西湖孤山初奠社址推先師安吉吳先生為社長吳先生碩學絕
負一時清望聲氣所逮朋儕日進標榜存金石研究印學八字為宗旨春秋社集會者析疑砥礪藝業開風氣之
先歷年出版印譜印說品目繁多闡幽表微功社士林餘姚新出土漢三老忌日碑將流出域外同人醵金贖回
葉龍保藏尤表表偉舉吳先生既歿馬姓平先生繼任馬先生遠客京師韓登安先生以總幹事處理日常社務
社員人數據社志稿卷二所列經福會先生核定者中國六十九人日本二人此前一階段理事會廣延名流
中央地方咸置文物管理機構保金石既有專司政府重視印學研究有令改組本社成立理事會廣延名流
諸張閔聲先生為社長核撥經費發展業務創作實踐研究方面雖承優良傳統發揮個人專長利和平各有陣地
百花齊放競豔爭妍若干作者足以方駕前賢理論研究方面雖承優良傳統發揮個人專長利和平各有陣地
法探討實物鑑定及有關資料整理或為前人未嘗措意或雖編刊西泠苑叢西泠苑報經常出版習藝治印學
性系統性之軌轍形成印學研究新風尚宣傳普及方面定期編刊西泠苑叢西泠苑報經常出版習藝治印學
書隨時著辦作品藏品展覽曾一度到日本展出深受歡迎印學導源於中國寔微而傳入日本朝鮮東南
亞諸國近年則歐美人士亦多涉獵及此東來訪問者本社時有接納國家與強抗風遠暨亦適然耳後一階段
新老社員著籍者中國百八十四人日本四人十賢英多濟濟踴躍各在相同角度潛心作述為斯道維深藝展
作出努力瞻望前程燦若霞舉蓋海苑能無似十載尸位愧無建樹茲值紀念良辰羣推為文勒碑垂示來業軌
不揣鄙陋竊錄瑩瑩大端著之於篇吳先生嘗言社何敢長蓋海抑又等而下之重以耄耄願得瓜代從諸君子
之後充一錄事足矣一九八八年九月沙孟海撰書篆額年八十九

◎西泠印社八十五周年碑記 沙孟海

西泠印社建社八十周年大會誌慶

先哲崇功 篆書十言聯 方介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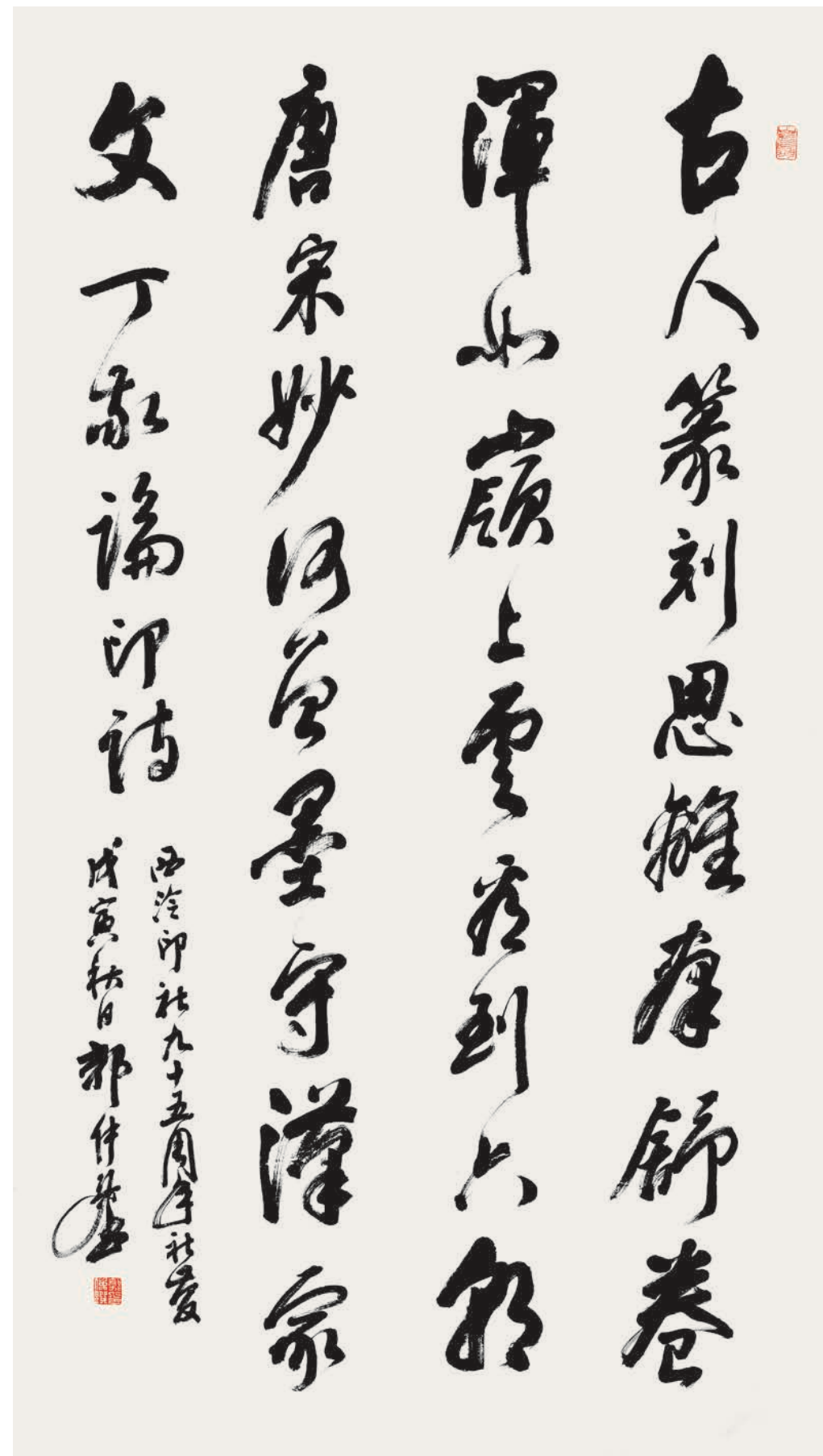
先哲崇功 篆書十言聯 方介堪

公元一九八三癸亥十月介堪方昂撰并書篆額

◎「先哲崇功」篆書十言聯 方介堪



◎ 竹石图 程十发



◎ 丁敬论印诗 郭仲逸

百千萬里風舉雲騰石鼓堪歌喜憑
印學心相印

西泠印社創立九十五周年志慶

孤山德不孤

趙樸初敬撰賀並書



九十五年燈傳踵接斯文未墜結集